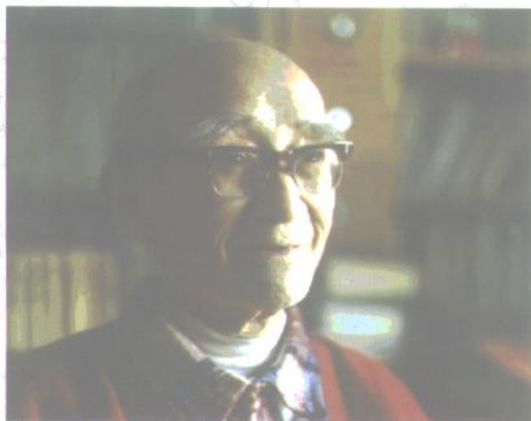


学海钩沉丛书

往日心痕

——王利器自述

· 从对对子学起 · 良师与益友 · 亲
扶向师旅棹归旧山 · 我与《文心雕
龙》 · 谁说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 · 访
日讲学记 · 未达之知与不虞之誉 ·
老运动员 · 劫余话劫中之劫 ·



山西人民出版社

K825.4

85

99773



200425735

学海物沉丛书

往日心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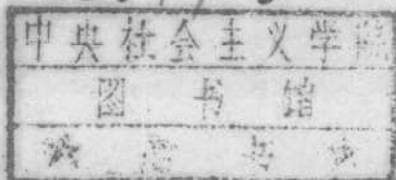
——王利器自述

· 从对对子学起 · 良师与益友 · 亲
扶向师旅棹归旧山 · 我与《文心雕
龙》 · 谁说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 · 访
日讲学记 · 未达之知与不虞之誉 ·
老运动员 · 劫余话劫中之劫 ·



主 编 敏 泽 副主编 崔元和 高增德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DJ64/16



责 编：于辅仁
复 审：周 红
终 审：崔元和

学海钩沉丛书
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
王利器 著

出版发行：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市并州北路 69 号）

印刷：山西人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4 千字

版别：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书号：ISBN 7-203-03657-X/G·1557

定价：5.00 元

丛书序言

敬 辞

一代有一代之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人。

在这个沧桑巨变的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回首既往，可以发现中国古世纪的学术研究，与世变同步，也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一批熟悉中外历史、文化，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深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社会科学研究，将自己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用自己的笔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现实斗争，为 20 世纪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诞生和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中间的另一一些人，继续在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奋力耕耘，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创造和智慧，推动着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立言，为中国新文化的成长和壮大立心——他们都无愧于 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卓有贡献的战士和学者。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当代学术研究事业的资料集累、搜求和建设方面，却是重视

得不够。以文学创作来说,对于在当代文坛上有所影响或贡献的作家,许多都出了研究资料汇编,以为开展研究之资,这无疑是必要的和应该的。但与此同时,对在学术研究方面甚至有大的影响和贡献的学者,却很少有人注意及此,这又是不应该的。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推广,固然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令人欣喜;但随着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科学则又到了一些不应有的冷落,这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人们庆幸的是:我们一部分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社会主义出版家,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在自己的出版事业中,眼睛不只是紧紧盯住经济利益这一点,而是能够重视社会科学在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中的重要性,怀着深切的社会责任感,给予学术事业的发展以有力的支持;不仅拟拨专款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而且,还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学术文化资料方面自觉地积累和抢救工作,出版一批在我国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老学者们的传记、回忆录一类著作,使他们一生中所积累的宝贵的学术文化史料,能够公之于世,传诸永远。这一工作无疑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于学术文化的建设,是一项富有战略性的举措。

这就是这套丛书编辑的缘故和目的。

这是意义深远,而又动手太晚了的工作。进入选题,我们就感到了它必然要留下尽多的遗憾,一批造诣很深、硕果累累的学者,已经先后作古,身归道山,也有不少学者已经失去了撰写、甚至口述的能力。如果在10多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情况无疑

要好得多。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抢时间来做这一工作,我们将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更多、更大的遗憾!

这套丛书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回忆录的内容包括家学渊源、师承关系、学术交谊和经历,学派成就及变化,以及重要学术观点及年谱等等。文字要求平实朴素、言之有物,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一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既可以从中寻绎出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经验,又可以为未来学术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编纂这套丛书的信息发出后,很快受到了各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们普遍而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咸认为此举颇有意义,这是不能不使人受到鼓舞的。祝愿它的成功。因为它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批珍贵之史料,足以成为当代和后世研究之资。是为序。

1997年7月30日于北京儒远楼

目 录

从对对子学起	1
从吴芳吉先生读《淮南子》	21
良师与益友	26
解放前后	73
亲扶向师旅棹归旧山	82
我与《文心雕龙》	91
谁说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	102
访日讲学记	114
未达之知与不虞之誉	138
老运动员	161
劫余话劫中之劫	172

从对对子学起

利器幼承庭训，发蒙的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先生。他教我们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赋学正鹄》、《白香词谱》，后来又上《纲鉴易知录》、《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都是要死背的。他认为上路了，才让我们开笔学做文章，在渣滓尽去、清光大来之后，就学对对子。他说：“对子又叫做对联，是由若干方块字组合起来的产物，风标独特，讲平仄，讲对仗，缘情体物，具有形式对称、高度概括之美，掌握它，是处都派得上用场。”当年武昌起义，在同盟会领导下，重庆成立了军政府。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蜀军政府秘书院长向楚为蜀军政撰元旦门联：

奉新元为正朔，
扬大汉之天声。

典雅堂皇，盛传一时，誉为合作。邑人钟云舫撰《振振堂集》，几乎全是对联，极少佳作。他在狱中写了一副临江城联，

一边就有 1600 多字，自谓“阅者笑我之无耻，当谅我之无聊也”。其实也不过是一篇八股文的两比而已，东拉西扯，生吞活剥，虽多亦奚以为。这是不足为法的。

以上所记刘老师之言，有些是原话，有些是大意。在我记忆中，有一次，老师出上联：

风送荷香来十里，

我对的是：

月移花影近三更。

老师说：“‘近’字下得好。”

之后，学做诗，记得有一次，题是咏史，我写道：

十七年间须尽白，
数千里外冢偏青。
英雄何必分儿女，
一样威名重北庭。

老师说：“收得好。”又一次，题是春归，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全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末两句是：

满地落花红不扫，
尚留春色在人间。

老师评语道：“一结有俞曲园‘花落春犹在’之意。”并为言俞曲园以此诗名其堂曰春在之故。至是，我才于终日读高头

讲章之外，知道有俞樾俞荫甫其人，油然而生景仰之心。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和俞平伯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想不到您还是受先曾祖曲园老人的影响而入门的。”从此以后，我就想方设法把“春在堂全书”配齐，至今它还是我手边经常翻阅之书呢。在重庆菜园坝念书时，曾过江去南岸游观，访邑人陈竹波所书“涂山”摩崖两大字，有记其事：

涂山今一到，
回首望尘寰。
雾意涵虚白，
波光共蔚蓝。
临江如带水，
比屋欲梯山。
百战雄关在，
征人去不还。

会对对子、会写诗之后，老师就教做四六、做律赋。记得有一次，出的题是浔阳琵琶赋，以“同是天涯沦落人”为韵，限定要押官韵。就是要把限定之字，在这七段文章中，押入每段的第一联或最后一联。我做的这篇赋，开头两句是：

江心月白，
人面花红。

老师很欣赏，圈了夹圈，眉批道：“一起全神在握。”像这样练笔的文章，不知写了多少，都20岁了，我才谢师，考入天津中学。适逢其时，三年级有位同学死了，学校开追悼会，我代表我们班新生送了一副挽联，写道：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惜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那次追悼会，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咸推此联为合作。在重庆大学高中部时，向宗鲁先生教我们读章太炎先生写的《清儒》。向先生当时被重庆大学誉为“三鲁”之一，即何鲁、文伯鲁、向宗鲁也。向先生尝有春联：

为学远承都水使，
立身端似蒋山儒。

举似刘向、顾炎武以为立身蕲向，人以为文如其人也。向先生“工为骈俪之文，在武汉时，值武汉人为黎元洪铸铜像，征求像赞。他写一篇骈文应征，被推为第一”（《四川省近现代人物传》）。向先生在青年时，颇尝做诗，不自珍惜。逝世后，门人屈守元君搜辑得《挥弦斋诗稿掇残》，其后记云：

右先师巴县向宗鲁先生（承周）诗，今年夏，谒师母牟鸿仪先生于电讯学院，举以见示。原本为先生门人所录，水渍碎滥，竭数日之力，理出律绝诗 32 首（附黄季刚一首，不计入），残阙者犹有一半。因属门下黎君孟德写清本二份，一贻同门王君藏用（利器），一以自存，拟用复制，以广其传。先生笔记旧题挥弦斋之名，因署之为《挥弦斋诗稿掇残》云。诗皆先生 30 岁前作也。甲子大寒，守元记。

今谨录其完整者都 16 首，附黄季刚一首：

代 赠

别鹄凄音入绮弦，
江关萧瑟负华年。
曾寻芳草招山鬼，
更倚白蘋望水仙。
梦里精魂长化蝶，
愁中日月怕闻鹃。
星移井络千里里，
一度思君一惘然。

见时苦短别时长，
风马云车竟杳茫。
汉水新知劳玉佩，
蓝桥旧迹感琼浆。
书迟青鸟通南国，
路断黑龙阻北方。
惆怅天孙勤杼柚，
七襄终日向谁忙。

有 寄

蜀庄帘下旧沉冥，
独漉翻悲水上萍。
已分投珠辞汉女，
未容鼓瑟伴湘灵。
十千愁酌盈觞酒，
三左闲看在户星。
几度越人空拥楫，

愁怜君鄂自伶仃。

竭来忍使带围宽，
奈此新情与旧欢。
剑到延津终不化，
珠辞合浦竟教残。
投怀展转思青雀，
写韵殷勤倩彩鸾。
徒倚帘栊频北望，
曲将幽意诉柔翰。

闻 病

闻病卧病泪频挥，
取冷中庭愿总违，
肘后医方聊一献，
写来惟有蜀当归。

七 夕

漫道来时已有期，
万重云浪万重疑。
连晓玉女难成笑，
隔水黄姑只益悲。
几见鹊飞能涉海，
未妨鸳戏自沿池。
莫教更乞天孙巧，
引到情丝是恨丝。

无 题

袖中书字半消沉，

绿绮凄凉旧日情。
情味失甘余蔗尾，
痴怀茹苦到莲心。
蛾飞未惜终投火，
鹿死何曾尚择音。
太息人生还似草，
郁金标下几长吟。

赠曾子纯

短褐春寒上泪痕，
故山风物怕重论。
行来鸟道人家少，
劫到虫沙我辈存。
十志中郎新削草，
五噫高士旧移根。
竹林胜侣嗟零落，
还想黄墟一断魂。

忆文师

当代几人存大隐，
不夷不惠见吾师。
名羞画饼抛来久，
学悔雕虫谢去迟。
在阙青衿宁是福，
登楼皂帽未全痴。
药笼暂作偷生计，
剩有风规似陆圻。

（黄太冲《感旧诗》云：“桑间隐迹怀孙夷，药笼偷生忆陆圻；”

浙西人物真难得，屈指犹云某在斯。”丽京曾买药也。)

贺刘某纳妾代胡涛作

平量往事话兰茵，
旧是游仙梦里身。
为逐新声过北里，
还从巧笑识东邻。
绮筵襟解留齐贲，
斗帐钗摇挂汉臣。
会得高媒玄鸟意，
伫看绣葆育麒麟。

闺情和黄季刚

(限溪西鸡齐啼韵中用一至十
百千万丈尺重半及两十九字)

二七年华住若溪，
九天尺五忆关西。
八行重托三春雁。
丈室愁听半夜鸡。
酒对十千双影只，
情分两地一般齐。
伤心百六清明节，
万树流莺四面啼。

附黄季刚原作

一丈红墙荫碧溪，
柳丝千尺六阑西。

二情那及双巢燕，
半枕惟憎五夜鸡。
九百身心同梦杳，
万重云水四边齐。
十中七八成虚愿，
赢得三年两泪啼。

自题小照有寄

局促驹辕过卅秋，
文章无力畔牢愁。
尝来鸡肋才偏拙，
味到马肝论未休。
旅思渐凋潘岳鬓，
端忧欲白魏文头。
何当胜侣重相聚，
夜夜三刀梦益州。

孤怀郁郁久谁陈，
莫怪休文瘦绝伦。
马角羈留燕太子，
蛾眉谣诼楚灵均。
为通琴意还思蜀，
肯逐箫声更入秦。
玉案琼瑶消息断，
四愁歌罢亦伤神。

一槎江上感王余，
辛舍年年耻曳裾。

几见鸿妻依庑下，
难招蚕室偶田居。
玉台绮思增新咏，
明镜清词检旧书。
欲把犁锄问南亩，
劳君馐餼竟何如。

以乐府诗集寄内媵以长句

乐府重翻远别离，
商陵调苦有新词。
才人赵国羞厮养，
小吏庐江起怨悲。
月照流黄独不见，
愁啼络纬长相思。
阳关肠断青青柳，
更倩刘郎演竹枝。

春 愁

翘首芝田感昔游，
炊珠还拟为君留。
休文病后徒量臂，
子羽悲来更贵头。
龙具寒深犹旅寄，
鹿车梦远又林邱。
柳丝不是章台意，
掺入东风处处愁。

上四川大学（下简称“川大”）时，适逢四川政学各界在

川大至公堂公祭章太炎先生，川大教授庞石帚先生致挽联云：

春秋大九世复仇，当东胡乱政时，义无贰顾；
学术为两浙后劲，于南雷著书外，放出一头。

短短 30 许字，道出章氏一生，人无间言云。在成都，游工部草堂，有何绍箕题联：

锦水春风公占却，
草堂人日我归来。

颇富于诗情。谒武侯祠，有赵蕃题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极富于哲理。毛主席颇欣赏此联，岂无故哉！建国以还，余尝应邀西归巴蜀，东访齐鲁也。于江津白沙黑石山题吴芳吉先生墓云：

江声远走白沙外，
诗卷长留黑石间。

以葬吴先生时，以《白屋吴生诗稿》为殉也。于合川钓鱼城吊宋蒙战场，集唐人诗句题云：

乾坤万里眼，（杜甫《春日江村》五首之一。）
天地一家春。（韦巨源《圣寿无疆词》，见《乐府诗集》卷九十一，或以为杨巨源词。）

尔其登斯城也，铜梁爽气，玉垒浮云，一望无际。遥想当年，宋蒙鏖兵，血战玄黄，一代天骄，折鞭城下。今则换了人间，各族共和，亲若兄弟，故借得唐人一句曰“天地一家春”也。此本为余在抗战胜利时所作春联，今以移之钓鱼城古战场，亦觉贴切也。于山东阳谷县景阳冈题水浒纪念馆云：

俗语流为丹青，
人心自有皂白。

以受武松庙管理员“先有《水浒传》，后有景阳冈”一语启发，乃发而为此言也。似此，则对子这种文学艺术形式，于点染江山，提挈人物，其锻字炼句，措辞遣意，以少胜许多许，使人目击而道存，亦胡可少矣。明人李开先《中麓拙对序》写道：

属对在文事中为末技。然童而习之，至白首有不得其肯綮者，此与对联夔别，只宜严而切，简而明，虽若出自信口，字句浑然天成，无雕琢之迹，有金石之声，是则可传，传而可远，不当以末技目之矣。

说见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六，可谓知言哉！

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时，适逢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办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毕业会考，四川大学推选我的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应考，哪里谙到竟得了第一名，还加封为荣誉学生。（时人称之为状元。《风俗通义校注》已于1981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尔时，中央、地方的大小报纸都登载了这个消息。解放后在上海、南京、武汉遇上一些当年同时毕业的朋友，还戏呼为状元呢。当时，国民政府对于荣誉学生还

颁发一大笔奖金，事隔两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同学才给我领下来，恰恰够买一方端砚。若是当时立即领下来，必然拿去购置田地，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封建地主无疑。尝读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四《买砚诗》：

徐渊子诗云：“俸余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古砚砖；，
依旧被渠驱使在，买山之事定何年？”刘政之贺其直院启
云：“以载鹤之船载书，入覲之清标如此；移买山之钱买
砚，平生之雅好可知。”

徐渊子拟办之事，余乃成为事实，一个荣誉学生之憾事，直可谱成民国儒林外史了。得了这个头衔以后，颇引起乡人重视，于是前来求写寿序者有矣，求写墓志铭者有矣。其寿序我俱以骈文出之，记得有一篇节寿序有云：

酒边之柳色初匀，
海上之樱花在望。

以其夫死于赴日求学途中也。有一篇墓志铭，是应重庆某银行家所作，送致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之资。在江津建立创业银号的同学吴崇忠、颜如南等知道此事，遂邀约我作股东，而银号遂升级为银行（当时，须有资本 60 万法币以上，始得称为银行），招牌是请但懋辛先生写的。但懋辛先生，川人称之为黄花冈七十三烈士，以其幸免于难也。1941 年 11 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向宗鲁殉职于峨眉，由我经手把向师旅棹运回故山，其旱路一切费用无着，我就毅然决然把创业银行的股金全部提出来用了。今天，有人知道此事，说我有先见之明，不然，解放以后，我就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了。

打从我读川大中文系，潜心朴学以来，就很少做诗，然亦偶尔为之。1982年春，第一次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应大公报之约，写了新《北京竹枝词》100首，以歌唱新中国的新人新事。有如：

数红道绿两依稀，
月份牌前笑脸迷；
识得幼儿心上事，
原来明日是星期。

白色围裙一斩齐，
门前接得幼儿归；
谁家小小童真甚，
错把妈妈叫阿姨。

附耳墙头选距离，
小名大姓两心知；
天坛一试回音壁，
切切如闻私语时。

向往京华作壮游，
五湖四海汇洪流；
人生何处留鸿爪，
金水桥头好镜头。

卫星直上九霄重，
科学尖端大不同；
一代强音谁比拟，

太空响彻东方红。

系铃推鼓费安排，
自向天公夺巧来；
试到唐花坞里看，
春兰秋菊一时开。

米盐琐碎说当家，
七事开门都要他；
却喜农村丰产日，
市场开遍自由花。

回到自然郊外行，
十年树木已成荫；
自从绿化荒山后，
不放黄云作塞尘。

历史搬将上舞台，
艰难创业展鸿裁；
长征脚印留天地，
万水千山走过来。

考查国计与民生，
生产低于人口增；
儿孙满堂思想旧，
光荣今属独丁丁。

眼前有景，随手拈来，都无惊人之语，虽水调山歌，不过如

斯而已。后来，日本横滨大学波多野太郎教授又以之译成日诗，登在《龙溪》杂志。亦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诗代柬，互道胜常者。如己巳秋，老友屈守元教授柬藏用：

乍离叔度又经年，
鄙吝心如藓着砖。
何用传灯辨能秀，
深惭附翼号渊骞。
京华共阅摊书肆，
锦水曾登返棹船。
同学几人顽健在，
五车徐读杀青篇。

余即步原韵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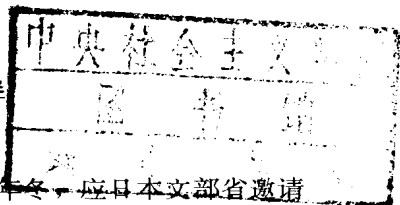
枇杷院落忆当年，（川大在皇城的学生宿舍。）
共数晨昏不计砖。

诸葛何为期管乐，（余著《试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谓管乐之乐为传黄老之学的乐巨公而非乐毅，以正前人之失。）

侯芭有幸读《渊骞》。（《渊骞》、《扬子法言》篇名。庞石帚先生曾以侯芭负土葬扬雄，称誉器之亲扶向师旅榱归故山。）

国门妄试千金笔，（器时正写《吕氏春秋注疏》。）

旅榱亲扶万里船。
白首相看人未老，
礼堂写定待谋篇。



则 1989 年之所作也。又曾于 1984 年冬，应日本文部省邀请讲学，由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负责接待。讲学任务完成，日本友人设宴话别。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即席赋诗，本赠言之谊，道惜别之情，是将他日天末怀人张本也。其诗曰：

其 一

巴蜀犹闻老杜村，
先生许是右丞孙。
性灵遍照磨《文镜》，
《家训》之推慕佛门。
浙水秋潮智深墓，
太行春色史斌痕。
李和尚爱梁山泊，
宗教由来可解冤。

其 二

开遍樱花又一村，
如归宾至待王孙。
索书东访燃藜阁，
觅迹南敲入定门。
瑟瑟清风散香气，
纷纷微雨洗尘痕。
春来宜忆扶桑景，
愿托双鱼宽别冤。

乙丑仲春 后学清水茂敬呈 王藏用教授惠存。

诗以唐律出之，且押该诗之十三元韵，实为难能可贵，曲园老人如可作，又将收入《东瀛诗选》矣。余即步其韵和之。诗

曰：

其 一

古邻遥接海王村，
尚友先贤孟与孙。
四国方言通《赤雅》，
六朝《家训》说黄门。
度阡越陌人无恙，
缩地飞天月有痕。（以夜飞抵大阪。）
海上神山今已到，
何由秦望滞烦冤。

其 二

积古犹传徐福村，
年年芳草忆王孙。
自安七秩藏人海，
敢有千金示国门。
青鸟飞来应有意，
绿林奇赏共留痕。（清水教授与吉川幸次郎先
谁言诲盗施罗者， 生共译《水浒传》。）
携手相将一洗冤。

其 三

身是三家破落村，
遥遥华胄愧王孙。
心归佛国朝金阁，
踏破书陵限铁门。
贾府荣华终是梦，

大行春色岂无痕。
替天行道补天石，
一样天工可解冤。

其 四

不登大雅不为村，
妄有楹书传子孙。
为水方知观学海，
归心那复入玄门。
同天风月通禅寂，
绝代金钗记梦痕。
失马塞翁倚祸福，
蜀鹃何事诉春冤。

其后，成都大学钟树梁副校长见此诗，步原韵追和云：

其 一

遥望扶桑百万村，
谁铺云锦定天孙。
樱花烂漫真成海，
诗韵悠扬忽到门。
《文镜》磨经中日手，
词源流带汉唐痕。
功高斟古王藏用，
揽胜搜奇复洗冤。

其 二

杜陵昔寓浣花村，

文采尝思魏武孙。
博带人多樱世网，
雅琴谁复奏雍门。
骚坛合力堪扛鼎，
亭壁闻歌任书痕。
一笑吾徒天地阔，
安能徇物自烦冤。

其 三

耻为盲鼓夕阳村，
信口侑张戏幼孙。
文苑必摩屈子垒，
武营原肃亚夫门。
秋风清水人斯健，
夜雪高斋梦有痕。
问讯东瀛怀冀北，
诸天欢喜绝愁冤。

即此一端，彼此唱和，往来无间，为文化交流之梯媒，国际友好之见证，诗之为用大矣哉！

从吴芳吉先生读《淮南子》

上江津中学三年级时，吴芳吉先生来当校长。他很勤学，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全体学生同时起床上自习。吴先生的寝室兼校长办公室，就在我们三年级学生寝室恒字村对面。他案头置有两部书：一是《淮南鸿烈集解》，一是《杜诗镜铨》。他每天都是要读的。我们班上和我同寝室的杜大宾同学就从吴先生读杜诗。他跟我说，他是杜工部之后。当时漫不经心，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请他拿出他家族谱一观，从而灼知这位伟大诗人的后裔在江津继继承承，本支百世，为我江津生色不少。未几，我们毕业以去，杜大宾考入聚兴诚银行，不幸自杀在春申江上。我才深悔当年失之交臂，没有进一步向杜大宾了解这个问题，今则无法弥补矣。隔了多年，我读到《宋史》卷三百八十七《杜莘老传》以及袁方城、程德音两部《江津县志》，才知道杜莘老是杜甫十三世孙，江津人，陈诚之榜进士，服官有佳誉，虞允文称之为刚直御史，死葬于江津县杜里之虎脑山，至今遗迹犹存。于是写成《杜甫有后于江津》一文，发表在《草堂》1981年第2期，以发潜德之幽光。

与杜大宾同时，我受吴先生影响，也买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用水彩画红色来断句。吴先生逝世后，我忙于升

学，明句读工作就停止了，直到今天，我这部书还没有用红笔圈完，亦可谓杀书头子也。当时，读到《原道篇》“员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云云”，刘文典于“叶”字下作注：“文典谨案：《御览》五十八引‘叶’作‘弃’。”是刘文典于“叶”字断句也，我觉得读不通，去向吴先生请教，他也觉得刘文典断句有问题，但都不知应当怎样读。从此引起我对《淮南子》的兴趣，虽槌填索涂，冥行而无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还是一步一步地向着像蜀道难的崎岖之路走下去，养成我锲而不舍、不畏艰难的精神。对《淮南子》是如此，对其他书也是如此。后来，我读到《淮南子·俶真训》：“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又：“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此圣人之游也。”又《主术篇》：“叶贯万世而不壅，横扁四方而不穷。”又《兵略篇》：“下至介鳞，上及毛羽，条修叶贯，万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今案，《广雅·释诂》：“揲，积也。”王念孙《疏证》：“揲者，《淮南子·俶真训》云：‘横廓六合，揲贯万物。’王逸注《离骚》云：‘贯，累也。’揲贯，犹言积累。《原道训》云：‘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主术训》云：‘叶贯万世而不壅。’叶与揲通。《本经训》：‘积牒璇石以纯修碻。’高诱注云：‘牒，累也。’牒与揲声亦相近。”《释诂》又云：“叶，聚也。”王念孙《疏证》：“《淮南子·原道训》云：‘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是叶为聚也。《说文》：‘叶，草木之叶也’。亦丛聚这义也。又《说文》：‘鏃，鏃也。’徐锴传云：‘今言铁叶是也。’案：今人犹谓铁片为铁叶，亦取丛集之义。鏃与叶同音，鏃与集同音，集叶，皆聚也，故鏃又谓之鏃矣。卷一云：‘揲，积也。’揲与叶亦声近义同。”案：王说是。《广雅·释诂》云：“贯，累也。”是“叶累”即“叶贯”也。积年夙疑，一旦涣然冰释，是亦一适矣。所引以为憾者，不能起吴先生于九泉，

而告以此文句读今已明，庶几如高诱《淮南子叙》所云可以“诵举大义”也。

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后，回到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任职，仍把《淮南子》作为必读之书，每有一得之愚，不管成熟不成熟，兴酣落笔，辄于天头地脚，东涂西抹，骫然杂陈，至今观之，颇有令人闷笑之处。然不悔其少作，而敝帚自珍，良以此可回顾自己走过来的轨迹，而为继续前进作借鉴。如于《说山篇》：“孕妇见兔而子缺唇。”虽据《博物志》“妊娠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见兔，令儿唇缺”。《晋书·魏咏之传》“生而兔缺，……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得知一二，我心疑《淮南子》之说，讖纬书中或有之，遂驰书李庄板栗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向陈槃先生请教，以前在板栗坳时固朝夕相处也。旋得复书：

臧用尊兄箸席：

山中一别，奄踰岁时。伏想乐育英才，著述道广，甚盛甚盛。往承见询《淮南子·说山篇》云“孕妇见兔而子缺唇”，未悉讖纬中有无此说？顷始检得类似一则。按《春秋元命苞》曰：“人之七孔，内法五脏，外方五行，庶类气契度也。（宋均注：‘万物与人，皆同一辙，内外若契合者也。’）故其……像兔者多缺少。”（《逸书考》引清河郡本）按所谓兔所缺少者，盖即指唇为言。崔豹《古今注》鸟兽类：“兔口有阙。”（《御览》九〇七引作“缺”。）盖旧说之遗也，辄复举似，不审有当尊意否？研究所仍返京，但目前交通不易，须至明年春夏间始得成行也。率此顺候道祺不一。

弟陈槃顿上。10月27日。

今案：《庄子·人间世篇》释文：“阒，空也。”此即旧说之遗也。商量旧学，涵养新知，孔子曰：“益者三友……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篇》）此之谓也。

1987年5月，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所长邀请，前去讲学，是为我第二次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因得与利荣森博士相晤，始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67年11月，建筑及设备费用，包括兴建研究所、文物馆、演讲室及文物修复工作室之所需，概由利希慎基金会负责出资。利荣森博士为利希慎基金会成员，而为我当年在峨眉山四川大学法学院同学同住在伏虎寺者也，睽违40余年，老同学今始得相会，晤言甚欢。刘殿爵教授问及“罄龟无腹”一语出于何书，尔时，我对这句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一时又记不清楚，未敢质言。后来，乃于《淮南子·览冥篇》得之，实则《淮南子》亦本之《文子·上礼篇》，即驰书奉告刘殿爵教授，深愧不如先师向宗鲁先生，每有问者，即应时告以见于何书哪篇或哪卷，故时人谥以“向书柜”之美称，又有“读史不向宗鲁”的谚语（《四川省近现代人物传》第6辑《向宗鲁》）。

维时，另有一位以修辞学名世且曾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之郑子瑜先生亦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客座教授，方从事唐宋八大家研究，于眉山三苏父子大肆讥弹，蒙以初稿见示，并索余为之序。余婉言告以我家与苏颖滨先生后裔在江津者有姻联，我实不能奉命作序，以得罪于乡党朋友。盖在江津笋溪上游之圣钟里，苏氏聚族而居，《江津县志》以为苏迈之后，《四川省志》则以为苏过之后。考青神余成勋《眉山苏氏祀田记》载：“嘉靖九年庚寅（1530），侍御邱君道隆按部眉山，修理苏氏祠堂，得江津苏学持所藏东坡小像来，辨其手翰，考其谱系，则颖滨后也。”（民国《江津县志》七之七《流寓》）

然则江津苏氏为苏辙后裔也。余之曾祖妣苏太孺人，其祖籍即出圣钟里。四川大学中文系七届同学苏灿瑶君，即圣钟里人氏，在川大肄业时，与余在《四川日报》创办《学文》副刊，刊头系请当时时任鸿隼校长邀请来成都访问之傅斯年先生所题。其后，灿瑶毕业以去，我又随四川大学迁峨眉，《学文》遂迫停刊。此余之所谓乡党朋友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同做客时，郑子瑜教授曾陪我访问中华书局及三联书店。在香港分别后，失去联系，未知其书出版与否？

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史记》，时班上有木田知生君，学习颇为勤奋，汉文汉语俱度越其侪辈，日本留学生中之未易才也。他回国后，在龙谷大学任教，知余之潜研《淮南子》也，乃以日本《名迹丛刊》影印东京博物馆所藏平安朝写本《秋萩帖》纸背抄写之《淮南鸿烈兵略闲诂》第二十高氏注，凡334行（日本二玄社1976年12月15日初版，1977年3月25日再版），复印本见馈，取与宋人苏颂《校淮南子题序》（《苏魏公文集》卷六十六）相照，从而明确古本《淮南子》分卷及许慎、高诱二家注本题署异同之所在，得以理其故纷，乃撰为《日本古写本淮南鸿烈兵略闲诂第二十校证》，发表在《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此为研究《淮南子》最早有关之资料也。平安朝者，日本称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3）迁都平安城以后之朝代而言。延历十三年当唐德宗贞元十年。

良师与益友

先王父章可先生，前清廪生，服官从政，多历年所。反正前后，从事于保路和反对洋教活动，一身正气，颇为物望所归。六秩寿辰，邑人送有“槐荫满庭”金字大匾，以及用大红洒金宣纸所书寿屏一堂八幅，主要是颂扬他老人家反对洋教，为县人伸张公理。他老人家购置不少书籍，庋藏楼上，有洋版书（江津县人称用有光纸印的书为洋版书），如赫胥黎《天演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类；土版书（江津人称用毛边纸印的书为土版书。江津城内板桥街，有一家姓聂的开的善成堂书铺，专门刊印土版书，我家收藏的《江津县志》、钟云舫《振振堂集》，就是在这家书铺买来的）较多。我曾经在这些藏书里翻到一部《白芙蓉堂算书》，打开一看，什么勾股弦，什么鸡兔同笼，什么天元一术之类，有些是方的，有些又是圆的，觉得很新鲜；又有一些似乎是号码，像家里立四大柱记流水账用的一模一样。我拿去向刘老师，刘老师说：“这叫苏州码子，是用来记数的。”随着笑一笑说：“人家把我这个姓氏叫做‘文11’码子，就出在这里。”从此引起我对这部书的兴趣，经常拿来翻阅，也多多少少看懂一些，为我后来爱好数学，导了先路。

1934年，我才考入江津中学。那时，江津中学用的数学教本是温德华氏的，这套教本的特点就是习题多，不仅多而且还相当难。如几何的九点圆，不是作为定义来讲，而是把它摆在习题里面去了，我还是把它算出来了。发练习本时，龚琢章老师赞不绝口，说：“真了不起，无异于重新发现一个尤拉圆。”解放后，龚先生代表四川中等学校优秀教师和屈守元君代表四川高等院校优秀教师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优秀教师评奖大会。我在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设便宴款待他们，龚先生还兴致勃勃地提及此事呢。听闻之下，颇为汗颜，因为我已经不搞数学而去搞文学了。

初中毕业后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授课的老师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如向宗鲁先生讲《清儒》，陈伟谟先生讲英语，郭坚白先生讲代数，何鲁先生讲近世几何，段调元先生讲三角，李乃尧先生讲化学。当时，驰名重大之“三鲁”（何鲁、文伯鲁、向宗鲁），竟有二鲁先生在我班授课，时人以为美谈。我于是将《清儒》一篇，详注为一书，送呈向先生审阅。向先生以为“不让周予同之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专美于前”（此稿在重庆大学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文学院时散失）。何鲁先生讲授近世几何，则由我记录，后来印成讲义，还把“王利器记录”字样印上，真令我受宠若惊也。何鲁先生不仅以数学上的重大成就见知于世界，还是一个老一辈的爱国主义诗人的光辉代表人物，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出版有《何鲁诗词选》。其人无愧于其诗，其诗亦无愧于其人。川大老同学钟树梁君有《谈数学家何鲁诗词》，发表在《四川日报》1995年4月间，其文有云：

我国古代的伟大科学家皆长于文辞。仅以东汉张衡、蔡邕为例，张衡造浑天仪，是世界上很早的天文学大师，

其《浑天仪》一文是天文、历书巨著，但他的《四愁诗》、《同声歌》绮美悱恻，在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蔡邕是东汉大书法家、碑铭家，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有关《月令》的重要著作，又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即如清代中叶安徽的程瑶田、凌廷堪等人都工于词章，长于朴学，但又醉心于农学、生物学、音律学等学科的研究。《诗经·小雅·小宛》第三章“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自《毛传》及扬雄《法言》以来都因为脱离实际调查研究而误解相承，齐高帝时陶弘景始悟其谬。清代皖儒作了实地考察，这个“说诗”疑案才全然冰解。所以诗人而能兼作一定的科学研究，则更有助于“说诗”与写诗。学问之道未可局限于一隅，文学、科学有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之理。不可画地为牢，规规自守。今天看《何鲁诗词选》应注意到文学、科学相通相得的地方，作多面的探索，当有所获。科学家也应当写点或读点诗词以扩其心胸，活其机趣。

读钟氏之文，益知何鲁先生于数学、文学两方面卓尔而立，当今之世，诚未易多得也。

高中毕业。其时，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北大、清华、交大是年都没有在重庆设考区。我于是西上成都，去考川大，幸得录取。到注册处去报到，办完入学手续，发给我一枚编号的圆形校徽，是以清代考试院所在地明远楼为图案的白底珐琅工艺品，学生是白色的，教职员是黄色的，旁听生是红色的。前两年，有一位美籍华人是川大中文系旁听、姓戴的女同学在北京相晤，她开玩笑似地对我说：“当年我是红色学生，得不到你们尊重；今天，你们红了，我是十分尊重你们的。”话说远了，现在仍然回到本

题，还是说那枚校徽，当我接过这枚校徽时，引起我联翩遐想。孔子说：“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搞些啥名堂，竟然把取士所在的大楼起名为明远？解放后，历次搞运动，我都在劫难逃，似乎跨入大学门限时，就注定我一生命运。赵其文同志是我江津中学的老师，在一次会上悻悻然对我说：“王利器呀王利器，你知不知道你都成为老运动员了。”我心里不想，我知道什么！你呼我为牛吾应之，呼我为马吾应之，苟全性命于今世，如此而已。我知道什么。赵老师的本意似乎说我这个不肖之徒，把老师的声名都玷污了。明云乎哉！远云乎哉！恨不得起孔子于九泉而问之！

考入川大时，校长是任鸿隽先生，文学院院长是张颐先生，中文系有龚向农先生讲《三礼》（著有《经学通论》、《郑玄年谱》、《研六顾诗文初稿》），林山腴先生讲《史记》（著有《清寂堂集》），周癸叔先生讲词（著有《蜀雅》），向仙樵先生讲《楚辞》，祝岷怀先生讲《资治通鉴》，李培甫先生讲《说文》，赵少咸先生讲《广韵》（著《广韵疏证》、《赵少咸集》），李炳英先生讲《庄子》（著《孟子文选》，译《诸子概论》），彭云生先生讲《杜诗》，庞石帚先生讲《文心雕龙》（著《国故论衡疏证》中、下两卷，《养晴室笔记》、《养晴室遗集》），萧仲纶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主任教授刘大杰先生讲《中国文学发展史》。（以上所记诸先生著作，仅就所知见者而言。）名师宿儒，济济一堂，蔚为蜀学中心。师道立则善人多。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每个人以其性之所近，周旋于诸先生之间，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或转益多师，而不暖昧于一先生之言，莫不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而后亦有所树立。桓谭《新论·启寤篇》曰：“孔子以四科教士，随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杂物，欲置之者并至。”（《意林》

三) 其是之谓乎!

上四川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时，向宗鲁先生从重庆来川大任教。向先生以为我的派名太显露，乃赐字曰藏用，并为之说：“善藏其器，所以善待其用。”盖所以期待于我者，将于知如何读书，遂取陆贾《新语·术事篇》“书为晓者传”语，名其斋曰晓传；亦尝披阅《牟子理惑论》之言“书为晓者传”，《抱朴子·喻蔽篇》之言“书为识者传”，而知前贤之具有同心矣。悬车之后，则又取毛主席“只争朝夕”语，更名为争朝夕斋，盖思所以补偿在“文化大革命”中掷于虚牝之光阴也。

四川大学为避敌机轰炸，迁校峨眉，中文系主任教授向宗鲁先生安排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我报的是《风俗通义校注》。在审读过程中，向先生谓余：“你曾经写《郑康成年谱》，颇得龚向农先生好评；今又作《风俗通义校注》，对于后汉一代，当必娴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不履人意，希望你将来能把他重新写过。”我说：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由其门人完成，较之《前汉书补注》，实乃相形见绌。我尝读其书，亦有些批注，补其不足，正其失误。前人多谓范曄《后汉书》成于狱中，全书并未完成，连《叙传》也没有。我认为此说欠妥。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写道：“范曄后汉良史，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阙。”此言《范书》无志，乃为之补，明白可据；至谓“序或未周”，此则刘昭未达修史体例，不知妄说。自古在昔，私家修史，每有《叙传》，盖将以一家一姓之遥遥华胄，附国史之“骥尾而行益显”也。司马迁作《太史公书》，其自序亦称《叙传》。《五帝本纪》“太史公曰”，《正义》：“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自叙传云云。”《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其文即见《太史公自序》中。

《龟策传》褚先生曰：“窃好《太史公传》其《传》曰：‘三王不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其文亦见《太史公自序》。然则《太史公自序》即《叙传》，《正义》谓“传”即卜筮之书，非也。其后，班固作《汉书·叙传》，自“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起，至“以述《汉书》，起先高祖，终于孝中，王莽之诛，十有二世，230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止；沈约作《宋书·自序》，自“昔少昊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起，至“永明六年二月被勅撰国史，毕功上表”止；魏收作《魏书·自序》，自“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起，至“天保五年十一月修《魏书·十志》终业止；李延寿作《北史·序传》，自“李氏之先，出自帝颡项高阳氏”起，至“贞观中，私为修撰《北史》、《南史》既讫，乃上表”止；以及司马彪作《续汉书·叙传》（见《三国志·魏书·武纪》建安二十一年注及《司马朗传》注引）；华峤作《后汉书·谱叙》（见《后汉书·朱隽传》注、《三国志·魏书·华歆传》注及《世说新语·德行篇》又《方正篇》注引）。二氏之书，今虽不可概见，要亦步太史公之后尘，踵事而作者也。夫叙传者，自叙作书之旨谓之叙，追溯先世之业迹谓之传，有脊有伦，不蔓不支，此私家修史立叙传之要旨也。惟史之为书，要当严其断限。断限者，一代史之齐限，其起记有一定范围之谓也。因而要求私家修史，其家牒与国史之时间，必当首尾相衔，巨细交织，继继承承，无过不及，盖义虽出于骥附，而事则必归蝉联也。寻《宋书·范泰传》：“泰字伯伦。祖汪，父宁。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多所陈谏。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受奖后生，孜孜无倦，薨溢宜侯。”盖范汪始以寒族起家，其先

固积世无闻焉耳。推其时会，则在典午，尚不及当涂，既与炎汉悬绝，何可任情无例，而自乱其矩矱。盖例者所以明其义，传者所以记其事，事既不相因，义又不可失，此范曄《后汉书》之所以有《序例》而无《叙传》之故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范曄亦可谓善变矣。然若遂谓范曄以私家修史，而有数典忘祖之失，亦非也。寻《后汉书·黄宪传》论曰：“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隳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改门于孔氏，殆其庶乎！故尝著论云。”又《郑玄传》论曰：“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以郑氏家法云。”又《逸民·高凤传》论曰：“先大父宜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所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楼而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异道，其玄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此所胪列其先德，与《晋书·范旺传》所言“汪字玄平，安北将军，谥曰穆侯。汪生宁，宁生泰，泰生曄”，无不吻合，盖范曄之祖先，本寒门素族，其三代之可考者书于此矣。他却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一一介绍出来，无论历官也，立言也，胥见于此。考其上限，劣及西晋，尚不逮当涂，更无论东汉矣。此则范氏实开叙传之变体，别出新裁，其苦心孤诣，颇耐人深思。范曄尝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其他姑且不论，即此一端，亦足证成其言之无愧也。而武英殿本乃有范曄《自序》云：“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问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虽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愤闷，心机又不

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绘，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从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本未阙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内编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至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援人，士庶中

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意不成就，每愧此名。”此实范晔《狱中与诸甥书》，陈浩诸人乃删削篇首“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43字为之。“野蒲变而为脯，苑鹿化以为马”，乃欲以一手掩天下后世之耳目乎？以上与向先生关于《后汉书》有无《叙传》问题问答之语，当时，率尔道来，慢无友纪，1985年，就记忆所及，写成《〈后汉书〉有序例无叙传说》，载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晓传书斋文史论集》第161—171页。今兹所述，既据以为说，非原始问答语录即如是。余陈述刚完，向先生即发话道：“读书得间，发前人所未发，难得！难得！”

正在此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川大同学刘念和君来函告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今年决定招生，希望你去应考。我把此事告诉向先生，并说我想去报考。向先生说：“你去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很好。四川学子就应该走出夔门，看看外边的世界。”并告以“你的论文已审读完毕，我下的评语是：‘旁征博引，义据兼赅，足为仲远功臣。’重庆国民政府要举行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毕业会考，学校已决定推荐你的论文参加。再有，你关于《后汉书》有无叙传的意见，我也和季皋先生谈过，他也认为是不可多得之作。季皋先生专治《汉书》，功夫很深。就住在对门，你可去向他多多请教。”

于是我来到陈先生寓所，升堂入室，亲聆教益。案头有王先谦《前汉书补注》两部，陈先生举以相示，天头地脚，朱墨烂然，仅“沛丰邑中阳里人”一条，即据《元和姓纂》、《新唐书·刘知几传》等书为说，不下百十余言，原原本本，殚见洽闻，他可知矣。为言“拟作《汉书新补注》，补王先谦之未逮”。我说：“王先谦《补注》，实不覆人意，我亦有所订

补。(后来,我写成清稿四册,装订成一函,1988年交与齐鲁书社出版之《汉书古今人表疏证》,即其中一部分。我又尝就两部《唐书·艺文志》作注,有初稿8册,配以花梨木夹板一副。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二稿俱被造反派抢去,至今尚未退还,因是立此存照,以为他日有人侵占我的著作权,预为之图也。)惟是陈先生过分孤芳自赏,千金自享,他所批校的书,从不举以示人。他逝世后,大师兄陈师伏,重庆市凯旋门中学校长也,以为古书无用,随意变卖,直到后来,被一个资本家(据说是金城银行经理)把陈先生全部批校之书,囊括以去,而此两部手批《前汉书补注》就浮沉莫卜了。解放后,我作《盐铁论校注》,汉口徐行可先生闻知,即以其传抄之陈先生《盐铁论校录》见诒,我将全部《校录》收入我的《校注》外,即将徐氏逐录本捐赠与北京图书馆了。在肃反运动中,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师邹潭秋先生,以曾挨鲁迅骂过,把他下放青海。临行前,十分狼狈,拿着陈先生手批并过录有黄季刚先生批语的《广雅疏证》8册(底本为淮南书局重刊本),踵门来向我借路费。他说:“这是你的老师手批的《广雅疏证》,我从陈师伏处得来,希望你把他留下。”我一见惊喜若狂,问他:“缺多少钱?”他说:“至少非300元不办。你能帮助我解决问题,这部书就归你了。”虽然当时300元不是小数,我还是慷慨解囊,满足他的要求。他再三称谢而去。于是,这部余尝称之为“二妙”的宝书,就为寒斋所有,私幸也为保存陈先生遗著,尽了一份力量。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向一些出版社推荐此书,都说:“《广雅疏证》早已影印过,再印,销路定然不好。”拒绝了。陈先生于是书大尾(即《广雅疏证》卷第十下《鸡属》目下)有题记云:

蕲春黄侃季刚精音训之学,读此书颇有匡益,如谓

“兆非讹字”（卷三下）。诗“于穆不似”（当有夺字）（卷五下）“艳即辖异文（卷六）等，皆眇达神旨，欣合无间，因录之于端，以为读是书者助焉。己巳秋八月尊默题。

尊默一作遵默，陈先生名讳也，盖季皋先生与宗鲁先生客居武汉时与季刚先生数相过从之所过录者也，爰附录于此，以见黄、陈二先生于是书批语之价值。闻海峡彼岸，黄门弟子曾以黄先生遗著出版，不知收录及此否。

四川大学同系同班毕业的同学华阳屈守元君的毕业论文为《韩诗外传校注》（即将由巴蜀书社出版），南溪王振荣君为《烛断疏证》，成都廖履中君为《文选理学权舆前贤评论补辑》，崇庆杨永廉君为《世说新语笺证》。毕业后，天各一方，蜀西冀北，相见为难。今则王、廖、杨三君俱已谢世，屈君尝有诗致余：

吟客年年聚此堂，
人日浣花胜帝乡。
看柳沿溪无健足，
寻梅照水触愁肠。
王园昔宴曾参预，
黄公炉在徒生虑。
北燕尚有一王存，
廖杨化去知何处。
五十八年又逢春，
开缄不忍拂封尘。
八十三岁龙踵叟，
尚作数笺伏案人。

开岁七日人始作，
下治黄泉上碧落。
鸡狗横行转眼空，
阴晴六日浑如昨。
落月照梁思故旧，
浮云蔽日无朝莫。
将雏营巢唯见燕，
鸷鸟累百不如鹞。
万卷楮书漫讨论，
徐陈应刘几人存。
广厦万间神建福，
清江一曲地维坤。
不愁吟唱无丝竹，
且令酬酢举陶尊。
一年一度逢此日，
应招高杜两诗魂。

己亥人日草堂作，用高杜二公唱酬韵

藏用兄教正 守元呈稿

王园在工部草堂左近。园主人之女公子与杨永廉君中学同学，后考入四川大学教育系，又与杨君为同年级同学也。当年余与屈守元、王振荣、廖履中、杨永廉、刘承先、樊家英诸君在皇城共读时，通过杨君与园主人商借，乃聚饮于此，倏忽已逾 58 年，屈君感时伤旧，乃用高杜二公唱酬韵而有此作也。屈君现为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己巳（1989）秋，曾以诗代柬寄余所云“何用传灯辨能秀，深惭附翼号渊骞”者也。所撰川大毕业论文《韩诗外传笺疏》，经过积年加工，近始杀青，已由巴蜀书社出版。江汉炳灵，世载

其英，吾道不孤矣。屈君精通《文选》，向师逝世时，在峨眉商量写定向师遗著，即由屈君负责整理向师《文选》手批本工作，其后，屈君有《文选导读》在巴蜀书社出版，自序即云：“有生之年，必为完成先师遗志尽力。”近有《新〈文选〉学刍议》一文，遂录于此，足以见其学之所底也。

“新文选学”这个倡议，是日本神田喜一郎博士提出的。神田博士的著作，我未读到。清水凯夫先生与神田博士这一倡议相呼应，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文选》的论文，对探索《文选》的本质，作了尝试。（见清水凯夫先生《六朝文学论文集》的《前言》，韩基国先生译，重庆出版社出版。）

据1994年2月25日清水先生给我的信说：“您惠赐的巴蜀书社出版的大著《文选导读》已收到，深表感谢！我已迅速地拜读完毕。对先生的高论，我大体上表示赞同之处很多。但是，对《文选》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文选》编纂者之事，我与您的意见都相当的不一致。”清水先生还向我说：“可见从传统的见解的束缚中脱出，是一件至难之事。”从这封信中，我了解到清水先生探索《文选》的本质，原来就是要否定萧统编纂《文选》。以此作为核心的“新文选学”，恕我不敢苟同。我仔细阅读了《六朝文学论文集》中清水先生一系列研究《文选》的论文，聊发八难，谨献疑于清水先生：

一曰：清水先生全面否定萧统编纂《文选》，他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说，“一般在史书中，即使有所谓帝、太子、王撰的记载，实际上也是帝、太子、王只下达编辑的命令，而把编辑委任给臣下。”这个理由，清水先生简直把它作为规律、原则，那就把历史上“帝、太

子、王”著书的可能，全部否定了。我不禁要问清水先生：“三祖陈王，咸蓄盛藻。”（见《宋书·谢灵运传论》）难道他们的作品，都是下达命令，由“徐陈应刘”代为完成？中国人还很有兴趣于另外一个皇帝，那就是南唐后主李煜，难道他那些被称为杰作之词，都是下达命令，由冯延巳、徐鼎臣之辈所完成？清水先生如果承认这些“帝、太子、王”不为你所订的规律所限制，那末，萧统就有理由应当特殊看待了。史称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奖不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3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有也。”（《梁书》《南史》本传并同）萧纲《昭明太子集序》，列举统有“十四德”，其“十三、十四德”云：“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旨要，莫不殚兹闻见，竭彼涕绠，总括奇异，征求逸遗。命谒者之使，置簠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以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借书治本，远记齐攸；一见自书，闻之闾泽。事唯列国，义止通人。未有降贵纡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辩，已亥无违。有识□风，长正鱼鲁。此十四德也。”（此序见影宋淳熙本《昭明太子集》。《常州先哲丛书》所收《昭明太子集》即据此本，《全梁文》所抄录，全与此同。）张溥《百三名家集·昭明太子集题辞》云：“简文序其遗集，颂德十四，合之史传，俱非虚言。”《艺文类聚》卷三十七引何胤《答皇太子启》云：“犹复留神六经，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箴闻。辟承华而延儒雅，扫黄闕而列文学。嘉美事宜，无思不劝。”若谓简文之序已非虚言，则何胤高人，其言更宜征信。岂有如此好学尚文之人，竟把著述大业，付与别人，听其感恩报怨，而不闻不问者

乎？依清水之言，萧统竟似一无主见之贵游子弟，能令人信服乎？这样的太子，我对他主持编纂《文选》信之不疑，难道这就算是“束缚于传统思想”么？我情愿受此“束缚”，自视为濡染于传统文化的人，有捍卫传统文化的责任。我记得在香港与清水先生相遇时，我曾坦白地告诉清水先生，我对于萧统是有感情的。便是这个意思。

二曰：对刘孝绰的论定，清水先生也不公平。刘孝绰的才智，是当代前辈名流，如范云、沈约、任昉等，皆所推崇的。即使当时皇帝萧衍，也对他维护备至。萧统、萧纲、萧绎弟兄，莫不称许。史书只说萧统把自己文集的编辑、撰序的任务交给刘孝绰，并未谈他参与《文选》编纂工作之事。以理推之，萧统一生最大的编书工程是《文选》，吸收刘孝绰参加，原属可能。《文镜秘府论·南集·集论》已云：“至如昭明太子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此当据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但是，必须注意：此举《文选》撰集者，首云“昭明太子萧统”，而在“刘孝绰”之后，又有一个“等”字，并未把《文选》编纂之事，写在刘孝绰一人名下。又日本古抄本《文选序》上标注有云：“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这个材料，本是我告知清水先生的。清水先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守敬遗书中，觅得这个抄本，并以复制本惠赠我一份。如果说我束缚于旧传统，不愿意见到这些新材料，则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我见到这个材料，已有60年了，于我并非“新材料”。我倒认为：这个材料充分证明，《文选》编纂的主持者是萧统，“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说明刘孝绰不过承太子之命而写文章，是在执行太子之命，在萧统这个内行太子面前，刘孝绰是绝对

不敢塞进私货的。这句话，从语法结构上看，主词也是“太子”。何况清水先生也承认这句话的来历，尚待研究。拙著《文选导读》对《文选》编纂问题的结论说：“刘孝绰是萧统的得力助手，这样说没有错；但因此而把《文选》的主编权，从萧统手上夺取给刘孝绰，那就完全错了。”这样的结论，我至今仍坚持不变。清水先生认为萧统只挂空名，刘孝绰才是实际编纂者。言之无据，我不能同意。清水先生更进一步认为“《文选》选文，全凭刘孝绰的爱憎恩怨”，这种论调，全属信口无据之谈，连具有才智之名的刘孝绰也全毁掉了，我实在不能接受。

三曰：清水先生为了证明他的说法，即《文选》的实际编纂者是刘孝绰，而刘孝绰编纂《文选》，既不顾萧统所订立的选录标准，也不分作品优劣，惟以感恩报怨作为入选与否的原则。他特选了齐梁作品任昉的《刘先生夫人墓志铭》、刘峻的《广绝交论》、王巾的《头陀寺碑文》三篇，作为例证，费尽心思，千方罗织，定下了刘孝绰在《文选》编纂中塞进私货的罪名。今略举数例，说明清水不顾事实，全凭臆断之处。清水先生认为墓志铭必须先叙世系、名字、爵里等等，是散文；然后才是“辞曰”以下是押韵之文。今此《墓志铭》只有96字的韵语铭辞，这是“破例”，以“破例”之文入选，是刘孝绰别有用心。清水先生为了罗织刘孝绰之罪，真不顾一切。墓志铭之例，一般信奉的有黄宗羲的《金石要例》。未必清水先生连这样普通流行之书也未见到？《金石要例》即有《单铭例》一项，并说：“事即在铭语中。”又举韩愈《房使君郑夫人殡表》、《大理评事胡君墓志铭》、《卢浑墓志铭》为例。怎么说任昉此文只有单铭为“破例”呢？《全梁文》所载墓志铭共有63篇，有序（即散

文)者只有4篇,4篇中徐勉的《永阳昭王墓志铭》和《永阳太妃墓志铭》都是长文,不能埋在墓内,实是碑文,并非墓志。这些只有铭辞的墓志铭,包括萧纲写的《仪同徐勉墓志铭》、萧绎写的《黄门侍郎刘孝绰墓志铭》,足见梁代写墓志铭,以单铭为正体,有序者翻为“破例”,清水先生随意指责任昉之文为“破例”,不过欲罗织刘孝绰塞进私货之罪名,竟置梁人写墓志铭常例于不顾,非主观而何?至于这篇铭文入选,清水先生竟认为刘焯夫人王氏,籍属琅邪,与孝绰母同宗。这也近于谈笑。在六朝时代,琅邪之王,多于董泽之蒲,渤澥之鸟,刘孝绰之母为琅邪王氏,有何证明其与王法施(刘焯夫人之父)有瓜葛?且刘焯之德,天下共仰。夫人王氏不得阿姑之意,不过为椽壁落尘。比之蒸梨不熟,事更轻微。刘焯之痛,过于曾参,而与焦仲卿相似。任昉此《墓志铭》,开头便说:“既称莱妇,亦曰鸿妻。复有令德,一与之齐。”以刘焯之令德,颂王氏之美行,文章得体,实为佳制,安得谓此亦为刘孝绰塞进私货?且铭文末云:“暂启荒埏,长扃幽垆。”发冢合葬,志铭既已交代清楚。李善注云:“萧子显《齐书》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刘焯卒之后,王氏宗合之。”合葬之事,李注此铭辞,已解释得很明白。清水先生竟谓本不合葬,不过任昉写此辞为王氏恢复名誉而已。随意想像,竟乃如此!刘焯有放翁禹迹之感,容甫沟水之叹,而清水先生不为彦升此举称善,反欲为焦母槌床之怒张目,但求罗织孝绰徇私之罪,何以不思,至于如此!

四曰:刘峻《广绝交论》,亟叹世途之艰,本是一篇讽世杂文,李兆洛《骈体文抄》卷二十评此文云:“以刻酷抒其愤捷,真是状难状之情,《送穷》、《乞巧》,皆其

支流也。”刘峻此文，选入《文选》，从来没有人说此为选者挟嫌塞入之私货。而清水先生为了攻击刘孝绰在《文选》编辑上专擅取舍之权，竟置刘峻此篇代表作品之优劣于不顾，谓此文入选，全出刘孝绰私意。我曾举《辩命论》亦入选，那篇文章明言与萧衍之论作对，难道刘孝绰竟敢专意选入这样的文章，以攻击萧衍吗？《梁书》（卷十四）、《南史》（卷五十九）的《任昉传》，都载入这篇文章，难道姚思廉、李延寿也与萧氏兄弟有仇，才故意采入这篇文章吗？清水先生抓住刘、萧交恶一点，把《文选》选此佳文，亦列为私货，能使人相信么？

五曰：王巾《头陀寺碑文》，本是《文选》碑文中一篇出色之作，清水先生曲折迂回，一定要把它说成刘孝绰之所塞入。南北朝时代，佛教遍及南北，为佛寺撰文，莫不极精研思。而佛寺之碑，照例歌颂营建佛寺之人。庾信自南入北，独称温子升《韩陵山寺碑》，谓“唯有韩陵片石堪共语”、“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朝野僉载》卷六）。他向温碑作了这样高的评价。今温子升《寒陵山寺碑》载在《艺文类聚》卷七十七，我们犹可检读。这篇碑几乎全文都在歌颂建寺之人高欢（渤海王，即北齐神武皇帝）。与王巾之碑比较，对刘暄只提几句者大不相同。清水先生竟劳神苦思，谓王巾此碑，乃为刘暄翻案。原文俱在，王巾此文，究竟有多少句提到刘暄建寺以外的政治上其他事状？总得容许大家研究，拿来与《寒陵山寺碑》比较，优劣异同，无庸多说。更奇怪的是，清水先生竟把刘暄拉来与刘孝绰的父亲刘绘成为同宗同辈。他的依据是刘绘字士章，而刘暄字士穆。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论排行，是用名，与表德之字毫不相干。清水先生还列数刘孝绰的伯父刘俊字士操，叔父刘璩字士

温，认为由此“可以推定是相当亲近的同族”（《论文集》页22）。清水先生是熟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家，难道从魏以来一般表德之字喜用“士”字都忘记了吗？《三国志》中以“士”为字的有11人；《晋书》中以“士”为字的有29人；南朝五史（《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中以“士”为字的有46人；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北史》）中以“士”为字的有64人；《世说新语》中以“士”为字的有16人。最近大家看《三国演义》电视，征蜀二将，钟会字士季、邓艾字士载；与卧龙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字士元。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清水先生竟置此民俗于不顾，一定要把刘暄字士穆，拉来与字“士章”的刘绘列为同宗同辈，给刘孝绰定下塞私货进《文选》的罪名！《头陀寺碑文》是六朝有数的好文章，而清水先生竟用“文体冗长，过分讲究修饰，大部分内容不值得一读，没有个性”等简单粗暴的几句话，把它否定了。《头陀寺碑文》竟遭如此否定，齐梁还有什么文章呢？梁章钜、胡绍焅引《高僧传》，本用以说明“简栖于宗教究心已久，宜此作之精诣”。而在清水先生眼中，王巾乃成为《高僧传》所批评否定的人物了。昭明选王巾之文，其人事迹，仅见于《姓氏英贤传》，可知其并非显贵之流。《姓氏英贤传》出于姓氏专家贾执之手，其言可以信赖。（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七，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二。）而清水先生何竟若此！

六曰：萧统除编纂《英华》、《正序》、《文选》之外，还搜集、整理了《陶渊明集》，萧梁敌国北齐宰相阳休之也因袭这个本子，加上了《五孝传》、《四八目》（即《圣贤群辅录》），成为今传《陶渊明集》的定本（陶澍辑注

本名《靖节先生集》)。阳休之还作题记，明确地称萧统所编之本“编录有体，次第可寻”。这是清水先生也未敢否定的事实。试想：萧统自己的集子，也交付刘孝绰编辑、作序。此事他不隐讳，何以编《陶集》他又亲自动手，并为之作《序》、作《传》？由此可以从侧面证明：萧统编纂《文选》，绝不会只挂空名，让刘孝绰作弊徇私。清水先生对于《文选》，便使用“帝、太子、王”编书只下达命令的原则；而对于萧统编《陶渊明集》，却自己取消自己所订的这个原则，是否明知有阳休之的铁证，他所订的原则，绝对行不通，偷偷地把它取消了呢？如此矛盾自陷，只能堕入于主观臆断的实用主义之中，非科学研究之道。

七曰：萧统编纂《文选》，不仅《梁书》、《南史》本传明白记载，而且《隋书·经籍志》以下史志及公私书目著录，莫不皆然。非特此也，寻治《文选》之学，最早为《文选》作音的，即是萧统的从父兄弟之子，即他的侄儿萧该。萧该当为追随萧绎在襄阳的萧修之子（见拙著《文选导读》页46）。是《文选》早已流传到萧绎那里，为萧氏兄弟子姓所承认是萧统之作。不然，萧该何以把它尊奉来与《汉书》等齐，为之作音。萧绎是很佩服萧统的文章学识的，这在萧统生前，他便向萧统索求《文集》及《文章英华》（见拙著《文选导读》页40）可以证明。所以《文选》成书，很快在萧绎统治的襄阳地区流传，这是很合乎情理的。《文选》得到萧绎的尊重，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因为它是萧统亲自编纂的。萧绎很厌恶那些贵族（即清水先生所说的“帝、太子、王”）挂名著书。他的《金楼子·自序》说：“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但是他向萧统求《英华》，并

让萧该作《文选音》，这就充分证明：萧统编纂之书，都是亲自料理，不是只挂空名。《英华》犹且如此，何况《文选》乎？萧统卒后 200 年（唐开元十九年，731 年），萧统的第七代孙萧嵩，在唐代做了中书令（即宰相），自称《文选》“是先代旧业”，准备在集贤院组织班子，从事注释（见拙著《文选导读》页 76—77）。这项工程，虽没有成就，但是萧嵩把《文选》看做“先代旧业”，这充分说明《文选》确实出于萧统编辑。200 年后，他的直系子孙，还没有放弃这个知识产业的继承权呢！这些材料，可以彻底驳倒清水先生只挂空名之说，不知清水先生考虑及此否？

八曰：清水先生据《颜氏家训·文章篇》谓刘孝绰撰《诗苑》，止取何逊两篇，因此断定《诗苑》即萧统的《古今诗苑英华》之省称，以此证明萧统编纂之书，皆只挂空名。此又一毫无证据之臆说也。寻《南史》称萧统集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30 卷，《梁书》则称统撰《文章英华》30 卷。是《英华集》为两种，其省称皆宜称“英华”，不得云“诗苑”。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即云：“往年因暇，搜采《英华》。”未尝以《诗苑》为省称，此说明刘孝绰集《诗苑》，另是一书，不与萧统《诗苑英华》相干。《隋志》著录孔道辑有《文苑》，安知孝绰不效之而辑《诗苑》乎？清水先生之言，实无根据之附会也。至于《文选》不选何逊之作，在今人言之，或可云漏略，然在萧统当时，则何逊并非必须入选之才。其文笔如《代衡山侯与妇书》，后人选骈体文，以为佳品（如《骈体文抄》、《六朝文絮》等），然其文侧艳，萧统不选，实为适宜。其诗虽不少，然风范不出谢朓。钟嵘卒在何逊之后（钟嵘之卒，据曹旭先生推定在

天监十七年，518年，比何逊卒年为晚），《诗品》无何逊之名，则何逊未为当时推重，不仅《文选》不选其作而已。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上下数千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必于总集，求全求备，此脱离历史条件，苛求古人之为也。《文选》不取何逊之作，古人言者多矣，然未闻有如清水先生所指，出于刘孝绰捣鬼之说也。

上发八难，聊示一隅。揜摭利病，埤闻良说。窃谓若以否定萧统编纂《文选》为“新文选学”核心，则萧统此人选文徒挂虚名，实为不学，纵容刘孝绰，实为昏愆。刘孝绰但知恩怨，不辨美恶，实乃小人之行，何得称为才士？《文选》乃寻隙报恩之书，恶同秽史，衅比谤书。1400年来所谓有“文选学”者，皆非事校雠，行同济恶。《文选》及一切“文选学”之书，只宜付之嬴政一炬而已。

“文选学”之名，本立自曹宪，萧该、曹宪之书，以音义为事。浮声切响，通流调利，本为《文选》选文之要害，萧曹始建此学，即注意于斯，实为碧海掣鲸之业。及传之崇贤，兼释事义，五臣、善经而后，又立意于通俗。及至宋元、雕版幸兴，集注、续补之风，行于坊肆。明人比之墨卷，清儒通于朴学。凡此变迁，咸可谓之“新文选学”。然以朱明之凭臆衡量，比之李唐之识字正读，其于《文选》，为进步抑为倒退，实犹当有待于评估。然则所谓“新”者，非必皆能超越前人也。今谓研究《文选》，所宜提倡者乃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谓之“科学的文选学”，其名优于“新文选学”，辜较可知。许逸民先生《再论“选学”的课题》（载《文选学论集》，长春文艺出版社出版），私意以为今日研究“选学”，所宜

参考。

我先师向宗鲁先生于《文选》一书，几乎全能背诵，并有志于全部爬梳整理李注。拙著《文选导读》自序中言：“有生之年，必为完成先师遗志尽力。”从事《文选》教学 60 年来，未能整理李注，日有遗憾 200 余页。

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吾于清水先生之勇于和过去绝决，实为欣赏，且为在“新文选学”问题上中日两国学人取得共识，而有“吾道东矣”之感也。

至于同系而不是同班同学，卓有树立者，有若成都大学副校长钟树梁教授，全国人民代表也，尤擅诗词，常有新作在国内有影响的诗词刊物发表。尝与余奉和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赠诗，已见《从对对子学起》，今更录其与余有关者：

金缕曲

祝贺王利器、廖德蓉贤伉俪金婚之庆

共祝金婚喜，
献诗章，
国风新咏，
人伦盛事。
五十八年同栖鸟
辛苦育成数子。
更光焰腾腾六艺。
用志不分勤朱墨，
正劳伊、井臼长操理。
海有畔，
情无际。

双丝网结千千万。（王君所著书逾千万字，世以千万富翁称之。）

定多少，嘘寒问暖，
迟眠早起。
不必秦徐酬唱乐，
自得闺房福慧。
应写出长编婚史。
耐雪堂中梅依竹，
似当时比翼春朝裹。
堪颂祷，
足矜式。

《CHINA DAILY》Monday, July, 17, 1989 第6版 life/People
以 Understanding bonds old pair 标题介绍余夫妇结婚60年
来相依为命的生活，亦为金婚纪念而作也。

钟树梁学长又有：

戊辰初秋日中友好汉诗访华团来成都，中日诗友雅集杜甫草堂

万里蓬瀛一叶舟，
百花潭上暑初收。
草堂觞咏留佳话，
蜀国山川正好秋。
从古骚人怀蕙茝，
前朝文镜重琳璆。
爱心相感诗心美，
陆海琴声和以柔。

（文镜谓公元第9世纪时日本弘法大师之巨著《文镜秘府论》，吾华当代王利器先生著有《文镜秘府论校注》。）

钟君所作诗词，已逾千首，尝为余言“即将集成付梓也”。

成都大学又有白敦仁教授，曾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华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任华西大学中文系助教，波

兰华沙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特聘讲师，后任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现已退休。著有《陈与义年谱》、《陈与义集校笺》（俱巴蜀书社出版）。其《陈与义年谱》颇为时贤推重，钱钟书《与白敦仁书》云：

《简斋年谱》，采掘之博，考索之精，绝无仅有。名世寿世，乃意中事。问世稍稽，犹大贵人赴筵，名角儿出场，必姗姗迟耳。

……

《简斋年谱》发表，近世之奇作，当与天下学人共读之。（《白敦仁教授执教50年志庆》）

白公尚有《巢经巢诗集笺注》、《杨升庵评点〈草堂诗馀〉详校》、《宋诗略论》等。其作《巢经巢诗集笺注》也，则曾到作者故乡遵义沙滩进行实地考查，孳孳不怠，诚郑氏之功臣矣。而其为时人所颂赞者，则为由一己斥赏刊行庞石帚先生之《养晴室遗集》，白公在《后记》里写道：

恭维先生之道德、学问、文章，俨若峨眉之秀出西极，管窥所到，不及一隅。惟是摩挲遗墨，则神理绵绵，其意气相倾山可移之概，尚依稀捧手问业时。深惟弩钝，不足以发潜德之幽光，其有负于吾师者，非浅鲜矣！……
1994年3月，弟子白敦仁记于成都大学。

又云：

余编次《养晴室遗集》15卷既成，而时下出书不易，限于绵力，又不能刊印全书，仅先将诗、词共6卷，并

为一集，先为印出。其杂著以下9卷皆学术论著，拟别为一书，题曰《养晴室外集》，姑藏篋衍，容更图之。1995年1月，敦仁又记。

白公于1996年1月26日惠书云：

《养晴室遗集》印出后，理当即时寄呈，惟因错讹太多，拟印一勘误表，而勘误表印出后，又须进行勘误！辗转拖延，以至于今，希鉴及也。去年（1995）为石帚师百年冥诞，弟编印此书，私意实欲广其传播。惟限于财力，仅印得500本，又因无书号，邮寄较难，未能多寄。尊处如有所需，望来信告行数目，当设法寄上也。（500本早已分送此间同学，弟手边尚余数十部。）

奉读白公手札及所赠《养晴室遗集》，深感白公之高义薄云天，而叹美其立行为不可企及矣。往者，庞师哭向师词有云：“礼堂谁写。”及余与屈守元君整理向师遗著陆续出版之后，曾引荀息之言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以自宽慰。今以为仍可引此言，以题此事，诚以后先一揆也。《后记》有云：“大氏遗集之成，其搜访遗佚，则多得于守元、文才，至于商榷体例，辨白疑难，则仲鏞所助尤多。”文才，谓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王文才教授也，著有《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养晴室遗集》卷六《答王文才论王荆公》：

论荆公新法一札，收到已久，因打杂事太多，疲于奔命，不及把笔，想能相谅。郭沫若《历史人物》荆公一篇最为粗疏（他篇皆好一些），较之梁著《荆公传》相

去甚远。可以断言，全无贡献。（郭全不提梁，确有问题。鲁迅论隐有心照不能不宣之说，其实也有要人心照而不必要人宣处。今且依汉人之说“非所宜言”，带住。）梁著则利用李巨来、蔡元凤诸君著述，加之驰骋，故能头头是道。然亦多论动机出于善良愿望而已，其效果之糟糕，不可掩也。大抵新法施行以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确是增加不少。《宋志》、《通考》诸书皆可查（利于君主之国，不利于民）。至新法是否代表中小地主，亦似难言。青苗散钱，无所用之，仍可转借下户，多取大利。所以反对者有兼并愈甚之说。助役收钱，单丁女户（缺乏劳动力之小所有者）向来免役者，今皆勒令出钱（官户虽出钱，比民户减半）。南北情形亦有不同，雇与差各有所宜（要仔细查考南北客户多少），亦难以一概论。大抵稍加变通，则雇善于差。故范尧夫、苏子瞻皆力主之，而温公不欲，因此逐子瞻（颍滨语），则当时争辩激烈可知（郭谓子瞻无定见，只是浪漫文人，此瞎说也）。然径谓温公为代表大地主阶级，亦苦无确据（实在无确据）。反之，反对免役者且谓“上户则便，下户则难”。此又何说耶？谓新法代表中小地主，仍是风影之谈，总之没有历史确切证据也。（新法所裁减宫廷费用为最善，然亦见神宗之明，非可专归美于荆公。宋人谓寇莱公不学无术，荆公似可谓有学无术，其人格无一毫可议。而朱晦翁遂欲以此压倒苏子瞻，我又不平。晦翁立场亦决非人民立场，可断言也。）吾更有致疑于荆公者，往者，范希文之变政，开罪于官僚地主，终无成功。荆公执政，更增加许多冗官，又增加吏禄（曾子固即甚非之），是否避免希文覆辙（此点请一思考，对于认识荆公立场，似有帮助）。熙宁元年十一月郊，执政因旱乞勿赐金帛，温公谓救灾节用，

当自贵近始，主听之。而荆公乃谓“大官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只因无善理财之人”。此则故为高论。郊费虚文浪费，并非禄也，何不可辞？当时大官僚偶有善意节用，而荆公则必欲反之。神宗论汉武多欲，荆公则谓欲亦不能害政，则举齐桓公之霸为说。神宗称汉文言“朕为天下守财”，荆公则谓人主能以尧舜之政泽其政，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此类高调，幸其对象为较高明之皇帝，然已觉其流弊无穷。当时刘贡父与荆公书即痛切云：“人臣纳说于时君，劝以恭俭小心，逆耳难从。及至劝其为利，取财于民，广肆志意，不待辞之毕而喜矣。”（见《彭城集》）于此更忆及子瞻之《荀卿论》，真乃药石之言。更忆后来蔡京之于徽宗，以官爵笼络众人，以奢侈迎合昏主，则更使人感慨不已。（真是感慨不已。高调易唱而难收，荆公多活二三十年，不知如何，恐不但恨福建子而已。这里又想起《水浒传》，所谓人民意识反映也，拿话来说。）而京则自附荆公之意，宋人怨蔡京，则不能不追咎荆公。温公之死，民皆巷哭，画像以祀，饮食必祝，此民不皆为大地主也。“儿童知君实，走卒诵司马”（东坡《独乐园诗》），此等更非地主也。荆公对于值得团结的有能力的善良分子，一概谢绝，而专与投机之地主官僚谋国。（蔡京是大地主不待言。章子厚在苏州勒买民田，近读刘元城集乃知。）理财则不反浪费，边防则主张弃地，若非此则无以见其高且大者，真可怪也。论荆公者以陆象山为最持平（《荆文公祠堂记》），李穆堂、蔡上翔则为了同乡，梁任公则为了变法，皆不免夸张失实，而郭先生《历史人物》荆公一篇则最疏最无力。近日苦无检书之暇，若得《会要》及《通检长编》一看，必多有发现也。灯

下写此，忙忙不可言。

又《与王文才论学小简》之一：

周一良论诸葛亮，穷极锻炼，而误读张俨语（引张俨所驳者以为俨）。又论南征事以为夸大，以“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反”为《通鉴》妄加，而不知出于《襄阳记》（《马谡传注》）。此等尚多，皆不能无腹诽，惜无暇检书并执笔也。周论诸葛，徒拾崔浩、吕温牙慧。太炎《检论》有《思葛篇》，使周一读，则不滞于“正统思想”、“北伐意义”诸说矣。

之二：

《青泥莲花记》引东坡帖云云。按此帖见《津逮》本《东坡题跋》卷六，眉州本《东坡集》卷六十八亦载之。所云“王十六者”，名箴字元直，青神人，东坡妻同安君弟，通义君堂弟。此帖盖偶写以贻元直者。

之三：

承示升庵诗题《犯星歌》系用杜诗，此解确切之至。因杜有此语，遂以为蛮歌之名。意者，升庵以为亦犹吴歌名《子夜》、楚歌名《鸡头》之类欤？

余尝读赵少咸先生《跋答周菊吾论李易安书》云：“石帚先生读书博，识力高，作诗词功力尤深。”（《养晴室遗集》卷六）此一时学术界之公言也。今若庞师答王文才诸书观之，是

则有如《学记》所言“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也。又白公提及之仲镛，谓四川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王仲镛教授也。仲镛毕业于华西大学中文系，长年从石帚先生游，著有《唐诗纪事笺注》（巴蜀书社出版），颇为士林所重。《养晴室遗集》卷六有《与王仲镛书》（己卯）：

仲镛仁弟：

得7月8日留札，具悉一是。夷狄忧患，纷然并乘，蹙蹙四方，恐无安枕处矣。川大诸公，偕上峨眉，少滨先生亦无还蜀之意。华大下年，实难厝置，故下走于放假前，即屢为学校当局言之。且谓如无办法，则鄙人惟有知难而退，终不厚颜敷衍，以误人学业也。又川大方面，仙樵诸人亦再三致意，欲使同上峨眉，以为华大既无可为，而深山比较安全，其说亦非不切至，但华大叔轩先生又坚相挽留。顾念峨眉亦未必即是桃源，而雾湿特甚，其于贱体，尤非所宜。事将奈何，实不知所出也。近又小病，旬日不曾出城，昨乃自力一往南台，与叔轩商谈甚久。渠意少滨不还，即转延闻君在宥。再于川大方面，或其他远地名宿再聘一人。所余不过数小时，则与金大、齐大合作。金大胡翔冬，齐大有顾颉刚、马宗芑诸人，如是部署，自可支持，遂令鄙人无可推委。顷须发函坚邀宗鲁先生，或当得其一诺。方面多自以此公为最好，但川大亦挽之至紧，早下聘矣。今就大局及私交固请之，或有希望。当更得朋友公劝其来，尚未敢决定耳。至本系助教一席，震川业有他就，求诸同学，自以吾弟为最相宜。盖助教人选，必得学行为师友所敬，而又性乐恬静者。身在学校，亦有读书讲贯之乐。以吾弟生

平志业，必不汲汲于时俗之荣利，今特以此相属。稍缓一二日，即促校方致送聘书也。专此即颂文祺。俊顿首。

7月12日

曩者，余接得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周虚白教授自南充惠赠《周虚白诗选》一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其序文即出仲镛手，曰：

虚白早年即耽吟咏，入中学时，綦江庞石帚先生（俊）以诗受知于荣县赵尧生先生（熙），方与华阳林山腴先生（思进）同教大庠，三先生者，皆有海内重名，当世论家所称西蜀诗派之弁冕也。虚白尝奉平昔诗作，上书庞先生请益，为先生所赏，复书娓娓千余言。谕以为诗之旨，学诗之法，而于时流之倡用白话，以欧化为新诗，排斥旧体，则明辨其非。以为：“学术可以大通，而文章各有面目。情感无妨共喻，而形貌不得齐同。”（《与周虚白论诗书》，见《养晴室遗集》）由今观之，斯实闳通之论也。夫所谓旧体者，导源于《诗经》四言，进而有《楚辞》骚体，由是发展为汉魏六朝五、七言，而古、近、律、绝，则大备于唐世。及词、曲继兴，而诗体不废，名篇、作者，代有所传。此乃千百年来吾国固有之民族传统文艺形式，其音韵格律，辞章对偶，最能发挥单音汉字之特长，是以通读则琅琅上口，歌咏则抑扬应节，实为人类语言艺术一大奇迹。故自“五四”以后，70余年来，排斥者固已不遗余力，而好之者，犹绵绵不绝，且日以浸多。其于抒发情志，陶冶性灵，昭美善而斥丑恶，有裨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之功，宜可与新诗殊途而同趋，亦已彰彰著明矣。

由是观之，则不仅学术界有蜀学之称，即文学界亦有西蜀诗派之说，而西蜀诗派对于新诗之评价，实可为新诗发展之借鉴也。《周虚白诗选》页100有《答白敦仁兄为石帚师辑集书竟并系以诗》：

独堪杖履苦钩沉，
七宝庄严到碎金。
笔重无端零泪渍，
稿残索补腐心深。
携持至性乘平运，
俯仰真传足友箴。
同饮浦江怀叔本，
事师风教感难禁。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见《后汉书·儒林·任末传》。末于师友风道最高，卒因奔师丧死于道，临命犹教兄子曰：“必致我尸于师门。”）

有以见白公访求庞师诗词之勤矣。又页104有《藏用撰述盛暑不休并屡以新著见饷谨此奉答》：

怀君自数失绸缪，
三载平安无字求。
幸起齐眉传妇病，
岂徒善读为儿谋。
成编似壁围长夏，
万灶无烟坐一楼。
出没都门大不易，
人难缓步独清游。

每读“出没都门大不易，人难缓步独清游”之句，未尝不喟

然叹曰：“周公可谓知我矣。”

余于庞师，从游之日浅，溯自离皇城，上峨眉，下李庄，最后乃出夔门，蜀西燕北，山川修阻，不得奉手请业者近半个世纪。今读《养晴室遗集》所载与诸同学书，何异亲承音旨，尤以卷六《与周巨卿书》（己未）：

吾辈之才，当为学者，不可使人以名士派之恶溢加之。

何其与在皇城时教诲吾侪之言之相似也。同卷《与王利器笺》：

藏用足下：

承以范著《通史简编》宋代之部所用“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二语所出为问。忆此二语见于《二十二史劄记·宋制禄之厚》条。但不知瓠北是概括宋人之言，或原系宋人成语，则不敢定。宋世自范仲淹、司马光、苏氏兄弟似皆有此论。（其余尚多。）温公奏议如《论财利疏》、《论遗留物劄子》等说此尤为明显也。顷无暇检书，年来老病，但亦甚忙。出版社所委托，何日始能完成，真不敢自必。足下近况如何？此间诸友，每见辄以为问，有暇示及为幸。庞俊。

8月2日

读此笺，多谢庞师之诲人不倦，不遗在远；而尤感其对门人之远客他乡，念念不忘也。所云“出版社所委托”一事，此当时邀请庞师承担《宋文选》，与邀请钱钟书承担《宋诗选》同时进行者也。《遗集》卷六有《跋晁刻〈古文尚书〉》云：

晁氏所刻《古文尚书》残石，一《禹贡》，二《多士》，各存30余字，今归郫县陈君仰之（达高），庚辰之秋，仰之以拓本贻余。时友人巴县向君宗鲁（承周）方客峨眉，即以寄之。其后宗鲁以贻江津王君藏用（利器）。斯刻源流，藏用考之详矣。仰之云：“二石乃成都拆毁南城时，拾之死灰残骸中。”按《成都记》云：“《古文尚书》晁公武所刻。胡元质宗愈作堂以贮之，名石经堂，在府学。”寻陆放翁《剑南诗稿》卷八有《访杨先辈不遇因至石室》诗，其末云：“出门还悄悄，列屋打碑声。”自注云：“墙东即石经堂。”据此知此石经堂，此刻本与诸经并列堂中，即今之石室中学矣。其地密通南城，不逾百步，宜其得之。至如隶古之名，子止序云：“科斗既不复见，其为隶古定，此实一耳。”其《读书志》云：“以隶为籀，故谓隶古，盖谓就古文而以隶写之（此说与《经典释文》《尚书疏》同）。”其所刻者即汉唐相传之旧本也。而放翁《老学庵笔记》（卷三）有云：“孔安国《尚书序》言无（当作为）隶古定，更以竹简为之，隶为隶书，古为科斗。盖前一简作科斗，后一简作隶书释之，以便诵读。近有善隶者，辄自谓所书为隶古，可笑也。”此则隶古之义，晁谓即字而易其体，陆谓异简而别为书。晁陆本通家世亲，相与雅故。放翁《渭南文集》卷十八《景迂先生祠堂记》云：“某于公为弥甥。”又《老学庵笔记》卷七云：“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陆两家本系老亲，故笔记多言晁氏事也。）子止所刻，放翁不容不见。且刻在乾道庚寅，是年放翁适已入蜀。（详见赵翼《陆放翁年谱》。）其后又有至石室诗，则此刻为放翁稔知，而其说如此，固不以为隶古本也。故知古文传世，盖有多族。子止序云：“作《石经考异》之余，因得此古

文全篇于学官。”明谓帅蜀以后，乃得之于成都学官，则此本未必即其守荣州时著录之本也。方南渡播迁，中原云扰，而蜀独完。公私所藏，恒多秘逸。观李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引，辄云蜀中士大夫所藏某书。文献渊源，于是乎在，何其盛也。子止承昭德七世之传，嗜奇好古。观游钧谓其平生著书，有《易、诗、书、春、秋、解》，考其异同甚详。证以《宋史·艺文志》所著有《易诂训传》十八卷，《尚书诂训传》四十六卷，《毛诗诂训传》二十卷，《中庸大传》一卷，《春秋诂训传》三十卷。说经铿铿，足知微尚。至其生平仕履，海宁钱保塘辑《涪州石鱼题后记》尝考其略（见会稽章氏重刻艺芸精舍藏衢本《郡斋读书志》）。今检《老学庵笔记》卷九有一事云：“蜀人谓中原人为虜子，东坡诗‘久客厌虜僕’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为虜官。晁子止为三荣守，民有讼资官县尉者，曰：‘县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为穷治之，果负冤。民既得直，拜谢而去。子止笑谕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谓虜官不通民情。’闻者皆笑。”此虽嗾噓之谈，亦见为政风流，斯之乐易，异乎岳倦翁之贪酷罔民者矣。（详见《宋史》四百二十四《徐鹿卿传》，四百五《袁甫传》。）《笔记》又谓：“荆公《字说》余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谈《字说》，至暮不杂他语，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知其被服儒雅，而天性嗜奇，宜乎有古文之刻也。

案：庞师举晁氏刻《古文尚书》与其好王安石《字说》为嗜奇，固已；惟所引《成都记》云：“《古文尚书》晁公武所刻。胡元质宗愈作堂以贮之，名石经堂，在府学。”语欠分明。寻

《蜀中广记》引《成都记》：

蜀孟昶有国，其相毋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传》凡十经于石，石凡千数，尽依太和旧本，历八乃成。《公》、《谷》，则有宋田元均补刻，《古文尚书》则晁公武所补也。胡元质作堂以贮之，名石经堂。

则石经堂主要为孟蜀《石经》而作，其宋人所刻之《公》、《谷》二传及晁氏《古文尚书》则附入者耳。孟蜀《石经》多，故列屋以陈之；依太和旧本，颇为世人所重，故有打碑者焉。今传世有《孟蜀石经》拓片，而晁氏《古文尚书》无闻焉，其故可知矣。《跋晁刻〈古文尚书〉》又写道：

而放翁《老学庵笔记》卷三有云：“孔安国《尚书序》言无（当做为）隶古定，更以竹简为之，隶为隶书，古为科斗。盖前一简作科斗，后一简作隶书释之，以便诵读。近有善隶者，辄自谓所书为隶古，可笑也。（句读依《遗集》本。）”

寻孔安国《尚书序》：

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是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

孔安国《尚书序》如此，其“隶为隶书”云云，乃陆放翁之言，整理者未尝取《尚书正义》检视，竟认为皆孔安国之言，非矣。且由所谓“盖一简作科斗，后一简作隶书释之”，此盖

据北宋汴学篆隶二体石经（一行篆书，一行隶书）而为此意必之言，于此，有以见放翁未尝得见一字三体之《魏石经》，即晁氏《古文尚书》石刻，盖亦未尝经眼也。吁可怪矣。

先是，余随川大上峨眉。有一天，向师以拓片二纸告余曰：“陈仰之以不知为何等石刻，求为鉴定。”余审视之，曰：“此晁公武《古文尚书》石刻也。向闻其名，今乃出土，一重大公案也。”向师曰：“试为文论证之。”以忙于写毕业论文，未暇属笔。其后，余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乃携此拓片至李庄，撰就较长之跋文，而向师已谢世，乃以之奉手请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诸先生，自傅斯年、董作宾……诸先生，及客居之王献唐先生，咸有题识，而陈槃先生且发为七言古诗以咏叹之，以为前所未闻者也。其后，余应召至川大文科研究所任职，即以此跋文求教于川大诸先生。庞师见余跋文，当在是时。林山腴先生且以朱笔有所润色。其后，余应北大之聘飞来北平，未开课之前，颇多暇日，乃应北平图书馆长王重民先生之约，整理该馆所藏敦煌卷子（含原卷及照片），亦颇有一得之愚。略言之，如斯·二七二九背记，起《周南·关雎第一》迄《唐风·蟋蟀第十》，存百二十九行，余定为《毛诗述义》；又如伯·二五一八陈宽撰《二十五等人图》，以上五等人中“圣人”与“真人”易位，而明其为《文子》之持道家言与《人图》之采儒家言之故，并据《唐文粹》与《全唐文》而考得陈宽爵里；又如伯·二七三五号定为《十二时颂》，而不从《敦煌掇琐》上辑三五号标题拟《太子十二时》之说；又如《阴保山等牒》，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二辑卷二，举元人姚燧《牧庵集》以说之，嫌其以后证前，乃别据《周礼·地官·司市》郑玄注，贾公彦疏及黄庭坚《宋黄文节公文集别集》第十一《杂论》之言以实之；又有无头会尾之残卷，而定为《百法名门论义疏》，以及

本为一卷而被分割为二，一在伯目，一在斯目，乃合而为一，俾得首尾完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间尝与王重民先生谈及我有晁公武《古文尚书》石刻拓片二幅，并写有长跋以贻之。王重民大为惊异，希望我将此拓片及跋文捐献与北平图书馆，当妥为保存。余应其请，即以之亲手送交金石拓片部。继而，我觉得这篇跋文应录副以存，即去与金石拓片部负责人商量，继乃告以查无此件。我当时心头冷了半截，对面乾没，无比愤慨，今仅存庞师“斯刻源流，藏用考之详矣”的赞辞而已。

庞师《养晴室笔记》有《书赵谗》写道：

亡友巴县向宗鲁（承周）先生有《书赵谗事》一篇。考赵谗事甚悉。余又别有所考，今合并为一文。录之于此。宗鲁原文云：“渝州之改名恭州也，以赵谗故。《宋史·徽宗纪》云：‘崇宁元年六月壬子，改渝州为恭州。’（又见《地理志》）《輿地广证》及《輿地纪胜》引《宋会要》，皆载崇宁改名事，而不言改名之由。《宋史·奸臣·曾布传》云：‘布尝荐学官赵谗而谗叛，责散官衡州安置。’又不详赵谗始末。王仲言特详其事，《挥麈后录》卷七云：‘隆兴改元岁，明清在会稽，因为友人言先人初为曾氏婿，尝于外家手节《曾文肃公日录》，有庚辰岁在相位日一帙真迹。’外家后来失去，见于外祖曾空青公《三朝正论后叙》矣，先人节本偶存焉。其中一则记赵谗事，谗弟恢于渝州所居柱上题云：‘隆兴二年天章阁待制荆湖南北路安抚使。’再题云：‘隆兴三年随军机宜李时雍随行。’谗不轨事发，凿取其柱赴制勘所，具奏其所题之意。恢坐此亦死。如此则隆兴之号，岂可犯耶？友人云：‘愿借一观。遂以假之。亟取元本送似当途者，继即开陈，遂

改乾道之号。友人由此乃晋用。然先人手泽不可复取，而此书不传于世久矣。友人后登从班，交往既厚，不欲书其姓名。’按《宋史·汪应辰传》：‘时议改元重熙，应辰谓契丹尝以纪年，遂改隆兴。’则隆兴改号，事由圣锡，史记载之，视为美谈。以汪氏之博闻，乃能知契丹有重熙之号，而竟忘赵谗有隆兴之名，何耶？至仲言所谓当途开陈，友人晋用者，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三云：‘孝宗即位元年改隆兴，其说以为务隆绍兴之政。及学士草制，则合建隆、绍兴之义，非知意矣。二年，王瞻叔为参知政事，言赵谗谋逆，尝欲以隆兴纪元，令太常丞曾逮检事实以进，上愕然。明年正月郊，改元乾道。’据此则所谓当途者，王之望也。所谓友人者，曾逮也。至赵谗始末，及渝州改名恭州之故，则《玉照新志》云：‘赵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党来降，赐以国姓。至谗不量其力，乃与其党李造、贾时成等，宣言欲除君侧之奸，词语颇肆狂悖。然初无弄兵之谋。建中靖国，时事既变，谗亦幡然息，来京师注官。时曾文肃当国，一见奇其才而荐之，擢国子博士。谗谒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句群以前事告变。狱就，遂以反逆伏诛，父母妻子悉皆流窜，改其乡里渝州为恭州。文肃亦坐责，告词略曰：第求可用之才，辄荐逆谋之首，是也。就其始，止由猜忿妄作，遂至杀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负寇盗之名，学者亦当以轻剽为戒焉。’（俊案：《能改斋漫录》十四云：‘赵谗本赵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洞戎，与诸戎约降朝廷。庭臣乃醉诸戎杀之，扬言众叛，掩为己功。又尽得其财物。故庭臣高赏筮仕，被擢用。生子谗，少年登第，几为殿魁，未三十岁升朝为国子博士，忽以谋叛伏法。庭臣自河东提刑配琼州，母妻妹分配岭外，家赀没官。盖

报应之速如此。’所言正与《玉照新志》全合，又较详尽。）《挥麈后录》卷七云：‘初，谥以甲科为太常博士，谒告省其父庭臣于蜀。道中梦神人授以诗云，天锡雄才孰与勘，征西才罢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龙袞，天子今年二十三。由此有猖狂之志。伏诛时适及岁。刑部郎中王吉甫独律中文以谓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状。吉甫坐绌。诏改渝州为恭州。谥初登第时，太常少卿李积中女有国色，即以妻之，成婚未久而败。或云冯时可者，谥遗腹子也。’合此二文观之，则谥之先世以降夷赐姓，父名庭臣，弟名诒，妻李氏，妇翁李积中。其党有李时雍、李造、贾时成；告变之句群，亦其党也。谥中甲科为毕渐榜。何籛《春渚纪闻》卷二云：‘毕渐为状元，赵谥第二，初唱第，都人急于传报，以蜡板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着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人赵谥。识者皆云不祥，而后谥以谋叛被诛，则是毕斩赵谥也。’据《宋诗纪事》卷三十四载：毕渐为绍圣元年进士第一。则赵谥亦是年进士也。其为国子博士，曾布实荐之。谥为布所荐，其家世布知之甚悉，故其《日录》备言之。其谋逆委曲，则当时狱词如是也。所谓冯时可者，盖冯时行之误，时行字当可，故误为时可耳。南宋初，吾乡闻人惟时行最著，而《宋史》无传，事略具陆存斋《宋史翼》，所著有《缙云集》行于世。然以为赵谥之遗腹子，则流俗之妄言也。又《挥麈余话》卷一云：‘熙宁初，司天监亢英奏：后三十年西南有乱，出于同姓。是时，方议皇族补外官，于是诏宗室不得注授川陕差遣。至建中靖国初，赵谥叛于渝州，相距果三十年，其言乃验。’虽事涉机祥，亦可见当日之重其事也。以与渝州改名事有关，故备录之。他日更有所得，当别为详说焉。”（宗鲁

原文止此。)余按：北宋之世，蜀中自王小波、李顺之后，屡有起义。其倡之者，平民以外，军将文吏均有之，书于《宋史》各帝纪者，历历可数，故有蜀人强悍易反之说（《朱子语类》语，详下文）。宋制：“凡官于蜀者，既不得以子属行，及到官，例置婢。”（见施彦执《北窗炙录》）熙宁以后，“宗室不得注授川陕差遣”（见上文引《挥麈余话》），盖皆深防之也。至赵谗一狱，史家更深没其文。宗鲁所考，已得其崖略。今按《宋会要》（一百七十册）《刑法》六：“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十六日诏：赵谗谋反，从坐者既已伏诛，应曾诖误人未在吏者勿推，亲戚不当缘坐者释之。”观此诏，则此狱绵历岁年，多所牵连可知矣。至赵谗为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邛州僧寺版壁有赵谗题字。字既凡恶，语亦浅拙，不知当时何以中第如此之高。盖希时事，力诋元祐，故有司不复计其文之工拙也。”陆氏痛诋赵谗，盖以为反叛之人，宜无可取，固无足怪。然谗为国子博士，曾布实荐之，此其才必有过人者。谗之反也，讼言欲除君侧之奸（事见上文引《玉照新志》）。今考《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云：“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当此时也自响应，但未几而哲宗上仙，事体皆变了，所以做来也没巴鼻。（没巴鼻，宋人口语，犹言没根据、没来由、没办法也。说详近人张相著《诗词曲语辞汇释》。）蜀人大故强悍易反，成都尝有一通判要反。”按赵谗之官为国博，而此云教授，盖同为学官，传闻之误耳。此事乃与苏氏有关，使人惊绝。因念东坡北归之初，本有还蜀之意。蜀人亦咸望其归（见《米元章挽诗》自注）。其后乃绝口不言，论者以为或力不及（王文诰之说。见《苏诗编注集成·总案》四十五）。然安知非是时赵谗

肆言不平，远道亦有传闻，故为此避嫌省事，遂无复西归之想耶？子由晚居颖滨，有蜀人来访，避不与见（《朱子语类》百三十），知其亦别有故也。宋人多尊苏轼，而赵谗牵连，事涉大逆，故皆讳言之。微《语类》则莫如其事。《语类》言赵谗之反“当时也自响应”。此必有说，惜无可踪迹矣。此段恨不能起亡友而告之也。又赵谗登第之年，宗鲁据《宋事纪事》，定为绍圣元年，今考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云：“赵谗元祐九年擢进士第二名。时第一名毕渐，当时榜帖，偶然脱去渐旁点水，天下遂传名云毕斩赵谗。谗后谋不轨伏诛，果符其讖。”此文毕渐以下云云，略与《春渚纪闻》同。其云元祐九年擢第者，按《宋史·哲宗纪》，绍圣元年四月癸丑始改元，则赵谗登第，当在四月改元以前，故仍称元祐耳。

读石帚先生合宗鲁先生之文而写成之《书赵谗事》，余以为斯举也，有以见石帚先生对其亡友宗鲁先生责备求全之谊，亦以见二位老师之文之相得而益彰也。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见《论语·子路篇》）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责之貌。”应劭曰：“朋友衍衍间间。”（《风俗通义·愆礼篇》）《诗经·卫风·淇奥》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传》曰：“道其学而成也。听其规谏以自修，如玉石之见琢磨也。”为学之道，不当如是乎！往者，余整理宗鲁先生所撰《月令章句疏证叙录》，即尝以素所接闻于师者为之订补，而写成后记；今兹，读石帚先生《跋晁刻〈古文尚书〉》，乃为文以效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忱，非老门生对于二位老师之“师死而遂背之”也，亦非敢自附于“教学相长”也，实以老门生如我者，今日若知而不言，后有识者，必将奋起而言之也。人亦有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窃自比于斯义而不能已于

言也。石帚先生《书赵谗事》，据《朱子语类》而知“二苏斥逐，赵谗以此摇动人心，遂反”，而叹“此段恨不能起亡友而告之”。吾今亦宗师石帚先生之言而为之言曰：此段恨不能起二位老师而告之也。盖亦孔子所谓“起予”“助我”之道欤！

《四川省近现代人物传》（“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之一，省志编委会人物志编辑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第6辑《向宗鲁》（屈守元撰）写道：

向宗鲁教学，朴质精审，最恶哗众取宠。他教大学前后十几年，门下之士成名者不乏其人。川大第五班学生杨明照考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九班学生王利器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都以他们从向宗鲁学来的基本功夫使燕大、北大导师大为惊异。1941年，当时的教育部以川大中文系人才辈出，乃特命其开办研究所，由向宗鲁主持，并用他的名义招生研究生，以屈守元襄理其事。规模粗具，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始毕，于11月，他便不幸病逝。

今案：所谓“特命”者，以当时在重庆之中央大学、在乐山之武汉大学、在三台之东北大学，闻风相悦，纷纷向教育部请求开办文科研究所，都未获批准，故曰“特命”也。宗鲁先生逝世后不久，四川大学由峨眉搬回成都，所长由文学院院长向仙乔兼任，乃召请我回母校担任文科研究干事。教育部并为研究所添设一名部聘教授钱穆。解放后，钱穆指导研究宋代理学的研究生许毓峰回到他的家乡在曲阜师范学院任教，改行教新文史，学非所用，郁郁不得志，英年乃竟逝世，惜哉！

在峨眉，我们班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同学，他就是张宣，原

来他是中文系上几届的学生，这时来复学的。他早已暴露身份，是川大有名的共产党员。当时，川大的特务学生，在训导长叶叔良的领导下，对张宣进行无情的迫害。在系里，有些同学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只有我和他比较接近一些。他一个人以羊角的名义办了一份壁报，和特务学生顶着干，后来实在呆不下去，又退学了，据说是去延安了。解放后，他当西北民族学院院长，被点名作重点批判，丢了乌纱帽，转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作教授。1980年，西北大学聘我为中文系兼职教授，我们在西安会面了。“分别了几十年的老同学，一见面就说：‘想起当年在川大，我这个左派搞政治，您这个中间偏左的搞学术。现在，您做出了不小贡献，我却空无所有，真有点愧对故人啰！’我说：‘老张呀！这是分道扬镳嘛！我看，您像受了《论语》的影响，还是《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啰！’我们都会心地微笑了。”（以上据《王利器自传》。）1982年，我第一次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香港的朋友告诉我：“香港有两个您过去的熟人，一位是叶叔良，一位是余雪曼，他们都想和您见面。”我说：“这两个人嘛，叶叔良过去在四川大学是管我们的、整我们的，我对他没有好感。余雪曼过去在重庆大学高中部教国文，我是经常在班上和他捣乱的。这两个人，今天和他们见面，恐怕无话可说，那将是十分尴尬的，我不想会见他们。”因此，就作为罢论了。

1983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编纂的《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我给香港艺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梅节（挺秀）先生邮寄一本去，请他指教。梅节先生精研《金瓶梅》、《红楼梦》，香江学人中之佼佼者也。旋得复书云：

利器学长先生：

久不通候，时切驰念。今忍接寄赐新作，既喜且惊，

喜不必说，惊的是吾兄功力之可畏，真教天下治考据之学、年谱之学的芸芸“文化人”，愧到在地球上无以立足。接到后只翻一过，即去上班工作。弟去冬初起，在一大工商集团任富翁之秘书，礼拜一至五下午六至六时半须上班，故未能即读也。此书又厚又大，李氏父子能做如此大的年谱，老兄老兄，我不知怎样拜服才好。俟穷七夜之力读后，当在敝专栏内抢先一谈。此书港尚未到，若非赐寄，可能半年内才见到。近来书到得较快，但以生意为第一目的，学术大作则迟迟。尤可笑者，日本长小说，先卖中册，后到少数上册，下册4个月后退今不到。而中华书局职员曾在内地读过下册，且日本电影早有人在上海看过（港未演过），颠三倒四，莫名其妙。《红楼梦学刊》1983年3号正上市。此志弟早料到定不了期，因没那么多新材料也。近觉吴恩裕兄（同我通二信即逝）之风等等资料，尤其董邦达等故事，故事甚佳，然必有可疑。弟意雪芹自幼年抄家后，大世家已没落，姑表皇亲亦不能照顾。周汝昌等重视敦氏兄弟，须知敦氏乃祖上有罪之天潢，其父只干干小税关，而“曹子别来已一年矣”之太平湖情况，可证敦兄弟是好友，然终不一二见，尤其住在西山下旗营村中小小寒民，实无力搭骡车入京城宣内石驸马大街太平湖一次，而敦氏兄弟更不会老远（乾隆时与光宣同）去西山探友，所以一探不遇之诗不假，然可能只此一探而已。死时或未在，送殡则有之，盖古人重视友之“死”，不若今人将“死”看做小事也。弟的毛病写信动笔就跑野马，拉不住缰，请原谅。

梅节先生治《金瓶梅词话》甚勤，整理出版过校点本，后来还在继续整理，准备在香港出版订补本。我们在苏州召开的

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晤面时，他向我说：“本来想把《金瓶梅》点校本奉寄请教，恐怕被海关查出没收，以后有机会亲身带来奉上。”我说：“是呀！日本波多野太郎教授曾经邮寄过日本大安影印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给我，就被海关没收了。有朋友知道此事跟我说：‘您写个声明，日本朋友送我的《金瓶梅词话》是作研究用的，他们会退还您的。’我说：‘用不着去讨麻烦了。’后来波多野教授知道此事，他随旅行团来北京访问时，随身带来，蒙混过了关，胜利地把书送到我手中。”这部《金瓶梅词话》，曾由马裕藻等集资800元在山西买来。当时影印过几百部，不知道第九十四回有缺页，又把崇祯本《金瓶梅》插图增加进去，不是《金瓶梅词话》原样，直到大安影印本问世，才把这个情况弄清楚了。

解放前后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每周要举行例会（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亦须参加），有时于会上举行学术报告。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以研究生而获得这种待遇，人咸以为傅先生于我之刮目相看也（北大文研所同学则以为傅先生特别喜欢我）。我作了“家人对文解”的报告，从先秦直至北隋，选取例证一百一十一事，或单言“家”、“人”，或重言“家家”、“人人”，或于“家”、“人”字加以状词。其在各句之词性皆为名词，或用于主格，或用于宾格。以为“家”字除少数数为“家尻”之义外，其余“家”字大抵与“人”同义，并为发五证以明之：一为古书以“家”、“人”二字互用；二为战代以还，诸言“某家”者，犹言“为某学之人”，或“某种人”，或“某姓之人”；三为汉魏以下，诸言“是家”、“此家”者，犹言“是人”、“此人”；四为自来“大人”之称，又得为“大家”；五为古书以“家”、“人”对文，后人变对文为散文，则不兼举“家”与“人”，而单举“家”或“人”，所谓对文则异，散文则通也。以上五证，例俱从略。因是得出结论：一是凡在“家”、“人”字上著以冠词者，为第三人称

之定指，其不著冠词者为第三人称之泛指。二是“家”之本义，以“豕尻”寓“人尻”，因更转而为“人”。而“家”、“人”二字义本通，古书中以“家”、“人”对文者，盖以遣词造句，规避复重，故变“人”为“家”耳。如《韩非子·难势篇》之“三人”，《功名篇》作“三家”，《史记》、《汉书》、《栾布传》之“酒人保”，即《汉书·杜根传》之“酒家保”。明乎此，则古书中以“家”、“人”对文者，无不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矣。听讲演者，除史语所及文研所全体同仁外，寄住之王献唐及其助手屈万里亦在座，一致认可。此文于1947年7月17日发表于《辽海引年录》。

解放前，一般研究生都是两年毕业，我则因论文较大，展限一年，于1943年8月27日把论文《吕氏春秋比义》写成，约莫二百万言。谓之“比义”者，取高诱《吕氏春秋序》“若有纰缪不经，后之君子断而裁之，比其义焉”之义，今写定本易名为《吕氏春秋注疏》，以其为书兼为高注作疏也。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向仙樵先生得知我学业告成，来函邀请回母校协助办理研究所，职称定为讲师，做文科研究所干事，月薪330元。于是我持函向傅先生陈述此事，他表示赞同，说道：“好！你去吧，记着将来还是要把你请出来的。”于是我回到江津老家，携带着胞弟老么利溥去成都，安排利溥读川大附中。我没有分到宿舍，就在办公室里支起一间双人床，我们兄弟二人同床共榻，抵足而眠。我们搭一个教员伙食团，和陶大镛夫妇同桌进餐，食堂没有板凳，大家立地而食。陶大镛者，经济系教员，川大特务学生恶意诋毁为“狸象狐（叫李相符）、逃到蓉（叫陶大镛）、盆地现（叫彭迪先）”之“逃到蓉”是也。我每周星期五去光华大学讲授“读书指导”，今天光华大学黎本初校长就是当年“读书指导”班上的学生。那时，我进城就住在东顺城街刘念和君家，一住就是两天。这

些年头，平津名教授云集成都，在川大文科研究所就有部聘教授钱穆先生。我接管所务后，发现教育部拨给研究所的款相当优裕，而成立两年多来，这笔款一直没有动用，于是我和所长商定，把应归研究所的款项一用来添置图书；二用来聘请名教授来所设讲座，报酬从优。于是先后聘请好几位名教授来所设讲座，其中就有陈寅恪、李方桂两位先生。除本所研究生外，川大中文、历史两系和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的先生们如李思纯、刘念和、胡芷藩、蒋大沂等都来听讲。在李方桂先生讲演之后，川大历史系教授李思纯先生还在座谈会上和李方桂先生交换意见，商量邃密，皆大欢喜。于是我和在四川师范学院任教的刘念和君在东顺城街他的家中设宴招待陈寅恪、李方桂二位先生，并请李培甫、庞石帚二位先生作陪。在那玉珠薪桂、物价一天一个样、大家都忙于为稻粱谋的日子里，我们能尽一点东道主之谊，颇觉心安而理得。1983年秋，李方桂先生挈带全家从美国来，重游成都，住在锦江宾馆。其时，我来成都开会，也住在这个宾馆。经四川社科院张毅君告知，颇为欣喜，于是我们一道去叩门拜访李先生及其太太徐先生。我们谈及当年李先生在川大文研所讲学，在刘宅赴宴；又和徐先生谈及当年在板栗坳我帮厨时推豆花，她和傅师母俞大彩先生都来下厨，参观全部操作过程。今天回忆起来，大有共话巴山夜雨之感矣。

在陈寅恪、李方桂两位先生应邀来川大文研所讲学之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派丁声树、董同和、杨时逢三位先生来四川大学调查四川方言。我去邀请丁声树先生来所设讲座，并为言陈寅恪、李方桂两位先生都来讲演过，遭到拒绝，我就不便邀请其他两位先生了。他们的调查四川方言工作，是遴选每县一人来录音，江津县则选了我。他们以为我可以代表江津方言，其实，江津土话，江南江北，大有不同。有人

嘲弄我们江南地区发音重浊，编个绕口令：“花了六百六十六块六毛六，割了六斤六两六钱六的肉。”在江北地区都能读出这些入声字，准确无误，江南就不行了。（大江从西往东流入江津境内，把江津分割为江南江北两部分。）因之，我只能代表江津南部方言。我这一口江津土话，直到今天，鬓毛已衰，还是乡音无改。1984年，日本文部省邀请我去讲学，主办其事的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来北京接洽，见我满腔江津土话，于是把我的女儿贞白一道请去，是想通过贞白把我的江津话翻为普通话也。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举国欢腾。寒假期间，我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在把新桃换旧符之际，我集唐人诗句“乾坤万里眼”、“天地一家春”作为春联（详《从对对子学起》），所以寄托希望于国共再度合作之意。1986年，重庆市合川县整修钓鱼城宋蒙战场遗迹，征文于余，余又以此联应命，以下句尤切合于今天各民族团结成一家之基本国策也。

1946年，北大复员，5月间，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先生亲笔来函，召我回北大任教。我持函向所长向仙侨先生说明：前时回川大，傅先生即有将来要我回北大之约；并且，北平有人有书，是我平生向往的地方，请你放我去吧。不得已，向仙侨先生只好让我走了。于是，我和利溥先回到江津老家，然后只身来到重庆，集中在两路口一家旅馆，等候飞机飞北平。以那时有条规定，即不是从西南联大来的，不能携带家眷故也。到动身去北平那天（1946年夏），是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的。飞机是军用运输机，机舱里没有座位，大家席地而坐。坐在我旁边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林女士上了飞机就呕吐，狼狽不堪。飞机飞了6个多小时，飞越秦岭，才到北平。北大有车把我们接到沙滩，把我安顿在红楼二楼一间小教室，作为起居室。我们这些红楼的住户，纷纷在“红楼”二字上安

一个字作为斋名，如“寓红楼”、“乔红楼”之类，不一而足。我则取名为“二红楼”，大家以为我这斋名取得有意思，哪里谪到后来我竟搞起《红楼梦》呢！

北大复员，接收工作忙。贺麟教授来找我商量接收四川同乡会问题。这个会房地产不少，主要是有一些会馆。我们商量后决定由贺麟当会长，我当董事长，有些在北平还有一定影响的如白坚、长安大戏院的程经理（忘其名了）都请来做理事。我们每年在苏东坡生日那天在四川会馆宴会，把在北平的乡贤如傅增湘、国民党空军后勤处处长刁泰贞（他是国民党派出留美学空军的第一批学生。我的三舅。他曾劝我去南京或回四川，他派飞机专送。解放后，我曾多方托人在台湾打听，一直没有下落）请来一聚。同乡会另外有些活动，如在欧美同学会宴请张群，虽然吃西餐，还是请傅增湘先生出席的。至于那个程经理，每逢有名角登台演出，都派车来接贺先生和我去看戏，因此，我看了不少名角的戏，最难得的是赶上听金少山的戏了。解放后，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最先把四川同乡会全部财产交出去了。

初来北平，有一件令人难忘之事，至今犹萦绕于怀。辅仁大学余季豫教授在家设宴，宴请我和周一良君。入席，余季老安排我和周君坐在他的身边，一左一右，以次为他的女婿周祖谟，他的儿子余逊，俱名教授也。席间，余季老谈笑风生（几乎是他一人在讲话），偶尔涉及《世说新语》，我插话举似刘义庆此书原名《世说新书》之故，他大为赞叹，以为我是个读书种子。自来北平，这是我第一次亲聆前辈如此奖掖，受宠若惊。《诗》所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大雅·既醉》）者，非欤！

北大复员后第一个春节（1947年），我去东厂胡同胡校长家给胡先生和师母江夫人拜年。胡先生说：“你来得正好。我

们一道去给傅沅叔、陈援庵拜年。”于是就驱车（那时，北大只有胡先生这部轿车，何思源还特别为胡先生从东厂胡同到松公府修条路呢）先去傅先生家。那天，傅先生卧病在床。他的儿子傅忠谟在侧侍候。他看见是胡先生和我去给他拜年，很高兴。我和傅先生已不止一次见过面了。这一天，他向胡先生说：“你们安徽省正印出‘安徽丛书’，我也想编套‘四川丛书’，重点放在宋代，当时四川出了不少著名的史学和文学家，这些材料，我几乎都有。我希望王君同我合作，完成这项事业。”我接过话头说：“四川在宋代文化史上有辉煌的贡献，我尝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他所著录的书大半是蜀宋本，想仿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写《宋蜀本考》，首先要避免像王国维把宋人高闲的《高氏春秋解》说成是《高诱吕氏春秋解》。以所知见宋蜀本有限，未敢轻易动笔。”傅、胡二先生听到我举出王国维的错误，颇为惊讶。胡先生又和傅先生谈及《水经注》问题，傅先生说：“《水经注》是应该有个定本。”他表示愿意为胡先生提供方便。当我们告别时，他教傅忠谟取出《蜀宋文存》（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砸抢分子劫去未还）、影印宋本《周易正义》（单疏本，用白棉纸仿日本《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宋槧本《毛诗正义》，存卷八至卷二十四）、《双鉴楼藏书续记》（朱印本）送我，我表示深深感谢。随即驱车到陈校长家，则有陈先生助手刘迺和女士、辅仁大学教授于省吾先生、尚智研究所方豪先生已先在那里。方豪先生在重庆办《真理》杂志，我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日本投降，他便离开重庆到北平，要把《真理》杂志重庆版交我继续办下去，以我亦将出川，推辞了。这回在陈老家相见，备加亲切。他约我有时间到尚智所去，说道：“在北碚收买了一个铜盆。盆里刻有双鱼，注满水，以双手摩擦铜盆两旁，顿时溅起水珠，颇有意思。”后来，我去了，他把铜盆取出来当

场表演一番。果如所言，余以为即双鱼洗也。这时，胡先生正在和陈先生谈我开校勘学的问题，说道：“过去北大的校勘学由赵万里讲授，用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作教本，现在这门课程改由王君担任，他先讲古书旧式举例，然后讲古书校文释例。王君学有师承，讲义编得可以。”陈先生听了很高兴，说道：“我那本《释例》是就元代兴起的白话文而做，无法施之于先秦古籍，应该改图。”对我奖饬有加。后来，1990年，我把《古书旧式举例》（即《校讎学方法论》的第一部）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利器论学杂著》页83—116。1982年将《校讎学方法论》第二部《杜集校文释例》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2、3两期。当我们向陈先生告别时，他取出用虎皮宣手书的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馀幅颇大，准备加题跋后再去裱装，“文化大革命”中被劫去，未还）、《元典章校文释例》、《五十万卷群书跋文》送我。我们驱车回到东厂胡同，胡先生叫司机把我送去红楼，他说：“书多不好带。”我说：“此行幸亏有校长的车，不然，我真行不得也。”后来，大概是司机把此事宣扬出去了，有人说：“胡适特别喜欢王利器。”此其一端也。说胡先生特别喜欢我，不是空穴来风，我也隐隐约约有所体察。那是一次中文系召开的讨论毕业论文题目的会议，我拟的十多个题目都被学生选定了，而有老师出的题目却没有人选。在会上有人提出王先生担任这么多论文指导，恐怕精力分配不过来吧。也有人附议。胡先生力排众议，说道：“我看王先生的题目都出得好。读书贵在发现问题，有了问题，就等于把问题解决了一半，那一半只差把答案写出来了。”当时，我暗地里佩服胡先生这番话，十分内行。后来，我在多年的大学教学生活中，常常引用这句话来教导学生。会议对论文题目、指导教师都定下来了，于是我天天去图书馆，具体地指导每一个学生去翻那些

书，并如何进行操作。结果，那一班的毕业论文最好的还是我指导的一本《宋代南丰曾氏亲党考》。这是一位女生刘之埏写的。本来我想把劳季言《读书杂议》谈宋人亲党的加以补充，哪里谙到经刘之埏勤奋研讨，仅举南丰曾氏这一族，就洋洋洒洒写了十几万言，她的字迹又娟秀可爱。胡先生得到这份论文，认为我指导有方，十分欣赏，把这本论文放在皮包里，到处逢人便说。据知那一班毕业的学生，就只有刘之埏一人是胡先生亲自介绍留在北平工作的。解放后，她和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孙士铮结婚，时孙士铮刚从英国留学归来，亦是当年我们寄居在红楼之住户也。

北大复员，仍然是民主运动堡垒，民主墙、民主广场是全校进步师生发表言论的场所。我也曾在民主墙上写过文章。有人来告诉我，不要在上面发表言论，免得惹起麻烦。特务学生就在民主广场杀了一只狗头，插上向达名字标签，以示警告。党还在红楼二楼办起一个子民图书室，传播进步书刊。子民图书室负责人之一是农学院学生、我的族人王蕃同学（解放后在北京工作），由于是乡亲，他经常来串门，有时就住在我的寝室里。与此同时，图书馆一个姓梁的小职员，衣着很阔气，也经常来我寝室里问这问那，还向我说：“王先生要借什么书，我可以给你借来，用不着你亲自去。”我还以为是好学之士，殊不介意。后来在围城中听说他坐飞机跑了，我才大吃一惊，想到他一定是来监视我的，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来侦察王蕃同学的。正在此时，南京政府要疏散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300余人，我也在名单内。他们来通知我，几时有人来请你上飞机，你要立刻就走。我把此事告诉了王蕃同学，他说：“王先生你不要走，围城很快就解决了。”与此同时，我的三舅刁泰贞，他是考上南京政府第一届公费留美学航空的，那时，他是国民党空军北平后勤处长。三舅娘姓

李，湖北人，东亚体专毕业，很健美。她来北大旁听，就是我介绍的，每个星期六来，听完课，就接我同她一道去她家住两天，星期日送我回沙滩。车子来，车子去，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胡同，只晓得在西城而已。刁泰贞几次对我说：“时局不好得很，你赶快离开北平吧，要去南京，或回四川，坐我们的飞机都行。”我说：“谢谢三舅，我要和北大一道行动，不想独行其是。”他又说：“你既然不想走，我这里所有设备都送给你。”我说：“我只有一间寝室，没有地方摆这些设备，谢谢你。”后来，他和她没有来找我，大概已经跑了。北平围城前夕，特务横行，尤为猖獗。这些家伙，白天不敢闯进北大捣乱，晚上就翻墙进来抓人。当胡先生知道了，不管是不是共产党，他都立刻去保释，第二天就把人放出来了。现今在北大的阴法鲁教授即其一也。与此同时，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对北平的高等学校进行残酷镇压。朝阳大学学生会主席毛之范同学，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四川巴县人，被特务打得走投无路，他跑到我那里，躲了几天，才安全度过了。北平和平解放了，大家欢欣鼓舞，有的还争着办喜事，以资纪念。清华大学政治系学生、我的二弟媳赵家惠的堂兄弟赵明洁（解放后在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后转入经济日报社，现已逝世）和同班同学南皮张氏遵修女士，现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他们俩择吉在交道口北三条张府举行结婚礼。男方请我去主婚，我去了。走到交道口，那天正逢解放军举行入城式，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队伍，熙熙攘攘的欢迎群众，把交通口的十字街头拥挤得水泄不通，在那里足足狂欢了一个多钟头，队伍才缓缓地通过了。我急急忙忙来到张府，宾主们已经等候一个多钟头了。

亲扶向师旅榭归旧山

1941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忽然从峨眉传来噩耗，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向宗鲁先生于是日逝世，享年47岁。四川大学和在巴县龙凤场小湾的向师母牟鸿仪先生同时拍来电报后，嘱我去峨眉亲扶向师旅榭归葬旧山。我立刻拿着电报向我的导师傅斯年先生请假。傅先生听闻之下，不胜惋惜，为言：“本想把向先生请出来，在史语所或北大工作，不意遽尔长逝，这是巨大的损失。”对我担负这项艰巨任务，表示欣赏与关怀，并批准预付一个月的奖学金130多元。办完手续后，第二天我就辞别傅先生，轻装出发，到宜宾找到了当年我们在成都共同署名反对特务学生假川大全体同学名义欢迎程天放的同学，承他们精心安排，为我包了一乘可靠的滑竿，由旱路星夜奔赴峨眉。在山下报国寺所设灵堂前我含哀告至，然后上山去二坪向先生寓所，会见陈季皋先生及屈守元和舍弟利仁二君，他们都是和向先生同住在二坪也。稍事休息，即由屈守元君陪同去伏虎寺会见文学学院院长向仙樵先生，又去报国寺会见程天放校长。他那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令人难以忍受，这恐怕是由于向先生和我都反对他上台的缘故吧。后

来几经交涉，学校只补发一个月的薪水约 300 余元，并派工友老史伴随一道扶柩去小湾。这笔钱仅够从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含包船费用在内），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七八十里旱路，这笔费用，较之水路行船更大，怎么办呢？我心中是有数的。先是，我参加重庆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毕业会考，获得“荣誉学生”称号，时人称之为状元，于是来求我写寿序者有矣，求我写墓志铭者亦有矣。其间为重庆一个财阀写的一篇墓志铭，送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之资，我把这笔钱作为股金加入创业银号，旋即改为银行，招牌是请但懋辛先生写的。这回，我准备把投入创业银行的全部股金退出，以贖向先生之丧。今天看来，当时这样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要不然，解放以后，我就成为发国难财的不法资本家了。后来，我访日讲学，和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赠诗有云“失马塞翁倚祸福”，即谓此也。

灵柩启运之前，学校开了追悼会，会上展出向先生遗著及手批本古籍若干种。向先生的老友陈季皋先生在致悼词中誉我此行为“行芳而名高”。其后，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闻讯，写了唁词，寄调《木兰花慢》：

宗鲁没于峨眉，奄忽二旬，倦枕寒宵，怆然成此。

傍青峰望远，
乱云外、故人稀。
似海燕飘零，
荒椽愁寄，
残社须归。
征衣。
对花溅泪，
梦羌村、何地浣尘缁。

眼暗黄垆旧影，
鬓添明镜新丝。

峨眉。

多事买筇枝，
山鹤怪眠迟。
剩灯床乱映，
礼堂谁写，
总帐空披。
凄凄。
一棺水驿，
费侯芭、双袖万行啼。
魂断平羌月冷，
夜深来鉴虚帷。

后又填《惜红衣》：

辛巳初冬，访仲仑庐家堰沙河茅舍，本岷怀共居也。
忆客夏与宗鲁连榻于此，尝有买山之约。裘葛甫更，而
二君相次奄忽，邻笛凄风，可胜依黯。又峨眉师友适是
日追悼二君，因次白石韵抒感，即示仲仑索和。

刈茅官园，
笼寒草阁，
酒销风力。
掩泪眼重来，
狮山怨凝碧。
回栏寸寸，
曾惯见、荷花留客。
萧寂。

凉雨暗蛩，
说连床栖息。

坡陀度陌，
图我行吟，
丹黄半尘籍。
招魂甚处，
故国。
渺南北。

料理岁寒幽计，
还共短筇寻历。
误闭门千绢，
空望隔林霜色。

庞先生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取譬于我，我何敢当；至言礼堂写定遗书，固我辈门人责也。若乃道友生之谊，死丧之戚，笔随心到，切乎声而通乎义。今则庞先生又随向祝二先生仙逝已去，每读养晴之词，侧身西望，益令我这个老门生泫然而兴心丧恩义之恸也。

在二坪逗留的日子里，殷孟伦先生曾来和我商量，希望把向先生遗书留在川大，以作纪念。我说：“此事，向先生没有遗嘱。有向师母在，我做不了主。”随后，我和陈季皋先生、屈守元同学商定整理向先生遗著：由屈守元负责整理《文选》，王振桑负责整理《淮南子》，王利仁负责整理《十三经注疏》简端记（向先生校《周易正义》，曾写成《周易疏校后记》，发表于《华西学报》1941年6月第6、7期合刊），我负责整理《说苑》。已有《校讎学讲义》（未完成）和《蔡氏月令章句疏证叙录》，由我带回李庄，找机会出版。其后，我回到李庄，傅斯年先生问及向先生有

遗著否，我遂以《校讎学讲义》及《蔡氏月令章句疏证叙录》奉上。傅先生即以之交与王云五先生，遂于解放前，在重庆商务印书馆以嘉乐纸印行出版。此二书之出版，在当时颇引起世人惊讶，以《蔡氏月令章句疏证叙录》实是一篇论文，而《校讎学》则仿《三辅决录》、《阳羨风土记》诸书旧例，“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史通·补注》），正文提纲，是优美整齐的骈体文字；注文遍引群籍，论证正文提出的见解。斯二者实为薄薄的小册子，而前者却为英国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列为重要参考书；后者则为福建黄君坦所编《近世骈文选》选入《正名》一篇也。至于《说苑校证》，旧遗失第17至第20共4卷，由屈守元君据向先生手批本（底本为崇文书局本）按《校证》体例补足，交与中华书局，已于1987年7月出版。惟据《新四川通志·向宗鲁传》所载，除《淮南子》、《史通》（重庆出版社出版之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即已全部采用向先生所作简端记）二书外，尚有《春秋左氏传正义》、《水经注》及《管子》等以及其他论文，俱已散失。近闻屈守元君已组织力量，多方搜求，拟最录为《挥弦斋读书简端记》云。

开过追悼会，一切安排就绪，第二天，就从报国寺灵堂前出发，抬灵柩的8人，挑书箱的14人，连我和老史以及来远送的利仁弟，还有引路的船夫一名，一共26人上路，轻易就到了平羌江畔。把灵柩和书箱都安置在船上了，利仁弟才挥泪告别，再三称说一帆风顺、一路平安，然后回二坪去了。我和老史这才上船。船夫子三人，一名太公，两名艄工。太公者，《辍耕录》引《古今诗话》所谓“川峡以篙手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是也。太公杀大雄鸡祭江，然后启碇，一段不寻常的航程于是开始了。包的船颇小，棺材很大，向先生的遗书遗物又有14挑，把灵柩安厝在船舱当间，28个书箱放在灵柩的前后左右就塞得满满当当的了。我和老史就

蜷缩在棺材两边，连腰也直不起来。掌舵的太公是川江行船老手，船头两个艄工一左一右，也是十分精悍的。船一进入大江，第一个险滩就是道士罐。我躬身来注视着前方，在对面山头上立起“对我来”的牌子，为来船导航；江边停着救生红船，等着我们。一派萧森严峻景象，令人望而生畏。太公大睁着双眼紧盯着奔流，很熟练地把小船随大流直向道士罐放去。离罐口约莫有十来米，他把舵向左一撇，小船就借着一个洄漩水势，轻掠而过，像离弦箭一般向东直驶而去，回头一看，道士罐早已落在我们后面了。过了这一关，前头还有叉鱼寺，那是川江枯水天最险的一个滩。太公艄工和老史都劝我起岸，绕过此滩，再来上船。我说：“船在我在。我上岸了，万一出事，我怎样向牟鸿仪师母交代，怎样向四川大学交代。”我没有同意上岸。于是艄公集中精力，盯着前方，左一舵右一舵地穿行在无数暗礁中间；船头两个艄工也东一篙西一篙地点个不停。奔浪与逆浪相激荡，不断有浪花打上船来。船底急浪淘沙，嗤嗤作响，船上太公与艄工对骂，阵阵传来，哪不撩人心绪也。经过他们齐心合力，也由于船小，操作灵便，一叶扁舟，随波逐流，终于平平安安地通过险滩。这一天，一连冲过两个恶滩，十分紧张，大家这才觉得累了。于是把船靠在犍为岸边休息，我叫老史进城去打酒割肉，来打牙祭，犒劳犒劳。

次日，船到宜宾，我跟老史讲：“我们到江津，一个钱也没了。从江津到龙凤场小湾足足有七八十里旱路，那时候，约莫有30多人上路，路上要吃两顿饭，顺利的话当天可到达，不顺利就麻烦了。那段旱路的开支比起前两天来要大得多。我得先去江津准备准备。船到江津，你们把船靠在江津对面中渡街码头，我们要在那里上岸启程去小湾，不要靠在江津城这边，江面广，启程那阵子才摆渡过去，就要花不少时间。在

中渡街把船停好后，你过江来，去通泰门大街创业银行找我。”交代清楚后，我就起岸，搭民生轮船去江津，下了创业银行股金，去横街子赵楚翘家和他商量。赵楚翘者，舍弟利新的内兄，吴芳吉先生在江津中学时的庶务，他家经营金堂烟业生意，手上掌握一批劳动力，是满有办法的。于是找来和他们有往来的包工头商量，经过精打细算，决定雇用两班16人抬灵柩，14人挑书箱。从中渡街，过两路口，到来凤驿，都是上坡路。一路上经过的当坊土地都要奉献香花纸烛，乡俗谓之买路钱。在中渡街吃顿早饭，中午在来凤驿打尖。过了来凤驿，就要分路走小路了，要预备两块跳板，以防路窄，棺材过不去，还要预备锄头鹰咀，遇到转弯抹角处开路，还要为我雇一乘滑竿，一共需得雇用36人，这样，就定妥下来了。

第三天上午，老史和太公在创业银行找到我，知道一切都安排好了，很高兴。我请老史、太公、赵楚翘和包工头吃了一顿饭，席上，我给老史画了一张去小湾的路线图。当天下午，老史和太公就去小湾向牟鸿仪师母报信了。第二天清早，赵楚翘送我过江，找到包工头，知道人夫都齐了，就在中渡街吃早饭，每人两个锅盔，两根油炸桧（又叫油炸鬼，即油炸脍，乡人以为把秦桧下油锅来炸，奸臣之冥报也），一碗甜浆。吃完了，收拾停当，随即上路。赵楚翘一再分付包工头，路上一切要小心，然后转身过江回江津去了。这回，幸亏有他，帮了大忙，不然，我以一介书生，什么都不懂，那真束手无策、寸步难行也。于是，我们这一行人就浩浩荡荡地上路了。一路“杭育、杭育”之声不绝，走的是上省城的官路，平平坦坦，虽是上坡路，看来无大困难。中午，到了来凤驿，在一家大铺子门前停下来吃午饭，坐了五大桌，一霎时，冷热菜盘子和帽儿头饭碗在每桌上都堆满了。付完了账，继续前进，由于是小路，不好走，有时要修路，有时要

搭跳板，这样，就慢下来了。到了下午四点过，在去小湾十来里路的地方，碰上向师母率领着儿女嚎啕着来迎了。我连忙下了滑竿，安慰着师母要节哀应变：“师母上有老父，下有子女，千万要爱惜自己的身子呀！”又一再请师母坐上滑竿，我则护着灵柩前进。大约一顿饭工夫，才到小湾，太老师已在当前噙着两腔老泪，倚闾而望了。打从峨眉出发，历时一个星期，行程1000里，跋涉山川，蒙犯险阻，尔乃把先师旅榇奉安旧山，至是才松了一口气。晋荀息有言：“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不啻道出我今日这番心态也。

到了小湾，安厝好灵柩，布置好灵堂，远近赴吊者，天天有人。在重庆的同学闻耗也赶来了。相向哭泣之余，他们问及先师遗著如何整理。我把在陈季皋先生指导下作出的整理方案告诉他们。他们提出整理工作为啥没有重庆方面的同学。我这才深咎当时考虑不周，没有办法，在取得向师母同意后把我身边带着的《说苑校证》交与他们。不过，他们都在经商，根本无法动手，后来又把《说苑校证》交还向师母，向师母又交给我，于是我把这项工作交给屈守元君，屈守元整理告成后交与中华书局，已于1987年7月出版了。

到了小湾的第三天，举行家祭，之后，把先师归榇，暂殡于小湾之阳。又两天，我给老史一笔回峨眉的路费，然后和他一道给先师遗像告别，向太老师和师母辞行。师母拿出先师一些书籍和遗物送我。我再三推谢，师母坚决不依，太老师和老史也从旁相劝。不得已，我留下一件衣服作为纪念，这才辞别上路，到了来凤驿，分道扬镳，老史上成都，我回江津。

由于向师母只身撑持门户，手头十分拮据，隔两年太老师又谢世，在乡下小孩子上学也成问题，不得已变卖小湾房地产和向师书籍，携带儿女去重庆市内教小学，在重庆大学

理学院院长何鲁教授照拂之下，师弟师妹们都去学理工科，后来都各有成就，无一学文科的。（因而回想当年我没有考入四川大学之前，也是想走科学救国之路的。近朱者赤，当时若机遇契合，说不定我也会像师弟师妹们一样去学理工科的，因为我对于何鲁先生讲的近世几何颇有深厚感情嘛。）向师母是把老师遗书全部出售与重庆米亭子一家旧书店的。1982年我在成都开会，与重庆师范学院图书馆员赵馥相晤。她告诉我，向先生这批书重庆师院全都买下来了（已售出一些），经她编目，还发现有向老师手批的。我嘱咐她，向先生手批的书要提出来特藏，如有发现，希望你立即写信告诉屈守元老师。赵馥是四川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曾听守元讲课也。

回到板栗坳，销假时，傅先生问及向先生有遗稿否。我说：“随身带来两种小稿子，待整理后，交到先生处。”于是把《校讎学》交与屈守元君整理，《蔡氏月令章句疏证叙录》则由我整理并写了后记，都缮清了，然后交与傅先生。傅先生一看，说道：“虽是一鳞半爪，弥足珍贵。等两天我去重庆，交给王云五。”我说：“我和商务印书馆曾经有过一次交往。我读高中时，在报上见到商务印书馆征求出版计划启事，我写了一篇汇集各种丛书，除其重复，选其精华，编成新的丛书，影印出版的建议，以之应征。不久，他们送来了购书券，我拿去重庆白象街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买了一部影印宋蜀本《太平御览》和一部精装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傅先生听了很高兴，说道：“隔几天，我去重庆，就交与王云五。”1943年，向先生的《校讎学》和《蔡氏月令章句疏证叙录》就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距向先生之谢世才一年多耳。这部稿子，当时若不是傅先生亲自过问，是很难出版的，今特表而出之，于以见傅先生对于向先生佩服之忧，亦以明我之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

我与《文心雕龙》

在四川大学时，听庞石帚先生讲授《文心雕龙》，我因购得开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书眉字脚，朱墨烂然，服习日久，敝帚自珍，不自悔其为谫闻浅见也。至今此书犹在手边。于《总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自清人阮元、阮福父子以来（阮元《研经室三集》卷五《学海堂文笔策问》），言之者众矣，率皆不惬人意，心焉藏之。后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四《悉昙轮略图钞》卷第七（694页）论文笔事，了尊引游（源为宪）云：“诗、赋、铭、颂、箴、赞、序、谏谓之文。绍（诏）、策、移、檄、章、奏、书、启谓之笔。”又引里书云：“《秘府论》四卷引文《文笔式》云：‘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布（吊）、谏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是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为笔。’”尔时，以此说出自日本僧侣，未敢遽信。后来日军投降，北大复员，余应聘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始得见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即了尊所引之《秘府论》“四卷”当做“西卷”，《文镜秘府论》

全书分天、地、东、南、西、北六卷，《秘府论序文》所谓“配卷轴于六合”者是也。弘法大师即遍照金刚（774—835），入唐求学，归而造为此书，大抵所据皆中土故笈也。其书西卷：“《文笔式》云：‘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是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为笔。’”此所引《文笔式》，《日本见在书目》著录二卷，以杜正伦《文笔要诀》例之，当亦出中土人所作。因是，余乃撰为《文笔新解》一文，载入《晓传书斋文史论集》页243—25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因是，而余之研究范围，乃由《文心雕龙》发展到《文镜秘府论》（拙撰《文镜秘府论校注》，198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版。1990年，台湾贵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订补本），继又由《文镜秘府论》发展到《文笔要诀》，著有《文笔要诀校笺》，收入198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之《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页75—94。盖因类相从，驾轻就熟，故得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余治学轨迹之可得而求者也。

先是，余之治《文心雕龙》也，颇以黄季刚先生补写《隐秀篇》为不然。《隐秀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朔风动秋草”之“朔”字，宋本缺此页，明人妄补之，如诸明本所刊行者是也。纪昀以《永乐大典》校之，明其出于伪撰。黄季刚先生乃另撰一篇以代之，不顾宋本所缺者仅中间一页耳，其首尾固岿然尚存也。故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得引篇首“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二句，此则清人虑能言之。而余今又得宋人陈应行《吟窗杂录》三七引“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精蕤，有隐有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也”8句51字，正在今本篇首，而“有隐有秀”四字，较

之今本之作“有秀有隐”，为尤胜矣。黄先生都不予以考虑，岂亦欲如束广微之《补亡诗》乎？《诗经》可补，《文心》又何曾不可补乎？而不知二者之异趣也，盖于彼则将“以缀旧制”（《文选》束广微《补亡诗序》语），若于此直不知而作耳。黄先生亦殊好事矣。于此，适有一例，言《文心雕龙》之另一缺页者。明人胡维新辑《两京遗编》所收《文心雕龙》于《自序简》“则常夜梦”以下缺一页 322 字，下直接“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伪归有光搜辑《诸子汇函》卷二十四易名为《云门子》，于小传遂据《两京遗编》本捏造为“忽梦入水索源，于是遂著《文心雕龙》”之澜言。又于《风骨篇》之后，选入刘书《新论》之《去情》、《通塞》、《适才》、《慎隙》、《贪爱》、《惜时》六篇，以《刘子新论》为《文心雕龙》，以刘书为刘勰（《直齐书录解题》、《郡齐读书志》俱引袁孝政序谓作者或以为刘勰之说），瓜皮搭李皮，羊头而马脯，不知何以安之，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书林清话》七：“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于此见之矣。

曩者，北京大学复员，余应聘只身前来北京，距下年度开学，还有三几月时间，于是以时纵阅北大图书馆及其他公私所藏《文心雕龙》和其他有关资料，收获不小，乃着手撰写《文心雕龙新书》。赵万里先生知余之从事于整理是书也，乃告余曰：“有黄某者，藏有敦煌卷子《隐秀篇》。”并以《华北水灾募捐展览目录》为证。余闻之大喜，乃走访黄某，重其为北大同学也。彼则坚谓其没有这个卷子。余乃出《华北水灾募捐展览目录》以示之。彼曰：“《展览目录》搞错了，是敦煌写本《文选序》，不是《文心雕龙·隐秀篇》。”余曰：“《文选序》是治中国古典文学必读之书，怎么会弄错呢。”他说：“就是弄错了。”我说：“好，敦煌写本《文选序》也是宝

物，请出示一观。”他说：“没有了。”真没办法，这样就不欢而散了。1984年7月25日，考古所所长夏鼐同志来信告知：

前次关于黄藏《文心雕龙》唐写本事。按解放初期“三反运动”时，曾为此事开会，对之施加压力。但是据所知，黄老谓展览会所送去者为唐写本《文选序》（见1954年出版之《吐鲁番考古记》页24—25及《周报》427），并非《文心雕龙》，更非《文心雕龙·隐秀篇》，不知何以误传。当时我们考古所梁思永先生曾在会后问过赵万里，赵曾参观过那次展览，但并未见到《文心雕龙》唐写本。但亦传闻书估云：黄氏自吹有《文心雕龙》唐写本。当时在运动中，赵氏亦不敢说其必无。“三反运动”结束时，亦以此事查无实证，不了了之，仅将其交出之《文选序》内部展出，作为“三反”之战果而已。

然则黄某所藏者实乃唐写本《文选序》，而非《文心雕龙·隐秀篇》，乃欲自欺欺人乎！其后果只落得“麻烦你自讨”而已。然而亦因此而知《文选序》尚有唐写本留在人间，此亦治文选学者之所当留意者也。

北大复员后正式开学之前，中文系代理主任傅斯年先生找我去商量开课问题。傅先生说：“四年级校勘学，过去由赵万里担任，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作教材，于整理元以前古籍不适用。你听过向宗鲁先生校讎学课，你来担任这个课程怎样？”我说：“向先生《校讎学》是用骈体文写的，又没有写完，我准备重新写过，先讲古书旧式举例，然后讲校勘释例。”傅先生说：“好。你就担任这门课程。另外，中文系的先生还要担任一门选修课以及一班大一国文。”我说：

“我可以开《史记》、《庄子》或者《文心雕龙》课。”傅先生说：“当年我在北大念书时，听朱蓬仙讲《文心雕龙》（尔时，我不知道朱蓬仙是何许人，又不好意思问，后来，我买到了他用王谟所刻《汉魏丛书》本《论衡》，校以硃石蒋氏所藏元至元本，从他的跋语，才知道朱蓬仙即朱宗莱）。大家不满意，有些地方讲错了，有些地方又讲不到。我和罗家伦、顾颉刚等同学商量，准备向蔡子民校长上书，请求撤换朱蓬仙。于是我们就上书了。大家又商量蔡校长必然要清问此事，我们得准备准备。果然，没两天，蔡校长把我们找去了，听取大家意见。我们就分别把准备好的问题，一一申说。蔡校长听了之后，向我们说：‘你们回去，此事学校会妥善安排的。’不久，这个课就由黄季刚先生来担任。又不久，五四运动开始了。章门弟子大多回南方去了。今天你要开这门课程，准备怎样讲？”我说：“当年黄季刚先生补写《隐秀篇》欠考虑，《隐秀篇》只是宋本中间脱一页，首尾并不假，前人已指出张戒《岁寒堂诗话》所引二句，正在今本篇首，我又从宋人陈应行《吟窗杂录》找到八句，也在今本篇首，足见《隐秀篇》首尾是刘彦和原文无疑。我又从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引《文笔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所载《悉昙轮略图钞》所载文笔事解决了自阮元、阮福父子以迄晚近学人都没有解决的文笔之分的的问题。”最后，我又说：“这一向我遍读了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所藏《文心雕龙》善本，获益不少，正在写《文心雕龙新书》。我想一篇一篇、一字一句地讲下去，当是没有困难的。”傅先生说：“好，你就开《文心雕龙》。还有一事，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要出纪念论文集，你来写篇文章。”我说：“我可以写篇《经典释文考》。”傅先生说：“好。燕京大学的陆志韦也在写《经典释文》研究的文章，你来写一篇，很好。”之后，我写成《经典释文考》，交与傅先

生，立即批准为文学院论文第八种发排了。

1946年7月，胡适先生从美国回来。9月，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还兼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在系务会议上，决定了中文系所开课程及担任人员名单。会后，北大文科研究所同学王达津对我说：“胡适、傅斯年都喜欢您，让您在本系开两门课，我们一门也没有捞到，只好去教大一国文了。”我笑而不答。王达津同学今犹健在，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在会上相逢，他还举此事，以回忆当年我们在沙滩相聚之乐趣也。北大开学了，我的《文心雕龙》课上，来了一位英国留学生，他就是后来著名的翻译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引起我的注意，心里想，这门课程，学起来难度较大，他竟知难而进，极为难能可贵。他于课余，经常向我请益。不久，他的爱人从英国来，在沙滩寓所结婚，请我去证婚。北平围城中，他回英国去了。大概是受了蔡元培、俞平伯二位先生的影响吧，后来，他翻译了《红楼梦》。不过，这个译本不叫《红楼梦》，而改名为《绿楼梦》，并把《红楼梦》中一切红字都改为绿字，他说：“西方人不喜欢红字故也。”

当《文心雕龙》课程结束之日，也是我的《文心雕龙新书》脱稿之时，适法国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为《通检丛刊》向北大征稿，学校推荐我的《文心雕龙新书》应征。北平汉学研究所把它列为《通检丛刊》之十五，也是《通检丛刊》最后的一种。稿子发排了。我得以时去西什库北堂印刷所看校样。因是得知北堂藏书之富，与上海龙华寺天主教堂藏书是南北并称的。盖自明代修建北堂以来，传教士收藏中国图书不遗余力，其中明版之多，且多孤本，是令人向往的。《文心雕龙新书》印出来了，时1950年1月30日也，正是北平解放的日子。如众所周知之故，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

被查封，《文心雕龙新书》因之未得流行于国内，连我自己也没有得到样书一本，至今我手边所有的还是台湾宏业书局和成文书局（还有龙门、明文二家盗印本，没有搜到）盗印本，而宏文本还把我的名字改为王理器，岂在台湾一岛亦怕刮起红色风暴耶！

新中国成立，百废俱兴，高等院校发展尤为迅速，一时全国中文系师生用书十分紧张，形势咄咄逼人。这时，我已奉命调至新成立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工作，我的顶头上司赵其文是我的江津中学老师，我们首先考虑重印1936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以应急。出版社指定我做责任编辑去和范老接洽，哪里谄到一去就碰了钉子，范老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此书是我的少作，存在不少问题。打从我到解放区后，就专门研究历史，好多年不摸《文心雕龙》了，今天来看此书，连我自己也不满意，不要重印吧，免得贻误天下后世。”后来经过几次商量，并向范老说明：解放前，我在北大讲《文心雕龙》，就是用的范老的注本，读者称便；这次重印，将由我来做责任编辑，为了向作者和读者负责，我一定尽我的能力，把出版工作做好。最后，范老同意了，并告诉我将由王会庵同志来协助我，查对引用诸书。（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我写这篇回忆录时，他已经逝世了。）在整理过程中，我订补了500多条注文，我将清稿拿去请范老审定，他完全同意。但又提出新的问题，范老认为：“您订补了这样多条文，出版时，应署上咱们两个人的名字才行。”我说：“不行。这是我当责任编辑分内应做的事，不能署上我的名字。”范老说：“我不能剥削您的劳动。您不署名，我就不同意出版。”我说：“此书已纳入计划，不出版恐怕影响不好。”范老说：“看来您要想当无名英雄哟，那我也不要稿费了。”我说：“我只能签注稿酬标准，至于要不要稿

费，那由范老做主嘛。”问题解决了，于是新版《文心雕龙注》就胜利出版了。（以上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0年6月10日第227期所载王利器《新版〈文心雕龙注〉出版前后》。）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要重印我的《文心雕龙新书》，我认为此书须改编才能出版。于是把《文心雕龙新书》改名为《文心雕龙校注》，凡《文心雕龙新书》条文已收入范老注本的，一律删去，一条也不保留。我将这样的措施告诉王会庵，他认为是今天绝无仅有之事。这样，《文心雕龙校注》就在1977年10月1日出版了。1980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文艺新书栏”发表了迈文的文章，写道：

研究和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统，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南北朝时期刘勰所作《文心雕龙》，是一部古典文学理论巨著，历代都有传刻、评注，现能见到的就有20多个版本。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利器校定的《文心雕龙校注》，汇集现存各本和敦煌唐写本27种，并援用前人征引到《文心雕龙》的梁萧绎（梁元帝）《金楼子》本共56种本子，加以校勘，纠谬正讹，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定本。

案：定本之说出于唐人《五经正义》，犹如经过刘向校定之书称为新书，我校定的《文心雕龙》称为新书，即本于此也。

我因整理《文心雕龙》，连类而及《文镜秘府论》。1979年，我所撰的《文镜秘府论校注》脱稿，赵朴初先生写了颂辞：

六合配卷轴，

两曜悬不朽。
善哉我大师，
文心罗万有。
音声谐平仄，
名句精对偶。
义学立面墙，
赖此开户牖。
多君致力勤，
校注良不苟。
今古文字缘，
亲情天地久。

王利器先生校注弘法大师著《文镜秘府论》将出版，
喜为此颂。1979年3月，赵朴初。

于是我将前言《弘法大师与〈文镜秘府论〉》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期，又将赵朴初先生所撰颂辞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继而将此书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新闻》于1982年2月15日第9526号刊登中国将出版日本高僧名著《文镜秘府论》消息：

中国新闻社北京2月13日电：日本高僧弘法大师（又名遍照金刚）所撰《文镜秘府论》，已由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王利器校注完毕，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弘法大师（公元774—835年）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22年（公元804年），即中国唐朝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入唐取经求法，同时悉心研究汉文诗歌韵律之学。回国后弘扬佛法，为日本密宗之开山祖师。他又根据汉文部首、偏旁，创造

日本字母平假名，为日本文奠基人之一。弘法大师所撰《文镜秘府论》一书，是六朝、唐初汉语格律诗体制及韵律的重要著作，对研究中国汉文学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内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手书颂辞，还附录最近出土的唐长安青龙寺碑拓片照片，此碑是目前直接有关弘法大师活动的惟一出土文物。

从而引起日本缙素两界重视，高野山大学庄司庄一教授又将拙文《弘法大师与〈文镜秘府论〉》译为日文，在《密教文化》昭和59年9月15日第147期发表，认为我所撰《文镜秘府论校注》对中日文化交流之发展，有一定贡献，又值弘法大师逝世1150周年之际，于是由日本文部省委托京都大学邀请前去讲学，为期28天，由京都大学文学部兴膳宏教授负责接待。嗣由兴膳教授专程来京晤商，作出具体安排，遂于1985年3月22日14时50分，携女儿贞白乘日航784班机由首都国际机场直飞日本。在这28天的日子里，我先后在京都大学作了两次讲演，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东京大学和大正大学联合举办的讲演会上作了一次报告，在神户大学、九州大学、关西大学、高野山大学作了讲演或开座谈会，其讲演题目都没有重复的。而日本之高龄名誉教授如佐伯富、平冈武夫等都来听讲，佐伯富名誉教授且以所撰《中国随笔杂著索引》见诒，殊令人铭感也。在京都大学又因兴膳教授之助，访得杜正伦《文笔要诀》，乃知《文镜秘府论》北卷实本杜正伦《要诀》为说，因是遂作杜正伦《文笔要诀校笺》，颇有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之感，于是以之发表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中，使唐代失传之初，今日复得见威风一羽，读“徐福行时书未焚，百篇《尚书》今尚存”之句，哪得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而欢他山之多助也。曾子曰：“君子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朱子曰：“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我于《文心雕龙》、《文镜秘府论》、《文笔要诀》三书的整理过程，深有这种体验，若因此而写出《文笔新解》，则特其副产品耳。

谁说小说不能登 大雅之堂

我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以交通不便，没有去昆明，而是去南溪李庄板栗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附设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就读，以当时在内地史语所藏书最为丰富也。我定下专攻《吕氏春秋》，拿半天来写毕业论文（当时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比义者，取高诱《吕氏春秋序》“后之君子断而裁之，比其义焉”之义，今已全书写成，易名为《吕氏春秋注疏》，以兼及高注为之疏义也。稿已交与巴蜀书社，《注疏序》文即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表），半天来读从前没有读过之书，主要是通读《二藏》，然后才阅读与《吕氏春秋》有关书籍，几乎成为书不读秦汉以下之人矣。

1952年，由中央文化部沈雁冰、周扬两位部长和文物局郑振铎局长主持召开古典文艺丛书十种校注会议，会上决定：由我和清华大学浦江清教授共同整理《杜甫集》；由我和郑振铎先生共同整理《水浒传》。我同时进行这两部书的整理工作。《杜甫集》则把国内收藏的所有《杜集》善本都拍照来了，约有8000余幅。尔时，清华大学远在西郊，交通极不方便，浦江清教授根本无法进城（我去过一次，不会骑毛驴，走了两

天),这项工作就由我一人承担了,幸不辱命,把所有访求得的《杜集》善本照片校讎一过,写出校记。后来,我又写成《杜集校文释例》,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3两期。在写校记过程中,我发现有千家注杜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咏怀古迹》之“指挥若定失萧曹”,“指挥若定”之出于《史记·陈丞相世家》“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失萧曹指挥”之出于《抱朴子·臣节篇》“仪萧曹之指挥”。又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能对面为盗贼”之出于《韩诗外传》二“邻人相暴,对面为盗”。如此之等,都付诸缺如。深知老杜胸中有万卷书,后人尚未读老杜已读之书,而侈谈注杜,抑何容易也。浦江清教授逝世后,《杜集》全部整理工作,我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它交与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萧涤非教授逝世后,又把这项工作交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廖仲安教授了。

至于《水浒传》,当时新得天都外臣序本,就以之为底本,进行校刊注释,仍分两步走。由于郑振铎先生太忙,无暇兼顾,于是全部整理工作就落在我的肩上了。我初次步进小说领域,觉得天地之大,足供我驰骋,于是饥不择食地争读我从前不读之书,乃于1953年5月27日、28日两天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研究论文《水浒与农民革命》,颇引起有关方面注意,胡乔木同志、周扬同志都来信表示赞可。周扬同志于6月4日来信说:“我感觉很需要这样的文章。”那年还享受殊荣,上天安门国庆观礼。可是不久就被划为“右派”了。我并没有因此而心灰意懒,依旧锲而不舍地我搞我地搞下去。虽然不像从前一样,可以抛头露面,倒觉得8小时以外都是自己的了,可以由自己支配。于是由《水浒传》发展到《红楼梦》,积累一些资料,后来平反,说是划错了,一下子我又发表了不少文章。有人说:“老王,您

丰收了。”这些文章有：《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霭》、《大观园在哪里》、《红楼梦新证证误》等。关于《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我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享年48岁。这一观点，得到红学界的承认。其马氏遗腹子问题，我认为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霭实为一人，三位一体而已。至于《大观园在哪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直抒胸中丘壑，幻作纸上园林，一如陶渊明之创造桃花源罢了。因之，要说它在北京也不在北京，要说在南京也不在南京。假如有好心的好事之徒，硬要像刘子骥寻桃源一样去找大观园，我敢断言，任你南找北找，到头来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然而大观园在哪里？曰：就在《红楼梦》里。（《大观园在哪里》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至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错误实多，令人惊诧。我本着责备求全之义，向他面谈（时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不接受，于是写成《证误》提出十条意见：一是不知妄说；二是不知妄改；三是不伦不类；四是以讹传讹；五是张冠李戴；六是辗转稗贩；七是顾此失彼；八是道听途说；九是数典忘祖；十是“前知五百年”，指其称说元人已知清代八旗也（文载《红楼梦研究集刊》1980年第2辑）。1985年5月，我把研究《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论文汇成一辑，交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题名为《耐雪堂集》，取施耐庵、曹雪芹之名以为名也。1990年2月，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又出版了《耐雪堂集订补本》。此仅为我治小说之一部分成果，实则其范围初不限于《水浒传》、《红楼梦》也。1987年6月30日，日本《朝日新闻》“海外文化栏”评介《王利器氏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红楼梦〉的论文集》出版：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利器氏的《耐雪堂集》，这是一部以中国古典文学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红楼梦》为学术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这个论文集的书名，以两部名著的作者施耐庵和曹雪芹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收录的32篇论文，系作者在过去30余年间写成发表的，在日本学术界获得了很高评价。

作者从《水浒传》的水浒联想到《诗经》中周王朝的发祥地，指出“图王霸业”之意，并考证了《水浒传》实际上由三个系统的原型编纂而成，进一步把《水浒传》作为军事教科书进行再评价，兴味盎然。

《红楼梦》中，描绘了大观园的精美庭园。关于大观园的真正遗迹，有在南京、苏州、北京郊外诸说，其说纷纭，王利器氏认为大观园系作者曹雪芹的胸中之理想，只在《红楼梦》里，这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实在是一种卓越的意见。

当余之从事《水浒传》整理工作时，客有从四川来者造门而告曰：“您从来书不读秦汉以下，今乃大搞其不登大雅之堂之言，不几于从乔木而迁于幽谷乎！”言下不胜惋惜之至。余乃应之曰：老兄之言差矣。您不尝读《汉书·艺文志》乎？凡诸子百家百八十九家（《后汉书·安帝纪》注引《洛阳殿名》作“百六十九家”）（4324篇），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1390篇），不说与诸子百家之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而强，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其可忽诸！故《诸子略》引孔子之言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今《论语·子张篇》引作子夏曰。案：《后汉书·蔡邕传》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虽有

可观，孔子以为致远恐泥。”章怀注引《论语》作子贡，盖“子夏”之误。又引“郑玄注：‘小道，如今诸子书也。’此岂以为孔子之言，当别有所据也”。案：《汉书·东平王思传》注，师古曰：“《论语》称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作子夏曰者，盖孔门四科，文学游子夏，作子夏曰者，盖子夏述孔子之言也。是孔子、子夏亦不废小道之言也。故《汉志》于“小说家”曰：“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何吾子之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传》、《风俗通义·穷通篇》）今请更为您言小说可以解经。

《周易·明夷》：“象曰：‘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朱熹《周易本义》曰：“窃疑左股，幽隐之处。”寻“拯”，《九家》作“豕”。《周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吉。”《释文》引刘表云：“豕去势曰豶。”案《说文·豕部》：“豶，羸豕也。”段玉裁注：“豶，羸羊；驂，犗马也；犗，驂牛也；皆势之谓也。”据此，则“夷于左股”之“夷”，即“羸”借字。“拯”，《九家》作“豶”之“豕”字，当是“豶”之坏字。朱熹以“左股”为“幽隐之处”，则“夷于左股”，即去势也。换言之，即谓左股为势也。今四川之去牙猪、公鸡势者（去牙猪势者，俗谓之改猪匠），即从左边股下手，其去势而未尽者，谓之走花。寻《水浒传》第二十五回：“郓哥道：‘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水浒传》之“左边”，正谓阳物也。《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我就把你下半截咬下来。”“咬下截”与“咬左边”义同，此盖宋元方言，到了明代，已经由“左边”演变而为“下截”了。左边、下截，都就势之所在部位而言，即所谓幽隐之处也。惠栋《周易述》知“左为阳”，第未明言其为阳物，岂不欲以“左边”或“下截”秽其口耶？又案：《国语·越语》下：“凡

陈之道，设右以为牝，设左以为牡。”韦昭注：“陈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阴为牝，在阳为牡。”则是以左为牡为阳，固先民之常言也。

《周礼·天官》：“宫正：‘均其稍食。’”郑玄注：“稍食，禄稟。”贾公彦疏：“稍则稍稍与之，则月俸是也。”《仪礼·聘礼》：“唯稍受之。”郑玄注：“稍，稟食也。”贾公彦疏：“礼：‘君行师从，卿行旅从。’从者既多，不可阙于稍食。”案：《周礼》每云稍食，皆谓米稟，以其稍稍给之，故谓米稟为稍，则周汉两代俱谓禄稟为稍也。《群书考索·后集》卷十六引《宋会要》：“且以庶官勤事，非厚稍无以责廉隅。”又引《大诏令》：“太宗雍熙四年（987）诏：‘王者设班爵以驭贵，差禄秩以养廉，所宜各懋厥官，共成庶务，顾其稍食，宜在优丰。应内外文武臣僚等析交俸钱，旧以八分为十分交给，自今并以实价给之。’”又卷十七引《大诏令》：“祥符九年（1016）七月丙寅诏曰：‘职田彝制，品秩定规，盖优待于众官，且旁益于稍食。’”盖由禄稟之稍食，折合为俸钱也。寻韩愈《进学解》：“月费俸钱，岁靡廩粟。”廩粟即稍食。又《寄卢仝诗》：“俸钱供给公私余，时致薄少助祭祀。”元稹《三遣悲怀诗》：“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海录碎事·臣职宰相》：“汉丞相月俸钱六万。”则汉唐已有俸钱之说。《水浒传》第一百零四回：“那赢的都被把稍的放囊的，拈了头儿去。”梢同稍。《石点头》第六回：“尊哥自恃稍粗胆壮，与公佐对博，千钱一注。”又第十回：“赌博场中稍挽稍，管他来历怎的。”《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回：“怎当再旺一股忿气，又且稍长胆壮，自然赢了。”《二刻拍案惊奇》卷八：“郑十道：‘若挨得进去，须要稍物，方才可赌。’”都谓钱财为稍。《民国南川县志》卷六《土语》：“以贖本贷人曰放稍。”今天津方言亦有之。

《礼记·杂记》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郑玄注：“考之者，盛设食以落之尔。”孔颖达疏引庾蔚云：“落谓与宾客燕会，以酒食浇落之。即欢乐之义也。”案：庾蔚云云，当出庾蔚之《礼记略解》，《隋书·经籍志》“礼部”有《礼记略解》十卷，庾氏撰。庾氏即庾蔚之也。《诗经·小雅·斯干序》：“宣王考室也。”孔颖达疏：“昭四年《左传》：‘叔系为孟丙作钟，飨大夫以落之。’服虔云：‘衅以羶豚为落。’则又一名称落，盖谓以血浇之也。”则六朝唐人尚明浇落之义。司空图《休休亭歌》：“休休休，莫莫莫，浇酒虽多性恶，赖是常教闲处着。”（据《剑南诗稿》卷三十七《小园新晴诗》原注引）即是用酒食浇落之义。《水浒全传》第二十四回：“难得这个娘子与我作成出手做，亏杀你两个施主，一个出钱的，一个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难得这个娘子在这里，官人好做个主人，替老身与娘子浇手。”“浇落”即《水浒传》言“浇手”之所本，谓裁缝衣服告成，设盛饌以落之。成衣出诸手工，故云“浇手”也。《金瓶梅词话》第三回作“浇浇手”。《拍案惊奇》卷十八：“是夜即吩咐从人：‘明日早上，备一桌酒饭，请那烧炉的家童，说道一向累他辛苦了，主翁特地与他浇手。要灌得烂醉方住。’”然则凡以酒肴犒劳手艺人之辛勤，都可谓之浇手也。苏轼《洞庭春色诗》：“须君滌海杯，浇我谈天口。”曹寅《楝亭词·钞书》寄调《古倾杯》：“待掩帙蕉叶微酣，浇酬十指。”“浇口”与“浇手”、“浇指”之义同。又案：苏轼《二月八日与黄煮僧昙颖过逍遥堂何道士宗一问疾诗》：“问疾来三士，浇愁有半缸。”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四《春晚村居杂赋绝句》原注：“东坡先生谓晨饮为浇书。”又《过邻家诗》：“父老意欣然，为我拔青瓮，岂惟浇舌燥，亦用软脚痛。”《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所列食品有“精浇”、“粗浇”之类。陶穀《清异录》：“闾阖门外通衢有食肆，

人呼为张子美家，水产陆贩，随需而俱，每节专卖一物，遍京辐辏，号曰浇店。”这些浇字，都由浇落之义引申而来。《三侠五义》第二十七回：“哎哟！又添了浇裹了！又是跟人，又是两匹马，要卖去也得一百五六十两银子呢！连人带牲口，过一天也耗费好些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卷七十：“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到底省点浇裹。”案：《民国新福建通志·方言志·言名词篇》九：“日用曰浇裹。浇谓饮食，裹谓衣服。”则浇字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师古曰：“言都邑失礼，则于郊外求之，亦将有获。”今以小说解，不正有获乎？

抑小说不仅可以解经，还可以证史。《水浒传》第五十回：“李逵再抡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拍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中兴内，也做个军官武将。”程穆衡《水浒传注略》：“中兴内也做个军官武将，此必谓扈再兴也。《宋史》本传不载再兴家世，父祖名姓，赖是补之。”蔡昇《水浒后传读法》：“破祝家庄后，前传说扈成后为中兴名将，及观《宋史》，中兴诸将中，并无其人；则前传之语，亦莫须有，想当然耳。”案：程、蔡之说俱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初，杜充之众既溃，其统制官岳飞，刘经自芳山引家众入广德军，后军扈成驻于金坛县，为戚方所杀。”《三朝北盟书编》卷一百三十五：“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二十五日，戚方杀后军统制扈成于金坛。初，建康军溃于蒋山也，统制刘经、扈成、岳飞皆入茅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芳山’，形近之误）；经屯上观，成屯中观，飞屯下观，皆纵兵虏掠为资。飞与经、成议约军入广德军钟村，经与成皆许之。岳飞与经引兵先行。飞等既行，成按军在路下，摆拨不动。飞与经军马已行尽，成乃往金坛县，

与其将李璋等议入镇江会李滑槌之军，将士从之。成留老小在金坛，以其众往镇江。李滑槌闭门不纳，而出银帛犒成军。军复回至丹阳，得报，戚方劫金坛寨，尽掳老小而去。成大怒，有吞啖戚方之意，急趋金坛。有统领官谷俊者，背成投方，告其事。方勒兵为备。又中夜，向导二人迷路，质明始悟，成益怒，斩向导二人。成使克日，筮之曰：“缓则吉。”成曰：“事已如此，何可稍缓。”又命斩之。寻路而回，中途与方隔水相遇，方下马拜成，成亦下马答拜。成曰：“弊军老小在金坛，何故见侵？”方曰：“死罪死罪，戚方安敢作此，乃其小人有相累者。”成曰：“然，愿得军中老小见还，如何？”方谢曰：“既蒙宽恕，谨当尽以老小交付，不敢稍有侵损。”约日交还已定，方先期令人于桥下掘大坑，伏精锐数十人。期日，尽刷老人鳞次而行，若将交还者。成以军马迎之。方隔水言曰：“戚方今日尽将老小交还统制，何用军马？岂非欲见陵侵乎？”成曰：“不然。”遂约其军马皆退。而成与方各进马，方稍缓其行，成先至桥侧，伏兵出，遂杀成。”案：《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零七引《岳侯传》亦载扈成事，不及《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五所载扈成事本末完具，不录。又案：《水浒传》第七十八回载高俅大兴十路师进攻梁山泊，其中有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即高俅所称“前者有十节度使，多曾与国家建功，或征鬼方国”。案：《宋会要辑稿》一百七十六册《兵》一〇之四载：“神宗元丰元年（1078）七月一日，以泸州纳溪夷人为寇，诏西上阁门使忠州国练使泾原总管韩存宝都大经制泸州纳溪夷贼，于渭州及泾原路选下蕃士兵五千，内马军一千，及差经战斗使臣二十员，务要殄灭。”《渥水燕谈录》六《先非》：“韩存宝本西羌熟户，少负才勇，喜功名，累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韩存宝即韩存保，鬼方国即指泸州纳溪夷人也。又案：《宋会要辑

稿》第七十六册《职官》三二之四：“《哲宗正史·职官志》：‘殿前司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步军有……都虞侯，本直各有都虞侯、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侯。骑军、步军……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侯。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各以其职于殿前司。’”《宋史》卷一百九十一《兵志》五载陕西义勇、荆湖路义军、夔州路义军、涪州宾化县夷人义军均有十将。《西湖老人繁胜录》：“主上登门放赦……看十将抢金鸡。”《梦梁录》卷二十一《百战伎艺》：“理庙时，有路歧人名十将宋喜、常旺两家。”《武林旧事》卷一《四孟驾出》：“等子人员、十将，两行各四人居外。”是十将乃宋代小武官职称。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第七十五回“十将捧十瓶御酒”，容与堂本、《全传》本，芥子园本作“将十瓶御酒”，不知妄改。又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四：“乃赐……将官拱卫大夫贵州刺史王权已下金碗。”《梦梁录》卷二《清明节》：“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每岁，禁中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先进者赐金碗、绢三匹。”则宋代以金碗为赏赐品。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第六十三回：“随即取金碗、绣段，赏劳二将。”自天都外臣序本外，其余各本都改“金碗”为“金花”，斯亦不知妄改也。以兹二者——金碗与十将，说明《水浒传》之可以证史，此天都外臣序本之所以可贵也。又案：宋孟珙《蒙鞑备录》：“上自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额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心史》卷下《大义略叙》：“鞑主剃三搭辮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作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浪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辮为一，直拖垂衣背。”《永乐大

典》卷一四一二五“剃”字韵下载元人《净发须知》：“《大元新话》云：‘按大元体例，世图改变，别有数名，还有一答头、二答头、三答头、一字额、大开门、花钵焦、大圆额、银锭打索绾角儿、打辫绾角儿、三川钵浪、七川钵浪、川著练绾儿。’”清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新刻净发须知按摩修养秘诀》卷下载《大元新语》：“按大元体例，世图改变，虽有数名，还有一答头、二答头、三答头、一字额、大开门、花钵椒、大圆额、银锭打索绾角儿、打辫绾角儿、三川钵浪、七川钵浪、川著练绾儿。”然则三答、四答为元蒙发式，曰不回头、和身转者，与《心史》“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义合，引申之则为呆滞之义，此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之确解，亦为《水浒传》成书在元代以后之一证也。而《张协状元戏文》“净：‘那里？’末：‘回过头像。’净：‘转。’末：‘三打不回头。’”《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作“三打不回头，四打连身转”，皆不得其故而臆改之耳。日本友人波多野太郎教授编《诸录俗语解》（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纪要》第123号，昭和36年2月15日出版）《参考类语》：“三搭不回头。《碧岩》三：‘如今人三搭不回头，这老婆一点也瞒他不得。’《正宗赞·卍庵章》：‘浮王山见机而作，不消三搭回头。’《葛藤》：‘三搭不回者。’《中峰录》十二下：‘一蹈到底者不留朕迹，三搭不回底谩自博量。’《恕中录》：‘俊快底撩起便行，懵懂底三搭不回。’”则此语禅宗语录亦喜道之，俱谓其懵懂耳。

然小说不仅可以解经，可以证史，而且可以说诗。苏轼《新酿桂酒诗》：“捣香筛辣入瓶盆。”又《蜜酒歌》：“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东坡志林》：“子作蜜酪，与真一水乱。每米一斗，用燕麦二两半，如常法取酪液，再入蒸饼麦一两酿之，三日尝看，味当极辣且硬，则以一斗米炊饭投入。若甜软，则每投

更入麦与饼各半两。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入水少为佳。”（苏轼《蜜酒歌》王十朋注引，今佚。）据东坡所言，则清光谓酒色，滑辣谓酒味也。寻宋冯时行《缙云文集》卷一《友人惠酒味殊佳，用清光滑辣四字为韵以谢》，诗凡四首，不录。宋李吕《澹轩集》卷一：“近世饮者，尊尚苦味，有感成诗，惟清香滑辣四事，世云尔。”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云间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送三斤。君还不信，把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宣和遗事》卷二：“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四《马乳复用韵二首诗》：“肉食从容饮酪浆，差酸滑腻更甘香。”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勒浆歌》：“其色光晔晔，如葡萄桂醕。味则清馨甘滑，浑涵妙理。”《赵氏孤儿》卷上第四折：“不醉不归家，行乐天街上，清光滑辣香。”标注：“清一，光一，滑一，辣一，香一，五者酒之美处。”又第三折：“清光酝美，停车须下马。”《遇上皇》第四折：“我则知苦涩酸浑淡，清光滑辣任迷贪。”《幽闺记》卷下第二十二出：“村酿新芑，要解愁肠，须是壶内馨香透，盏内清光溜。”《水浒全传》第二十九回：“武松道：‘遮莫酸咸苦涩，问甚滑辣清香，是酒还须饮三碗。’”如上所述，则谈酒文化者，莫不津津乐道“滑辣光馨”矣。客曰：“闻君高论，开我茅塞，而今而后，不敢妄言小说家者流不可以登大雅之堂矣。”

访日讲学记

1984年11月12日，日本京都大学总长泽田敏男教授为了谋求国际交流，来函邀请赴日讲学，为期28天，由文学部兴膳宏教授接待，一切费用由文部省开支。继而兴膳宏教授专程来北京磋商，并邀请老伴廖德容、女儿贞白结伴同行，费用亦由日方负担。德容以家政丛脞，米盐琐碎，不能分身，又晕飞机，不便远行，辞谢了，即由贞白陪我前往。贞白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现在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工作。

先是，我校注的《文镜秘府论》于1979年脱稿，即将前言《弘法大师与〈文镜秘府论〉》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辑发表，又将赵朴初先生《颂辞》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发表，从而引起日本缙素学界注意，来京观光者，多方打听此书几时问世。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接受出版，《中国新闻》于1982年2月15日第526号刊登《中国将出版日本高僧名著〈文镜秘府论校注〉》消息。前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廖承志先生以1984年为弘法大师逝世1150周年，亲问此事，不久即排出校样。所可惜者，廖承志先生尚未看到此书出版，竟与世长辞了。当是时也，日本为纪念弘法大师

逝世 1150 周年，成立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编辑委员会，将《空海全集》译为现代日语，即由兴膳教授担任《文镜秘府论》译注。高野山大学庄司庄一教授，又将拙文《弘法大师与〈文镜秘府论〉》译为日文，在《密教文化》昭和 59 年 9 月 15 日第 147 期发表，认为我所撰《文镜秘府论校注》对中日文化交流之发展，有一定贡献，因此邀请我去讲学，并由筑摩书屋将出版之《空海全集》6 册交邮寄赠。全书 8 册，余 2 册 1985 年出版。

1985 年 3 月 22 日 14 点 50 分，我携女儿贞白乘日航 784 次班机由首都国际机场起飞，云路翱翔，瞬息千里，以东京时间 18 点 50 分飞抵大阪。京都大学文学部清水茂教授、兴膳教授、胜股志高助手、人文科学研究所小南一郎副教授、富谷至助手、神户大学伊藤正文教授、富山大学釜谷武志讲师、龙谷大学木田知生讲师、奈良县橿原考古研究所菅谷文则研究员及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等 10 余人来机场欢迎。略事休息，即乘专车往宿泊处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博士研究生郑重等已在会馆门前迎接。郑重为北京市人民代表林明美女士的女儿，事前即告知余将有日本之行也。已租定 A311 号房间，共四居室，设备全部现代化，每月租金 4.7 万日元，水电费自理，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则兴膳教授早已安排郑重女士等人代为筹措妥帖了。会馆附近即有市场，百货俱备，颇为方便。余父女二人每餐即做简单饭菜，亦非上千日元不办。在市场发现中国出口的凤尾鱼、午餐肉、涪陵榨菜及永川松花，即采购而归，大享故乡风味，不啻张骞之见邛杖于大夏，唐蒙之食蒟酱于番禺也。日本副食品，牛肉最贵，海产次之，猪肉又次之，鸡肉及鸡蛋为最贱，以斯二者，胥由人工饲养，大批生产故也。余以便秘，每餐必进香蕉，此物来自台北，一盛四五枚，标价 400 日元左右，亦价廉而物美也。

23日上午10时，兴膳教授来邀往文学部事务处办理滞
在手续。兴膳教授以所译《文心雕龙》见赠。清水教授以所
译《水浒传》第7册至第11册相赠。其前6册，则已故吉川
幸次郎教授之所译也。每册有后记，阐明如何处理在译注中
所遇到的问题。余正在作《水滸全传注》，得此作为参考，不
啻百朋之赐也。前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以所著
《水浒传》远道相遗，提出两个宋江的看法，发人深思，良以
文学允许夸张，允许虚构，而历史则不允许夸张，不允许虚
构，此二者分歧之所在，亦两个宋江说之所以产生也。明乎
此，则宋江投降及不投降问题，可迎刃而解也。《水浒传》在
日本影响很大，因而有关《水浒传》之译注也很多，如陶山
冕著《忠义水滸传解》（宝历7年，1757刊本）、又《忠义水
滸传钞译》（《唐话辞书类集》第一集影印写本），鸟山辅昌
著《忠义水滸传抄译》（天明4年，1784刊本），清君锦著
《水浒传批评解》（《唐话辞书类集》第一集影印写本），冈白
驹撰巽斋编《水滸译解》，穗积以贯编《忠义水滸传（语解）》，
佚名《忠义水滸传（语译）》，佚名《水浒传字汇外集》（以上
四种俱见《唐话辞书类集》第十三集），佚名《圣叹外书水滸
记闻》（写本），佚名《水浒传钞解》（写本，以上二种俱见
《唐话辞书类集》第二十集），以上皆日本学者有关《水滸
传》之述作也。至于译本，百回本则有冈嶋冠山译《忠义水
滸传》；百二十回本则有曲亭马琴译《新编水滸画传》，高井
兰山译《忠义水滸传》，幸田露伴译《水浒传》，驹田信二译
《水浒传》；七十回本则有平冈龙城译《标注训译水滸传》。今
兹吉川、清水两教授所译者，计划全书为13册，取精用宏，
駉駉乎后来居上矣。中午，清水、兴膳二教授请在京都大学
附近一家老牌日本料理，共进午餐，美食美器，动人朵颐，虽
生鱼片亦不难下咽也。饭后，兴膳教授陪游银阁寺，寺为洛

东名胜，与洛西之金阁寺齐名。京都为日本旧都，日本假中国古都之名以溢其都，因而分别名京都五区为洛中、洛东、洛西、洛南、洛北也。游罢，兴膳教授雇车送余父女回会馆。在京都之日，出入皆以出租汽车，街头招手即至，两公里收费420日元，过此则每公里收费80日元，车内安装计程器，远近详明，童叟无欺，土洋无别，不似北京某些出租汽车之漫天要价、因人而异也。

24日，兴膳教授、胜股助手陪同作市内半日观光之游。于京都驿前北口乘游览专车，从上午8时起，至午后1时30分止，为时5小时，每人缴费3320日元。游览路线为西本愿寺、金阁寺、平安神宫、知恩院、清水寺、三十三间堂六处。西本愿寺为洛中名胜，金阁寺为洛西名胜，平安神宫、知恩院、清水寺、三十三间堂为洛东名胜。三十三间堂，莲花王院本堂也，每间塑千手观音30尊，济济一堂，最为壮观。堂为三十三间者，盖观世音菩萨可以示现三十三身说法，故为之三十三间堂，分别部居，区以别矣。游客升堂，皆须脱屣，木天席地，黻觚导路，一尘不染之清净界也。日本寺院神社入口处，一般有类似中国牌坊之建筑，而以草绳横亘其间，谓之注连。周岂明译《古事记·神代卷》第二十九节：“布刀玉命急忙将注连挂在后面。”注云：“注连系用《颜氏家训》语。亦作标签，用稻草左纒，约间八寸，散垂稻草七、次五、次三根，故又写作左绳，又名七五三绳，用作禁出入的标当，挂在神社入口；今正月人家门户亦犹用之，盖以避不祥也。”案《古事记》所用“注连”二字，见《颜氏家训·风操篇》，乃指传染病，谓注易之气，边绵不止也。寻《古事记》上云：“即布刀玉命，以尻久米绳，控制其御后方，白言从此以内，不得还入。”次田润注云：“尻久米绳者，书纪有端出之绳，乃尻笼绳之义，即今之注连绳。”日本此种避不祥的端出之绳，

虽名注连，乃借用《家训》字面，而非援用其义，此亦鼠腊名璞之比，或者乃取以诠释《家训》，郢书而燕说，所谓一盲引众盲也。

25日，参观人文科学研究所及所属图书馆，与竹内实、尾崎雄二郎、梅原郁、吉川忠夫、砺波护、荒井健诸教授、麦谷邦夫、小南一郎二位副教授及富谷至助手相晤。荒井教授以所编《李义山文索引》、小南副教授以所著《中国神话与物语》相赠，梅原教授以所著《东京梦华录译注》及《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语汇索引》见赠。《东京梦华录译注》为入矢义高教授及梅原教授合撰，程功甚深。曩者，邓之诚先生所著《东京梦华录注》之出版也，入矢教授曾撰文讥弹其失误，颇中要害，虽以史学名家之邓先生亦为之折服。甚矣，学问之无止境，而为学之尤不可掉以轻心也！入矢教授已退休，现任花园大学教授。日本国立大学教授退休之后，往往就任私立大学教授。入矢其一也。人文科学研究所所属图书馆，素以收藏之富见称于世，入库纵观，殊有应接不暇之感。插架有台北影印宋本《施顾注苏诗》，仿《续古逸丛书》印制，凡34册，未有定价，询之馆员，云非百十万日元不办。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整理出版《苏诗》，尝托余访求此书，似此高价，哪可问津也。

26日上午，胜股助手来约逛书店，并传达兴膳教授意旨，云所购之书，不必付现款，日后由京都大学与书店结算。我们逛了中文出版社、汇文堂书店、东方书店及竹仙堂等处，书价奇昂，而一般战前出版的有参考价值的书，则加价10倍或12倍不等。我不欲增加京都大学负担，仅买一本为老友王叔岷在台北指导的学生所撰之《中论校注》，以作纪念，即此一本薄薄小书，亦折合2000日元了。前年，女儿贞平考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叔岷女公子国瓔闻讯，赴美相晤。

小儿女辈咸致慨于二老睽违三四十春，迨垂之年，尚不得一通音信，以道胜常。今来日本，得此戔戔短书，亦为蓄之。盖虽不得见故人之面，得见故人所评定之书，庶足以慰茫茫之海天愁思矣。竹仙堂主人羽田朋男自言罗振玉尝至该堂访书，并以所藏之铜器及拓片求鉴定，余略为指点一二。东方书店京都营业所课长井上庄治郎以所得《文镜秘府论校注》求签名，不欲拂其意，为题数语于扉页，盖亦附庸风流之流也。嘱其代访吉川教授所译《水浒传》一至六册，答应迟两天即送来会馆。下午，与京都大学文学部前任部长服部正明教授相晤，服部为世界知名之因明学家，即以于方觉先生所书寿字条幅赠之。把玩之余，大家以同登寿域相祝。继会见新任部长本田实信教授。日本教育制度，凡总长、部长等职，任期有限，期满即遴选替人。余来京都大学之日，正当新旧部长交替之时也。晚上，香港中文大学留日博士研究生李锐清君来访，以所得《九篇集》浼签名，并言1982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听过我的讲演。

27日，上午休息，下午2时，在京都大学作第一次学术报告，题目为《水浒释名》，我阐述了《水浒传》之得名，是由于史进在周原地区建号称王之故。此地区即《诗经·大雅·绵》所说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的周家发祥之地。周家、史家之经营水浒，俱为图王霸业，宋元话本之所谓变态发迹者，盖于此始基之矣。明人吴从先所见之《水浒传》，其首都为杭州而非汴州，盖史进于建炎二年始被镇压，则其首都为临安，无可疑者。窃疑此本即《录鬼簿》所著录的施惠之《古今诗话》也。至以宋江为小说主人翁者，当即明人所称之《宋江演义》。此文已交与《巴蜀论丛》，将于创刊号登出。听众有文学部长本田教授，平冈武夫、岛田虔次二位名誉教授，清水、兴膳、竹

内、梅原诸教授，小南副教授，讲师、助手、研究生及其他大学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手等40余人。晚6时，在清华楼举行欢迎宴会，除上列诸先生外，还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小川环树、佐伯富、田中谦二，教授谷川道雄、荒井健，副教授池田秀三，以及京都产业大学名誉教授池田武雄、高野山大学教授庄司庄一、大阪女子大学教授横山弘、爱知教育大学教授中钵雅量、立命馆大学教授笕文生、福冈教育大学副教授藤井良雄、关西大学副教授森濑寿山、龙谷大学讲师木田知生等20余人参加。佐伯名誉教授以《中国随笔杂著索引》、横山教授以影印《三遂平妖传》见赠。庄司教授即席赋诗为赠，并相约去高野山吃芝麻豆腐，余含笑领之。

28日上午10时51分，兴膳教授陪同乘山阳新干线去访问九州大学，下午2时26分到福冈，冈村繁教授、刘三富教师来车站迎迓，住大谷饭店，日本第一流饭店也，每日房金2.5万日元。刘三富教师为台湾高山族同胞，治中国古典文学，于韩、柳二家造诣颇深，以一外国人而能在日本著名大学分占一席之地，实为难能可贵。即为介绍与四川师范学院屈守元教授及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以他们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整理韩昌黎、柳柳州二家集也。晚6时，在平和楼设宴欢迎。

29日上午10时，在九州大学作学术报告，题目为《文笔新解》，由冈村教授主持，刘教师通译，町田三郎教授、福田殖教授、岩佐昌晖副教授、合山究副教授及助手、研究生等十几二十人都来听讲。文笔之分，自清代阮元、阮福父子以来，议论纷纷，都不得其要领，譬犹治丝而棼之耳。余乃就《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所引《文笔式》、日本沙门了尊《悉昙轮略图抄》七引□游（源为宪云），及日本《二中历》、《十二书体历》所载《文笔事》得知：诗、赋、铭、

颂、箴、赞、吊、诔，有韵谓之文；诏、策、移、檄、章、奏、书、启，无韵谓之笔。其言明且清，足以释疑解惑。刘彦和当日盖以其为人所共知的“常”，故略举其结论耳。下午，冈村教授、刘教师及牧角女士陪同渡海到志贺岛，参观金印公园，即发现汉倭奴国王印处也。园中有郭沫若先生题诗及杨尚昆先生题字，谛视之下，油然而生仰止之心，庄生谓：“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徐无鬼》）况二先生之同是四川人，而余与郭老于整理《盐铁论》一书尤有商量旧学之雅也。归途登潮望台远眺，福冈外港，海天一色，引人遐思，较之昔游之大连、青岛、钱塘江口，又别是一番气象也。

30日上午，会见九州大学总长田中健藏教授，医学博士也，晤言甚欢，索题名留念，并以九州名产丝织品见贻。继闻知女儿贞白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于是兴致勃勃地亲自安排贞白去化学实验室参观，其情殊可感也。冈村教授代表文学部以《九州大学学报》见诒，并为言《文笔新解》将以第一篇载入下期学报。刘教师则以精美茶具二套分别赠与余父女。下午2时50分乘新干线回京都，冈村教授及刘教师送至车站话别，不尽依依之情。6时30分抵京都。

31日，兴膳教授派郑重女士来导游，于是去京都的“王府井”二条名店街观光，沿途时见为非洲难民募捐队，有由小学生组成之绿化募捐队。日本绿化卓有成效，到处青山绿水，茂林修竹，郁郁葱葱，尚犹持之以恒如是，殊令人发深省也。晚饭后，作书与周达云先生，并附以屈守元先生介绍信，告以我将于4月3日访问东京，为期4天，如谋快晤，可与东京大学文学部户川芳郎教授联系。周先生祖贯广东，现已入日本籍，与守元相稔，守元嘱其在我访日时，多方加以照拂也。

4月1日，得波多野教授自横滨来信，告以4月6日东京

大学将为器举办学术讲演会，由他作翻译。当即作复，并致谢忱。下午2时，在京都大学作第二次学术报告，题目为《小说戏曲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当时史实，胪列11项例证以明之。文学部长本田教授、平冈武夫名誉教授、清水、兴膳、竹内诸教授及立命馆大学笈教授等约三四十人参加听讲。报告完毕后，兴膳教授谓余：“希望将此讲稿纲要，写成论文，准备在《京都大学报》发表。”余应以归国后润色成文，当即寄奉。晚上9时许，北京大学留学生马晓地君来电话，拟将造访。贞白告以我已入梦乡，改日欢迎串门。盖余在家有早睡习惯，数十年如一日，易地则皆然也。

4月2日上午，兴膳教授、赤松纪彦助手及一研究生驱车陪我父女游比睿山，传教大师开山灵地也。山路盘旋，数遇山公，服习游车，悠闲自得，不似峨眉山猴群之善揶揄人也。参观延历寺报本中堂，庄严宏伟，为之心旷神怡者久之。比睿山以春日看樱花著称，惜余辈之来，为时尚早，山高春寒，樱花尚含苞待放也。遂至山顶游园地，登回转展望台，举目四顾，右则京都，左则天津，近则琵琶湖，远则比良山，山色湖光，一一都收眼底。即在山顶进午餐。下午，至琵琶湖畔小憩，4时许，驱车回国际交流会馆。

4月2日上午10时40分，由富山大学讲师釜谷武志陪同乘新干线访问东京。下午1时39分抵东京驿，东京大学教授户川芳郎、研究生阪元弘子及东方研究会研究员丘山新来车站迓劳。户川教授任日本大使馆文化专员时，曾率在北京的日本留学生访余，阪元、丘山则皆在北京大学听余讲授《史记》、《汉书》也。户川教授招待在车站左近进午餐。当食，教授举似“无为者有为也”质疑。余应之曰：此君臣分工之说也，谓为君当无为，《论语》所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是也。为臣当有为，以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左传》所谓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是也。教授为之心服。为思昔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客有举“罄龟无腹”相问者，余举《淮南子》以答之，客乃为之涣然冰释。陶渊明所谓“疑义相与析”者，致足乐也。饭后，即雇车至宿泊处竹桥会馆，周达云先生已在大厅相候了。会馆在皇居对面，过街面许步即造宫门，主人盖为余就近往宫内厅书陵部之国立公文图书馆内閣文库访书方便计也。户川教授旋即陪同访观皇居，幽静淡雅，令人有城市山林之感。随即访问宫内厅书陵部，即昔之宫内省图书寮，战后改今名。主任研究官林惠一先生出示绍兴本《初学记》，古色照人，眼福不浅。回会馆后，作书与张宗植先生。宗植先生与端木蕻良先生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八班同学，曾写过小说，为鲁迅、茅盾收入所编《草鞋集》。余访日前，端木为余先容，希望能在东京相晤也。

4日上午9时30分，访问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文化研究所蜂屋邦夫副教授以车来迓，得晤伊藤漱平教授、田仲一成教授。田仲教授曾于198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相晤。蜂屋副教授则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为言曾在成都望江宾馆与四川大学道教研究所卿希泰先生等举行座谈。下午，参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得晤所长尾上兼英教授，又研究所刊行《东洋文献丛刊》现存者40种91册相赠，皆难得之书也。以数量多，将交船运寄北京西便门小区寓所。旋由田仲教授陪同，参观内閣文库，与图书专门官长泽孝三先生、内閣文库长小林苍海先生相晤，借阅弘治本《吕氏春秋》、李鸣春本《吕氏春秋》、《九篇集》、《集古今奇文品胜》及容与堂本《水浒全传》，《水浒全传》系清代翻刻本，纸墨恶劣，触手即为点污。

5日上午，由蜂屋副教授驾车，户川教授陪同，参观静嘉堂文库，途经世谷区松原，余诧曰：“此老友中村璋八教授寓

居之地也。”以未详其门牌番号，未得造访。静嘉文库建筑在小丘上，地势较为高阔。脱履登堂，于阅书登记簿上见中村教授签名，盖中村教授与静嘉堂为近邻，因得常来读书，一如余蜗居北新桥时，北京图书馆柏林寺阅览室，近在咫尺，每天必去读书，诚一生难得之乐事也。既而，户川教授谓余：“你想看什么书，都可借阅。”我告以：“有一次在北京召开的《水浒传》学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范宁先生介绍日本藏有一种明刊本《水浒传》，其第七十二回睿思殿屏风上写的，不是四大寇而是三大寇。当时，我没有问他是什么本，藏在什么地方。这两天在东京去了几个图书馆，我都借阅了所藏《水浒传》，毫无所得。今天，我还想碰一碰运气。”户川教授把我的意图告诉了管理员，于是他们把所藏《水浒传》都搬了出来，我一一翻阅，仍无所获。不过，在今天我写定此稿时，范宁先生已写信告诉我，此本是东京无穷会所藏，并以所摄此页书影见赠。当今之世，或得奇书，莫不视为枕中鸿宝，秘不示人。范宁先生这种助人为乐的无私精神，可以风世矣。所可惜者，在东京之日，以不知书藏何处，未得寓目，容当向日本朋友作将伯之呼，详其究竟矣。于是，我把所有《水浒传》归还之后，又索阅了元本《吕氏春秋》等书。既而奉邀入库参观，因得窥南宋楼藏书全貌。为思清末多故，闭关难守，敦煌秘笈，归安宝藏，相继流入异域，不禁令人有好家居竟为纤儿撞坏之感矣。是晚，波多野教授来访，告以将搬家回东京，以横滨为工业城市，大为烦嚣，不适宜于读书著书也。

6日上午，中村夫人中村敞子来访，告以中村教授去台湾讲学未归，有失迎迓，甚为抱歉。并赠以中村教授新著《日本阴阳道书四研究》一册，座钟一台，日式点心一盛。以应大正大学文学部长安居香山教授邀请，遂偕往汤岛会馆。安

居教授已在大厅相候，并以《纬书集成》卷一下一册见赠，盖至是而全书告竣矣。即商量今日活动，安居教授及中村夫人俱问余愿逛闹市区否？余告以：“我生活在北京40来年矣，真如苏东坡所谓‘万人如海一身藏’，即王府井亦未尝涉足。”于是选定逛山本书店、东京塔及九段增上寺。遂租车至山本书店，实欲访购《文镜秘府论校注》以应卒，以来日本时，随身仅带了百许部，远远不够也。书店主人山本敬太郎告以：“书曾来过两批，早已售光，第三批正在洽订中。”与丘山君前日告余之言相合。遂租车至东京塔，登展望台俯瞰，皇居、海港、新宿区高楼群、横滨市大烟囱，一一展示眼前，有如登景山而四望北京城也。下塔午餐后游增上寺赏樱花，繁花似海，淑景宜人，遂在樱花树下摄影留念。中村夫人旋亦辞去。2时，至东京大学学士馆作学术报告，由户川、安居二教授主持，题目为《汉代的黄老思想》，就“黄老于汉”的历史背景，刺取汉武以黄老求神仙，王莽以黄老谋篡位，说明前汉黄老之道之所以兴，及后汉黄老之道之所以衰之故。户川教授将我的论稿作了简要的译文。参加听讲者计有东京大学的伊藤漱平、田仲一成、尾上兼英、平山久雄、远藤光晓、木村清孝、蜂屋邦夫、前山慎太郎、影山辉国、吉田纯、村田雄二郎、蓑轮显量及阪元弘子，大正大学的渡会显、金子宽哉、宫泽正顺、峰崎奇雄，早稻田大学的芦田孝昭、前村繁树，庆应义塾大学的尾崎康，东洋大学的波多野太郎、穴泽辰雄，大东文化大学的山井涌，实践女子大学的田中有，千叶大学的泽田多喜男，驹泽大学的市川桃子，东方学院的末木文美士，宫内厅书陵部的林左马卫及周达云、大岛多四郎等30余人。田仲教授以所著《清代地方剧资料集》一二两辑相赠，金子宽哉讲师以《评译转法轮经》及《净土教研究》各一册相赠。会后设宴款待，户川教授在席上行令，要大家各

道家常，无烦客套。于是，人人致意，为叙平生；我亦一一应答，不胜惶恐。最后我说：“打从踏上贵国大阪国际机场之日起，即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又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我虽然看不懂日文等于盲人，听不来日本话等于聋子，说不成日本语等于哑巴，但是，在这些日子里，我生活在大家之中，不仅有强烈的同种同文之感，而且还有无拘无束的宾至如归之感，我一点也没有身居异国之感。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我们之间的文字之交吧！这是由于彼此之间像鱼相忘于江湖一般的神交吧！我衷心祝愿咱们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我衷心祝愿咱们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世代发展下去！咱们在北京再见！”话刚脱口，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林左马卫先生还以口琴吹奏中日名歌各一首助兴。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友好的气氛，杯筹交错，笑语频传，孔子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者，今日始身受之矣。

7日，乘新干线返京都，兴膳教授来车站迎接，即租车送余回会馆，告以明天下午开哲学座谈会，以我为中心发言人。于是以《吕氏春秋释名》讲稿付之，以便复制，以备散发。

8日下午3时，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系开座谈会，我就《吕氏春秋》之名阐发《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诸书，史部子部俱有以“春秋”命名者，而性质各自不同。汉人称《吕氏春秋》为《吕览》，以当时传本篇次为《八览》、《六论》、《十二纪》故也。古书往往以首篇为大名，而以序文为全书大尾；今《序意》篇在《十二纪》之末，正是古书旧式。但《序意》有“一作《廉孝》”之说，此与《序意》全无干涉；当是由以《有始览》所缺之篇目错入者；当于《序意》篇出之，而于《有始览》入之，如是，则《有始览》所缺者不缺，而《序意》篇所错入者得归原位，庶几毫发无遗憾矣。参加听讲者，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平冈武夫、岛田虔次、田中谦二、福

水光司，教授清水、兴膳、竹内、谷川道雄、尾崎雄二郎、砺波护、吉川忠夫、梅原郁、荒井健，副教授小南、麦谷、池田秀三，京都产业大学名誉教授池田武雄，大阪女子大学教授横山宏，立使馆大学教授笈文生，爱知教育大学教授中钵雅量，高野山大学教授庄司庄一，大谷大学副教授若规俊秀，福冈教育大学副教授藤田良雄，及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阮芝生，自言为钱穆先生学生。钱穆先生者，为余前在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时之同事也。晚上，醴会招待，以尽东道主之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伯富、小川环树，花园大学教授入矢义高亦来参加。入矢教授则刚从中国访问归来者也。

9日，由大阪女子大学横山教授陪同访问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战后，前北京大学教师今西春秋先生任教于天理大学，今西为余在北大相识精通满文之日本学者，今余来此访问，始知墓木已拱矣。馆藏善本书甚富，馆长植田英次先生、贵重书室金子和正先生殷勤接待，出所藏平安时代中期写本《赵至诗》一卷十七纸相示，为《全唐诗》所佚者，友人周绍良先生曾撰文献疑，然未足以贖人望也。余索观所藏明嘉靖七年刊本《艺文类聚》，有“高唐王府图书”藏书章，寒齐插架亦有是本，前有胡纘宗序、门人王宠书，有“延登”、“张氏宝藏”、“李印盛铎”藏书章。张延登者，明兵部尚书，王渔洋之岳父也。植田馆长以《秘笈图录》、《中国之古典》、《中国古版通俗小说集》、《天理图书馆通俗小说书目》各一册相赠。并雇车送余等至车站，再三称谢而毕。是日中午，横山教授招待在长寿饭店吃中国料理。天理市为日本中等城市，闻有中国料理者，不止一家，中国菜之为世人普遍欢迎可知矣。

10日上午，兴膳教授与高野山大学大平桂一讲师来邀请访问佛都高野山，先乘南海电铁至极乐桥驿，然后乘缆车

上山，高野山大学部长高木冲元，教授庄司庄一，副教授静慈圆、竹内弘行高揭欢迎标语在车站迎接，遂驱车至增福院宿泊。稍事休息，即至对面灵宝馆参观，馆长山木智教，一知名之美术家也，为导观诸展品，琳琅满目，应接不暇，走马观花而已。下午，开垦话会，出席者为高野山大学学长松长有庆，学监鹭峰本贤，学部长高木冲元，教授东智学、庄司庄一、楠见敏雄、密波罗凤洲，副教授静慈圆、日野西真定、越智淳仁、竹内弘行、岩见恭子，讲师藤田光宽、山阳加春夫、武内孝善、永崎亮宽，助手中村正文、山岸俊岳，四大天王寺高等学校讲师木下良范及中外日报社大阪支社记者常多升。松长学长致欢迎词，略谓：“《文镜秘府论》的整理校注工作，日本人没有做，王教授给我们做了，完成了四五十万字的巨著，真是功德无量，我们十分感谢！”并言：“高野山大学亦将开《文镜秘府论》课程。”余致答词，略谓：“我从事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校注工作 30 余年，对大师产生景仰之心，心里想，有朝一日，能参拜大师圣地，得见大师真迹，何幸如之。今天果然得到贵国给我以很好的机会，使我得偿平生夙愿，真不知几生修到矣。我做《文镜秘府论校注》，虽然锲而不舍，得以问世，但还留下一些问题，未能解决。书出版后，兴膳教授即以余未见的贵国珍藏之杜正伦《文笔要诀》见告，此为《文镜秘府论》北卷《句端》篇之所取资。我虽然在整理中订正了一些传抄失误，暗与相合，但是我想，说不定中国失传之书，足以补订我之未达者，贵国可能还有；他山之助，将伯之呼，尚望日本缙素两界学者有以教之也。”会后，松长学长索题词留念，为书“风月同天，岑苔同契”二句八言以酬之。上句用弘法大师语，下句则摘郭璞《赠温峤》诗字也。高木部长谓余：“今天刚从家中赶来欢迎您，见到您很高兴。”盖日本僧众虽出家，仍可享天伦之

乐，犹中国之居士或火宅僧然也。松长学长继以影印大师手迹《聋瞽指归》及《风信帖》并媵以高野山特产丝织手袋为赠。晚上，举行欢迎宴会，上来所开名单，除东智学、岩见恭子、山阳加春夫、武内孝美、永崎亮宽、山岸俊岳、木下良范、常多升没有参加外，其余都出席了。大家长跽相向，边吃边谈，谈笑无碍。余以右膝骨质增生，盘腿有困难，主人让我席地而坐。庄司教授为余指点食盒中之芝麻豆腐一色，不觉食指之欲动矣。松长学长为言明晨将请我吃茶粥，亦高野山秘传古方也。寻《北堂书钞》一四四引傅咸教：“闻南市有蜀姬，作茶粥卖之。”储光羲《吃茗粥作》诗云：“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陆羽《茶经》云：“闻南方有蜀姬，作茶粥。”然则此为晋唐古方，且传自蜀姬也。鹫峰学监则以高野山特产木制酒杯每套五枚，分别赠余父女及兴膳教授。入夜，席榻榻米作吉祥睡，身得安稳，心庶动乱，窗前明月流光，静如太古，自谓虽羲皇上人，亦不过如是也。坡仙《与胡祠部游法华山》诗云：“不将新句纪兹游，恐负山中清净债。”余来此山中，本欲藉山川之助，以写山川之灵，奈此心已如禅寂，不及得句，即已忘言矣。

11日晨6时，庄司来约听梵唱，盖僧众用唐代汉字音唱真言宗基本佛典《理趣经》，依稀可辨。7时30分进早餐，吃茶粥，且以蕨薇下饭。侍僧云：“已蓄之隔年矣。”饭后，冒雨游金刚峰寺，参拜弘法大师遗像。高野山为真言宗佛都，金则峰寺又为高野山总本山。真言宗以入定观念为基础，今日本全国有信徒1200万。每月28日为大师入寂之日，学生毕来参拜，庄司教授为余言如此。继展视大师《聋瞽指归》手迹，此即《三教指归》初稿，两本仅首尾不同而已，今定为日本国宝。又参观诸尊佛龛，盛唐佳作也，为大师请来品。又参观《佛涅槃图》，平安时代作品，日本定为国宝。昔年，余

游观四川大足宝顶山摩岩巨型造像释迦涅槃图，俗称卧佛，工艺精巧，叹为观止，今得此而为二妙矣。继会见高野山真言宗宗务总长阿部野龙正教授，即以四川美术协会副主席吕林先生为大师造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作颂词合璧一帧赠之，并媵以《文镜秘府论校注》一册。总长为医学博士，知余患骨质增生，为言调摄之方，至为详尽。并言：“明年为高野山大学建校100周年，现已开始筹备纪念，届时，欢迎再来做客。”余微笑领之。下午，参观奥院，为弘法大师入定之地，传言大师不死，每日照常供奉不衰。微雨沾衣，遂循参道信步走去，夹道为公园墓地，石碑林立，约两公里而遥。3时35分，乘车至八木，菅谷文则研究员来车站迎接，住橿原会馆。晚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岸俊男、橿原考古研究所第三调查室长河上邦彦、第四研究室长前园实知雄、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苏哲来见。

12日上午，参观橿原考古研究所，河上邦彦及苏哲作讲解员。菅谷文则以《大和考古学》、《大和植轮》、《大峰山寺出土遗宝》、《葛城之古坟及古代寺院》、《奈良平安之中国陶瓷》、《中国之都城遗迹》为赠。继由菅谷陪伴逛法隆寺，参观金堂、五重塔、大宝藏殿及梦殿。中午，菅谷招待在百乐吃北京料理。下午，逛东大寺，大佛殿之大佛，高14.98米，为世界最大之金铜佛。游正仓院、鉴真传戒院、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影堂在焉。鉴真东渡，弘法西来，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历史丰碑，今余皆得亲临其地，景行仰止，哪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也！游药师寺，为法相宗大本山，参观东塔，药师如来、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三尊像、圣观音菩萨像，皆日本定为国宝者也。其所藏吉祥天女画像、慈恩大师画像，亦日本之国宝也。下午4时50分，由西大寺驿乘火车返京都。

13日，休息一天。

14日上午，由赤松助手及一研究生陪同游岚山，即至龟山公园，拜观周总理《雨中岚山》诗碑，诗曰：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松夹著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
绕石照人。
潇潇雨，
雾濛濛，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诗作于1919年4月5日，廖承志先生书于1978年11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京都总局周恩来纪念诗碑建立委员会建，1979年4月16日邓颖超先生为开幕式剪彩。青山不老，白石长存，中日和平友好之历史见证也。曾在大连工作的二官信一先生为余等在诗碑前摄影留念，不期而遇之作也。旋下山，雇船游岚峡。岚峡以春日观樱见称，惜余等来晚，樱花大半凋谢，惟天龙寺一株垂樱盛开，似含笑以待余等之光临者，即于樱花树下摄影为识。天龙寺，临济宗天龙寺派之大本山，为京都五山之首，日人诩为特别名胜者也。继沿山路游大河内山庄，落座小仓山之南，洛西之名园也。下山至

抹茶席吃茶，茶为粉末状，汤呈碧绿色，一呷沁人心脾，妙品也。问诸主人，云是禅宗留学生菜西自宋传来者。寻元人韩奕《易牙遗意》下《诸茶类》有末茶二种法，日本《运步色叶集》的抹茶，即以石臼捣茶为末而成者，盖自其形状而言则曰茶末，自其制作而言则曰末茶。则抹茶犹今之言茶末，疑即《梦梁录》十六《茶肆》之所谓擂茶也。盖抹为宋代一种食品工艺，《东京梦华录》四《肉行》有“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景德传灯录》有“薄批明月，细抹清风”之说，故《梦梁录》十六《分茶酒店》有“细抹羊生脍”、“细抹笋筍”。《五灯会元》四《镇州普化和尚章》：“尝暮入临济院吃生菜，济曰：‘这汉大似一头驴。’师便作驴鸣，济谓直岁曰：‘细抹草料者。’”又十四《怀安军云顶德敷禅师章》：“有乐营将出礼拜起（讫），回顾下马台曰：‘一口吸尽西江水，即不问，请师吞却阶前下马台。’师展两手唱曰：‘细抹将来。’营将猛省。”苏轼《春菜》诗：“鲙缕堆盘纤手抹。”皆谓将食品所用之原料剁为细末也。又以抹这种操作与其他加工方法有别，因之即以冠其名焉。《东京梦华录》二《州桥夜市》及三《马行街铺席》均有“抹脏红丝”，又四《食店》有“大小抹肉淘”，《梦梁录》十六《麦食店》有“抹肉银丝”，“抹茶”即其比也。《法华经·提婆品》云：“悉以杂华抹香，供养七宝塔。”抹香即香屑。明汪佑订《朱子家礼》一：“主妇点茶。”按语云：“本条注：‘主妇执茶筴，执事者执汤瓶随之。’点茶，盖以神主棊前，先设盞托，至是乃注汤于盞，用茶筴点之耳。古人饮茶用末，所谓点茶者，先置末茶盖于器中，然后投以滚汤，点以冷水，而用茶筴调之。茶筴之制，不见于书传，惟元谢宗可有《咏茶筴》诗，味其所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风漱玉华，万缕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之句，则其形状亦可仿佛见矣。今人烧汤煎茶叶，而此犹云点茶者，存

旧也。”然则抹茶之为茶末，且自宋传来日本者，可无疑矣。为思今兹余之东征，颇见有中国失传之事物，而于日本遇之者。礼失而可求也，文献而足征也，《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其此之谓乎！随出岚峡，雇出租车返会馆，抵暮，竹内教授请在三条蟹道乐店吃海蟹，味颇鲜美。返会馆，即出现过敏现象，遂入浴，浸泡了30分钟后，即入睡乡，翌晨，病症霍然消失。由不服习，致有爽伤，今后当引以为口腹之戒也。

15日，访问关西大学，副教授松浦章来车站迎接，抵校即参观图书馆。图书馆藏书约110万册，今日为新图书馆开馆之第一天也。旋会见文学部长大庭修教授，老朋友也，即以《文镜秘府论校注》一册奉诒。大庭教授以所著《江户时代之日中秘话》及《木简学入门》见赠，并以大阪名产中菊球一枚囑转赠老伴，考虑何其周详也。于是共进午餐，有松浦副教授及复旦大学日本史专业研究生陶德民等6人在座。松浦先生以所著《李朝漂著中国帆船之间情别单》上下2册、《清代江南船商之沿海航运及〈郑成功研究论丛〉之介绍》见赠，又以日式团扇二柄及太阳能电子计算器一匣见赠。松浦先生治中日商业史，与么儿贞平为文字交者也。席上，大庭及松浦询问贞平在普林斯顿学习、生活情况，备极关切。饭后，出席中文合作研究室为余举办之座谈会，福永光司教授、坂本洋伸教授、日下恒夫教授、森濑寿三副教授及松浦副教授等人参加。福永教授为日本著名之道教学者，日下教授则是日本著名之满文专家也。坂本教授代表中国文学科以《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之《坂本一郎、增田涉两先生古稀纪念》及《寺井义正先生退休纪念》两种特集见赠。森濑副教授以所得《文镜秘府论校注》索签名，为书其事，所以识余之且感且愧也。晚上，回京都。

16日，由兴膳教授及神户大学笕久美子教授陪同访问神户大学，抵大阪站，神户大学教授伊藤正文来车站迎接，随即换车至神户。神户大学背山面海，校舍星罗棋布，错落有致。会见文学部长高尾一彦教授，以《文镜秘府论校注》、《颜氏家训集解》各一册奉赠文学部。高尾教授为日本专家，善吹笛，为言笛与尺八之别，至详且尽。留进午餐，在座尚有神户大学副教授山田敬三郎及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孙昌武。以神户与天津结为友好城市，两校交换教授，颇为频繁也。饭后，伊藤教授陪同逛六甲山，登六甲山天览台纵观，神户大阪，一览无遗。旋下山作跨海游，神户港为日本吞吐量最大之港口，与横滨东西相映；海鸥随游艇翱翔，出没浮沉，无比自在。登岸游人工岛，上人工岛旅馆十五楼小憩，日已西斜，海上归艇，纷至沓来，如飞鸟之投林也。余等游兴亦尽，遂乘电车至明治屋吃红烧牛肉。屋内布置，一仍明治之旧，古雅宜人。神户牛肉以肥嫩驰名，不知与《水浒传》所传花糕般者果何如也。牛肉本产于但马村，以由神户出口，故以神户牛肉名，亦犹栗子出产河北，而由天津出口，故日人称为天津甘栗也。饭后，搭车回京都，伊藤教授中途下车，余等抵会馆已10时许，不及澡浴，即匆匆入睡乡了。

17日上午，清水教授陪同参观京都大学所属图书馆，时正值展览善本，为京都诸收藏家近卫文库、平松文库、河合文库、菊亭文库、中院文库、谷村文库、陶庵文库、皆川文库、清家文库所藏的一部分，及新宫本、铃鹿本、奈良绘本等，共计41种。其中以近卫文库收藏之明嘉靖二十年活字本《栞城集》、《谷村文库》收藏之宋宣和六年刊《法苑珠林》残存第七十五卷、《永乐大典》卷一二九二九之一二九三〇残存一册、元至正三年刊《百丈清规》、清家文库收藏之钞本《周礼单疏》卷一之四、卷七之八、卷十二之十四、卷十八之四

十共 15 册，最为宝贵。继入库参观，插架有《中国杂志创刊号汇集本》，都凡 1500 种，旁收博采，不遗余力，盖亦有心人之所为也。中午，清水、兴膳二教授邀请在京都大学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共进午餐。下午，接受京都大学文学部赠书，大半为影印善本，既精且多，令人顿生欢喜心。兴膳教授谓余：“书多太重，航寄太贵，准备交船运寄北京。”余深谢之。晚上，小川环树、岛田虔次、入矢义高、清水茂、兴膳宏、小南一郎、池田秀三、赤松纪彦诸位于青冥餐厅醅燕欢送，清水教授即席赠诗二首，本赠言之义，道惜别之情；今夕何夕，一觞一咏，都将为他日天末怀人张本也（其诗及余和诗，已见前《从对对子学起》）。青冥自诩为正宗北京料理，主人得知余为北京来客，且为中国烹饪协会特邀顾问，备加卖力，山珍海味，无美不备，惜余以胃弱，未敢放开肚皮大嚼；不然，享受这般美味佳肴，又将侈然继乡贤东坡先生而作续《饕餮赋》也。

18 日上午 8 时许，与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么儿贞平通电话，告以访日讲学，胜利完成，将于明日回北京，并问其博士预备资格考试准备如何。虽远隔重洋，问答往返，无比清晰，不啻耳提而面命也。9 时许，赤松、李锐来约游东山，参观曼殊院门迹。其为传教大师所创始，江户初期名胜庭院之代表也。所藏黄不动尊造像，为日本国宝。有中学教师率领学生多人来游，一色青制服，备见精神，席地而坐，教师口讲指画，循循诱导，亦进行爱国教育之一端也。中午，即在一乘寺竹之町弁天茶屋吃香叶茶，进自然食，颇有野趣。下午，兴膳教授、赤松助手邀同散步，遂至银阁寺桥，沿哲学之路，得得偕行，经法然院墓地，寻河上肇、内藤湖南之墓，谛视碑刻，聊寄悼怀，其他文学家、艺术家之俱会一处者，不悉睹也。后至净土寺南田町吃汤豆腐，即中国之沙锅豆腐，特

“药味”不同而已。日本料理之豆腐，据云为鉴真所传，则其来尚矣。其在中国，则所谓“布帛菽粟”者，几如开门七件事之不可一日无也。在我的老家四川，则吃豆花饭，更是家常便饭，故四川菜多以豆腐名者，如成都北门外之陈麻婆豆腐，乐山大佛寺之口袋豆腐，此皆远近闻名者。麻婆豆腐配料必须用菜子油、牛肉末，而佐料更必须用川椒、郫县豆瓣酱、永川豆豉，在滚油中加工制成臊子，然后下豆腐，即可保持麻辣烫之特色。若余前在香港所吃改良川菜，及此次在日本所吃中国料理之麻婆豆腐，全然无此风味，盖配料不易配齐故也。至于豆制品，则夹江腐乳、唐场腐乳与镇江干丝，俱为上品，而夹江腐乳之馨香松软，尤与北京王致和之臭豆腐有异曲同工之妙。豆腐，相传为淮南王刘安所作，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七《读范石湖文跋》、李实《蜀语》、李时珍《本草纲目集解·豆腐》、魏崧《壹是纪始》卷十九都有是说。其在川菜食谱中，亦有文献足征。林洪《山家清供》载有“东坡豆腐”云：“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油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寻东坡《蜜酒歌答二犹子与王郎见和》：“脯青苔，炙青蒲，烂蒸鹅鸭乃瓠壶。煮豆作乳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贫家百物初何有。古来百巧出穷人，搜罗假合乱天真。”王十朋注：“次公曰：‘以苔为脯，以蒲为炙，以瓠为鹅鸭，以豆为乳，以脂为酥，以油为烛，以蜜为酒，皆百巧之所为也。’”豆乳即豆腐，以豆腐亦百巧之所为，说最宏通，较之刘安所造说，近于事理。陆游《剑南诗稿》卷五十六《邻曲诗》：“洗酤煮黎祁。”原注：“蜀人以名豆腐。”则豆腐在四川曾有黎祁之异名矣。《梦梁录》卷十六《面食店》载下等人求食粗饱之店卖煎豆腐，则豆腐之为人们普遍欢迎久矣。至如高野山之芝麻豆腐，则亦北京信远斋杏仁豆腐之比，以其形似豆腐为名耳。其名虽同，其实则

异。而四川又有鸡豆花一款，系以鸡脯为原料制成，则仿豆腐制作者，且不限于素菜了。

19日上午，动身回国。兴膳教授、小南副教授、胜股讲师、赤松助手都来机场送行，依依话别，互道珍重，遂于9时40分乘日航783次班机，由大阪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12时20分到达首都机场，朱中英及德容、贞慧等已在机场相候了。

1996年6月5日，成都大学副校长钟树梁教授来函曰：

承示《访日记》原委，备见内情，至以为慰。老兄为国增光，继中日前哲之芬轨，开后代学术交往之良则，诚以待人，礼以解难，宏通感召，应对裕如，非才高德劭者，岂能达到。祝访日成功并致敬意。

未达之知与不虞之誉

余平生治学，以“不护己短，不掩人长”八字自律。良以护短则自以为长，而不知其短，即人有知其短而不肯以相告，则将毕生不知其短，不亦大可悲乎！宋人李之彦《东谷所见》有言曰：

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东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

明赵南星撰《笑赞》据之（《赵忠毅公集》），而为之赞曰：

学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

吾读其书，不胜惶恐之至，乃兢兢焉以“不护己短”自警。尝于1988年5月1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91期发表

《晓传书斋讼过录》：

“四人邦”倒台后，余得重见天日，乃以“争朝夕”精神，整理幸存书稿（被抄去书稿已誉清的，还有《汉书补注补》一函四册，《两唐书艺文志注》一夹板八册，尚未退还，希望有关人员重视版权问题），迄今已出版十许种，其单篇论文亦不在少数，朋友们都说我获得了丰收，至有称为“千万富翁”者（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5月13日第4版），其实早已突破千万大关，而向2000万字迈进了。出书既已云多，错误亦复不少，兹将已发现者，公之于世，此亦引火烧身之一片诚意也，至希知我爱我的广大读者，有以进而教之！

第一事

《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页267行10：“是年，10月14日，吴敬梓卒，年54岁。”（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此条当删去。敬梓于乾隆始举鸿博，哪能于康熙三十三年遽奄歿也。（今案：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毓罍同志亦举此事见告，盖不知余已自讼及之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过矣人皆见之，此大幸事也，而陈君乃举以见告，岂非余之不护短有以致之与！）

第二事

《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序录》页六至页八，列举清顾千里、纪昀……之说，以证其书作于齐世，固已。寻梁元帝《金楼子》卷四《立言篇》下：“管仲有言：‘无翼而

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又曰：“古来文士，毕世争驱，而虑动难固（周），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隽也，《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可拟于昆虫，施之尊极，不其嗤乎！”案：此《文心雕龙·指瑕篇》之文也，《文心》于“可不慎欤”之下，一滚说下去，《金楼子》无端分为两截，非也。刘彦和时代较梁元帝略早，当彦和以此书于沈约之后，约“大重之”，其时，《文心》必因而流传，故梁元帝得以节录之耳。此尤为《文言》一书写成于齐，流行于梁之的证也。

第三事

《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西卷《文笔十病得失》页451注三：“梁元帝《春日诗》：‘春人春不见。’”案：此注不切。湖南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褐彩诗文瓷壶上书五言诗一首云：“春水春池满，春树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湖南教育学院陈蒲清副教授提供。）《文镜秘府论》所引之“春人对春酒”，当同出一源，惜尚不能得其主名也。

写《讼过录》既竟，还想补充几句：自知我的失误，决不止此，由于掉以轻心，遂使谬种流传，貽误天下后世；继而出于紧迫之责任感，觉得必须与过去之失误勇决，乃起而作出初步的自讼。通过这些年的实践，益知书囊之无底，而为学之尤不可以无年也，录此将以为他日之自鉴云尔。

《意林》卷五载仲长统《昌言》：

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

此三奸者，尤为著书立说之大戒，故余以“不掩人长”自律。《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1723年癸卯，雍正元年，李煦69岁。”据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二：“《御制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康熙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御撰《律历渊源》中第三部也。”责任编辑闻性真同志谓余曰：

《数理精蕴》康熙十三年纂之说，不确。因此书乃康熙末年所编，参与其事的主要成员梅珏成于五十二年始调到蒙养斋，盖算馆方成立也。况此书之主要内容包括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后传入中国之西方数学，故康熙十三年不可能编纂此书。邵氏与后来之《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七叙此皆误。又《历象考成》四十二卷，清康熙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御撰，时间亦非是。

其说至确，即据以载入，两证余说之失误也。

《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复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刺，失于本宗。乃知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从此分焉。”余撰《校注》云：

贾岛《二南密旨·南北二宗例古今正体》：“宗者，总也，言宗则始南北二宗也。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二句显意。南宗例，如《毛诗》：‘林有朴橄，野有死鹿。’即今人为对，字字的确，上下各司其意。如鲍照《白头吟》：‘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如

钱起诗：‘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此皆宗南宗之体也。北宗例，如《毛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此体今人宗为十字句，对或不对。如左太冲诗：‘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如卢纶诗：‘谁知樵子径，得到葛洪家。’此皆宗北宗之体也。诗人须宗于宗，或一联合于宗，即终篇之意皆然。”此亦于文学分南北宗之说也。

1982年，余第一次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去讲学，饶宗颐教授以所撰《中国古代文学之比较研究》五《文学典与释典·借用南北宗以喻诗文派别》（1980年10月，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32册）见贻，内外采获，足以补余之不逮，爰彙录之：

六朝以来，南北对峙，风气既殊，互为轩轻。《北史·儒林传》已论南北学风之异。清许宗彦《纪南北学》谓：“经学自东晋以后，分为南北；自唐以后，则有南学而无北学。”（《鉴止水斋集》卷十四）唐神清《北山录》第四《论文学分南北》谓：“宋风尚华，魏风尚淳，淳则寡不足道，华则多游于艺。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枝叶生于辞行。”同书第三《论佛学分南北宗》云：“后诸学者，以文殊为法性，以慈氏为法相，……自伐其美，致使西极（印度）东华（中国），今到于今，有南北宗之异也。故南宗焉以空、假、中为三观，北宗焉以遍计、依他、圆成为三性也。而华严以体性、德相业用范围法界，得其门统于南北，其犹指诸掌矣。”此中唐佛教折衷之论也（神清于元和中终于梓州慧义寺，见

《宋高僧传》六)。然自禅宗崛起，能、秀分途，能不度（大庾）岭，“天下散传其道，谓秀宗为北，能宗为南，南北二宗，名从此起”（语见赞宁撰《神秀传》）。荐福弘辩禅师答唐宣宗禅宗何有南北之名，云：“开导发悟有顿渐之异，故云南顿北渐，非禅师本有南北之称也。”（《禅林类聚》一）此乃与神清所揭西极东华共同之南北宗，大异其趣。然禅门南北宗之影响独巨，人多接受此说，而浸忘旧义矣。

空海大师于贞元二十年十二月至长安，留唐三载。归国著《文镜秘府论》。自云：“阅诸家格式，勘彼同异。”故王昌龄《诗格》，杼山《诗义》，皆在甄采之列。其书南卷《论文意》篇，曾借南北宗一词以论文云：

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谊谪居长沙，遂不得志，风土既殊，迁逐怨上，属物比兴，少于风雅，后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刺，失于本宗。

乃知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从此分焉。

以司马迁属之北宗，贾谊属之南宗，汉土旧无此说，谊原籍洛阳，以南谪楚土，遂以隶南宗。篇中“迁传于贾谊”一语，年代明有舛错，各本似皆如此（参小西甚一《考文篇》，又参三七页附注），未喻其故。《论文意》上半取自王昌龄，下半取自皎然，众所共悉。若其《眼心钞》起自“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句，共四十四凡，比《文镜》条例更为清晰。昌龄《诗格》存于《吟窗杂录》者已非完帙，又有《诗中密旨》，俱无此段文字。故知以司马迁为北宗，贾谊为南宗，必非出自转引，谅为空师自撰，揣其意，似以骚人刺怨者为南宗，风雅不失

其本者为北宗。

诗论之区分南北宗，见于题贾岛作之《二南密旨》（已见《校注》注19，此从略），观其例句，似以虚而尚比兴者为南宗，实而用赋体者为北宗。

又释虚中著《流类手鉴》云：

诗有二宗，第四句见题是南宗，第八句见题是北宗（《吟窗杂录》卷十三）。

似以见题先者为南宗，见题后者为北宗，前者顿而后者渐，意颇暧昧，未知然否？

词家亦有借南北宗立论者，清张其锦为《梅边吹笛谱序》云：

南宋词有两派：一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则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宗，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

所见颇新，以清空属南宗，豪放为北宗；惟合白石与梦窗为一派，似有可商，未为确论。

董其昌论画揭南北宗，亦假禅立说，最为脍炙人口。他若张作楠之《梅籜随笔》，辨道家有南北二宗（见《越缦堂读书记》），剿袭陈说，不免于牵强。论文说诗，假南北宗以立义者，代有其人，其实与释氏原旨无关，只是借喻而已。唐人假南北宗拟以顿渐，记有僧问越州石佛晓通禅师：“如何是顿教？”师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渐教？”曰：“云生碧汉。”（《五灯会元》卷十六）以景色比方，亦饶诗意。取南北宗以喻诗，陈义不过如是而已耳。

饶先生说南北宗，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当《文镜秘府论校证》出版时，未得征引，已于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出版之订补本《文镜秘府论校注》附录五《补注》（页799）增补矣。如上述二事，乃知我者以我之不护短，故乐于匡我之不逮也。亦自己所未达而呼将伯助于者，如我写《我与〈文心雕龙〉》，言明人刻书而书亡，仅据《书林清话》七“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为言，印象中前人言此者尚多，一时想不下来了，于是驰书向屈守元君请教。守元君于1996年4月25日复书云：

承问“明人刻书而书亡”一语，记得是陆心源《跋婺州本九经》之言，顷检二十卷本《仪顾堂集》及《仪顾堂题跋》未见，而二十六卷本《仪顾堂集》及《续跋》则未找到，古文所原有此书，今书亦混乱无纪，可浩叹也！其语本之《日知录》十八所谓“监本乱改古书，书未亡于秦火，而亡于监本之刻”。鲁迅《准风月谈》谈《四库珍本》亦有此语，注者皆不明出处。

又于1996年4月27日赐书云：

昨日宾朋杂沓，卒卒作书，不知所云。今日将手边有关“明亡书”资料稍细检阅，谨书记如下：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杂言图辨跋》云：“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陆心源刚父》条下云：“昌炽案：存斋《仪顾堂题跋》言：明人书帕

本刻书而书亡，又纠汪刻衢本《读书志》之谬，谓不如不刻。善矣！然其所刻丛书，亥豕纵横，不可殫述，几尘风叶，未可轻下雌黄也！”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书帕本之谬》云：“然则昔人所谓刻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鲁迅《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云：“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书亡。’”鲁迅之言抄自二叶，或直引存斋，皆不可知。人文社本注释，于此，竟一字未提也。

案：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条云：“此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版视南监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然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

存斋仪则亭林，其言即本之于此；亭林直指监刻，而存斋、二叶，则但归咎书帕，其度量相去远矣。

今国家专设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其机构不让于南北监，不知诸公读亭林书否也？

余又尝读周美成《少年游》词而未达，驰书向钟树梁君请教，树梁君于1990年9月8日复书：

久未通候，殊深歉仄。昨得8月24日大札，敬悉一切。承垂询周美成《少年游》词之作者，余意作者即美

成，此词温厚绵密而又疏快之境，断非他人所能拟作。今之论者，或衡诸史实，证以年月，乃觉多所抵牾，于是以此词不属于邦彦，恐非知言。窃以词家之作，非皆纪实，不可胶柱以求也。因念我在入川大时，曾有小令多首，求正于路金坡先生。路先生时居峨眉（我已休学回蓉）。一次吴君毅先生过路先生书斋，于案头得观拙作《少年游》、《临江仙》、《菩萨蛮》、《霜天晓角》共20余首词，乃大激赏，竟于返蓉后特来访我，顾询多端。拙作诸词，吴先生竟皆能背诵，于《少年游》特喜其下阕，称赞弗置。兹将此词抄录于下，数十年前之少作，未敢有读方家，只以论及美成《少年游》之作者问题，故连及拙作，欲借以说明一己之所见。

少年游

秦关远上路逶迤，路逐乱云飞。立马江干，
山青未了，风雨四天迷。碧城别后多萧瑟，佳
景系人思。曾是湔裙，蘋花满，轻棹渡江迟。

我作此词，并无本事可循，亦非自己有何恋情，且亦并非有所寄托，只是意有所触，情亦如有所往，遂构此缥缈之境以表抑郁之思。秦关当时我并未去过，碧城亦无所借指。湔裙云云，乃化于前人词句“白蘋花满湔裙处”。但此词后阕，当时确系神思之极，词句乃破空而来，不自知其所以然。但“轻棹渡江迟”一语，又确系以情遣词，以词副情，郁思之极而忽得此句，并不想（亦不愿）有所依傍。直抒胸臆，何有于他。今若就拙作此词而考查我少年时之经历，则大误矣！作者亦蒙冤莫解矣！

鄙意以自己作词之体验来测度古人，或亦有可参考者。唐宋小令之作，类此者多（当然有句句征实，言言可考者）。若以气度、情韵、境界、音调来求作者，则此《少年游》词似非他人所能作。不难于新奇、纤柔（他人多能之），而难于浑厚真挚且又流宕飘逸，故余以为非美成莫属。狂言寐语，未必有当，请摘其谬误为幸。

余以为美成《少年游》词，涉及与李师师风流韵事，世之谈论者多矣，尚未有就词本身之气度、情韵、境界、音调来求作者，此亦一家言也，爰过而存之。

《易·乾·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今余囊括为二言，“不能则学，不知则问”。学问之道，此其荃蹄欤！是以我之于人也，不知则问；而于人之于我也，则有问必答。中央民族学院苏晋仁教授通过该校图书馆馆员乔仁诚同志以小笺问余：

《宋书·乐志》一所载王僧虔表：“王度昭奇。”（《册府》引作“王庭”）又《乐志》四所载《济济篇》：“追念三五大绮黄。”疑“大绮黄”是“大庭氏、黄帝”，绮为何帝？

余告以“王度昭奇”者，昭十二年《左传》：“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即王僧虔文之所本。《后汉书·安帝纪赞》：“安德不升，秬我王度。”沈约《鼓吹曲·朝运集》：“金玉昭王度。”俱用此文。《册府元龟》作“王庭”误。至于“大绮黄”、“绮黄”疑当做“黄绮”，为与下句“去来同时此未央”

趁韵，故倒用“黄绮”为“绮黄”。陶潜《桃花源诗》：“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谓四皓之夏黄公、绮里季也。《艺文类聚》六十四引庾阐《闲居赋》：“黄绮絮具云栖。”《南史·阮孝绪传》：“周德虽兴，夷齐不厌薇蕨，汉道方盛，黄绮无闷山林。”王维《送李太尉赴上洛诗》：“若见西山爽，应知黄绮心。”俱是也。“大绮黄”与“追念三五”对文，大非大庭氏，黄非黄帝，《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五帝称首，已列入“三五”。

1990年9月9日，美国倪豪士教授来函请问：

《史记·管晏列传》的“越石父”的“父”，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古代叫老人的称号？

我去函告诉他：

《说文》又部（父）下段玉裁注：“经传亦借父为甫。”又用部：“甫，男子之美称也。从用父，父亦声。”段玉裁注：“《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穀梁传》曰：‘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士冠礼》：‘字辞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当。’注：‘伯仲叔季，长幼之称。甫是丈夫之美称。’按：甫者，男子之美称，某甫者，若言尼甫、嘉甫、孔甫，谓之且字，且者，荐也。五十从伯仲，乃谓之字，以下一字为伯仲叔季之荐，故曰且字也。甫则非字，凡男子皆得称之。”今案：《士冠礼》：“惟其所当。”郑玄注：“甫是丈夫之美称，孔子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类。甫字或作父。”贾公彦疏：“知甫是丈夫之美称者，以其人之贤愚皆以为字，故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穀梁

传》云：‘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美称也，是也。云‘孔子为尼甫’者，哀十六年：‘孔丘卒，哀公谥之曰：哀哉尼甫。’因字号谥曰尼甫也。云‘周大夫有嘉甫’者，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来求车’是也。云‘宋大夫有孔甫是其类’者，案：《左氏传》桓二年：‘孔父嘉为司马’是也。郑引此者，说有冠而为此言之意，故云‘是其类’也。又‘甫字或作父’者，字亦通，或尼甫、嘉甫、孔甫等见为父字者也。”段注即据贾疏为说也。

去讫。不久，倪豪士教授专程来北京晤言，他说：“我们组织力量，正在翻译《史记》，就是以王先生主编的《史记注译》（1988年11月，三秦出版社出版）为底本。”我说：“《史记注译》也不是尽善尽美，以后发现问题，咱们大家商量，妥善处理。”盖我之为人也，平素即以助人为乐，不以掌握一点东西而自私，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

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为了贴近生活，读书为了丰富生活。一天不读书，我就觉得索然无味。一天不读书，我更觉得有不殖将落的迫切感。人犹是此人也，则时时思所以自超；学犹是此学也，则天天思所以自立。于乃朝斯夕斯，日新又新，日知其所有，月无亡其所能。沈浸浓郁，日就月将。人曰悬车，我乃炳烛。回顾过去，面向未来，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截流，更不能敝帚自珍，孤芳自赏。人将休矣，我则不休，鞠躬尽瘁，不知老之将至。刘子曰：“谚所谓‘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左传》昭公元年）吾何幸耄及而将知也！昔宋人晁迥有《耄智余书》三卷（日本就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能《六祖坛经》影印本有晁子健后记言：“七世祖文元公（迥）著有《耄智余书》三卷。”晁明远迥享年84岁），老有所为，令人景仰。今余年已过84岁，犹当骎骎孟晋，以孔子

“止，吾止也”之叹自警（《论语·子罕篇》），岂可谓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余之从事于整理古籍也，泰半为总结性工作，居恒以责备求全自律，不以不知而问为可耻，而尝有将伯之呼。知我者亦莫不声应气求，有求必应，从而使余坐收集思广益，取精用弘之功。有如余之作《盐铁论校注》时，汉口徐行可先生即以所迻录之陈季皋先生《盐铁论校录》（含黄季刚先生《校记》）见赠；作《汉书古今人表疏证》时，复旦大学黄霖先生乃为余从上海市图书馆迻录俞樾弟子孙圃仁《汉书人表略校》见馈；作《郑康成年谱》时，山东王献唐先生（时客居板栗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所藏王丙曦《郑康成先生年谱》稿本见示；作《文镜秘府论校注》出版后，余访日讲学，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以杜正伦《文笔要诀》见贻（1991年12月，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订补本《文镜秘府论校注》已收入）；作《吕氏春秋注疏》时，兰州大学彭铎教授以所撰《吕氏春秋校记》见赠。凡物聚于所好，诸如此等，皆余前所未见者，一旦得而称之，以张吾军，深为大幸。此不仅为诸书读者之益友，抑且为诸书作者自吕不韦以下诸家之功臣矣。

余每治一书，率皆左右采获，上下求索，以求得历史之总和，从而论证其历史地位，及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之作用及其价值，因而都要做出一篇总结式之序言。有如《汉书古今人表》吾溢之为先秦人名大辞典。《风俗通义》吾以为即后代《通典》诸书之初祖。《吕氏春秋》，吾谓其原书编次当为《六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不韦生前所主编，故其《自序》在《季冬纪》之末，此古书旧式也。《八览》为其门客于不韦既死之后，发愤而作者。故《六论》、《十二纪》为吕不韦之帝秦策，《八览》为吕不韦门客之过秦论。故《八览》第一篇为《有始览》，讥始皇之用

吕不韦有始无终也。第二篇《孝行览》，则讥始皇之迁其母太后于雍也。当时悬之咸阳市门者为《十二纪》，盖以治历明时，为统一天下之所需。《周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挾日而敛之。”此其义也。高诱乃欲字句间求其误，至欲辇载其金，此高氏所谓“失其本真”（高氏《吕氏春秋序》）矣。又如《文子》，吾以为秦汉之际，为道家言者有两个老子，一为为关尹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一为假《文子》以行，即为黄老学者所依托之老子，《淮南》则宪章《文子》而作者，故《文子》为《老子》之疏义，而《淮南》又《文子》之疏义也。能知此者，然后去读《老子》，读《文子》，读《淮南子》，庶几大通无碍，毫发无遗憾矣。由于我所整理诸书，实事求是，不为妄作。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篇》）此我之座右铭也，因是已出版诸书，赢得不少好评。如《人民日报》发表了评介《文心雕龙校证》的文章，以为“根据传本及援用前人征引的资料，加以校勘，纠谬正讹，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定本。”（详《我与〈文心雕龙〉》。）又如日本《朝日新闻》载评介《耐雪堂集》的文章，一则曰：“在日本学术界获得了很高评价。”再则曰：“王利器氏认为大观园系作者曹雪芹的胸中之理想，只在《红楼梦》里。这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实在是一种卓越的意见。”（详《谁说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又如1992年10月20日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63期所载于微《重读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写道：

第一次读到王利器先生的《颜氏家训集解》，还是在10多年前。那时虽然也算不得是它的第一个读者，却也是最早的一批读者中的一个。因为我有幸地担任了这本

书的责任编辑，拜读的是作者的手稿。我确实被这本书稿吸引住了。

虽然事隔多年，但记忆犹新。首先是原稿那整整洁洁的稿面，清清楚楚的字迹，征证广博的集解，令人感觉到作者不愧为志（老）学者，治学的态度严谨，功力深厚，作风细密，留下深深印象。

其次是《颜氏家训》这部古籍，它本身就是一部古典名著，内容丰富，议论横生，文笔生动，趣味隽永，有人用“一个父亲的叮咛”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其内容与主旨，颇能得其精神。他是一位老于世故的作者，聪明睿智的学人，机灵权变的政治活动家，在平安地度过乱世的风云之后，向他的家族子弟讲述自己的经历风险、体验教训、思想心得，作为一种思想、道德、文化、政治的训导。颜氏是个大家族，而他所处的时代，政权频繁更叠，风云时时变幻，生命如草，杀人如麻，多少显赫家族，暴兴暴亡，而颜之推一家却乱云飞渡，从容不迫，趋利避害，维持家族的生存、体面与尊严，确属不易，确需有一种原则、思想的支持与手段、方法的应付。虽说颜之推撰写此书，名为“家训”，贯串了道德与精神的说教，但它却是有机地寄寓于优美的言词、动人的故事与丰富的学问、知识之中。作者谈历史，谈时事，谈风俗，谈掌故，谈文学，谈养生，谈教育，谈家庭，谈哲学，谈道德，谈宗教等等，侃侃而说，娓娓动听，不像后世不少与之同名“家训”的书籍那样面目死板，语言干枯，内容单调，令人生厌。尤其书中一些生动活泼的故事趣闻，明晰哲理的议论，更能动人心扉，所以成为千古名著。读这样的书稿，实在可说是编辑工作的一件乐事。

第三，回说到王利器先生《集解》的本身。此书不

论在材料的丰富、校勘的细密，还是在考证的细密、判断的可靠等方面，在现在的古籍整理的作品中，都是当之无愧的上乘之作。例如，在版本、注本的选择方面，《集解》既能广征群书，又能明其源流，而做到选择分明，不遗不漏。《颜氏家训》历代的引用、评论、注释、刻本就很多，清代以来，更有多种注本、刻本以至专门研究作品，如周祖谟先生的《音辞篇注补》等等。在众多的注刻本中，作者选取的《集解》底本是清代赵曦明注、卢文弨校勘并补注的《抱经堂丛书》本，这是很恰当的。因为在旧注旧刻各本中，卢校刻本所据为宋钞本，是一个渊源有自、校注比较精良的本子。这说明作者的眼光是很犀利准确的。此外，用以校勘与集解的注刻本与其他文献也很丰富，计有元廉台田氏修补重印宋淳熙台州公库本、海昌沈氏静石楼藏影宋钞本、秦曼君校宋本、董正功《续家训》宋刻残本、明建宁府同知程伯祥通判罗春刊本、程荣《汉魏丛书》本、胡文焕《格致丛书》本、何允中《汉魏丛书》本、朱轼《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本、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本、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等等，又有敦煌卷子本《勤读书钞》、刘清之《戒子通录》、胡寅《崇正辨》、吕祖谦《少仪外传》、曾慥《类说》中引用过《颜氏家训》文字，其中不少是前人未及引用以校注或者根本未见过的材料。海内有关《颜氏家训》的版本，几乎网罗无遗。这部《集解》稿，可说是集从前许许多多注家、评说、版刻之大成的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颜氏家训》新整理本。王利器先生在《叙录》中自问他的这部《集解》“不知能免于颜氏所讥之‘妄下雌黄’否也”这句自谦的话。在如此丰富的材料引征的基础上，加上作者丰富的学识与敏锐的判断力，使

他的这部《集解》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是无疑的。

作者的善于考证版本，举一个例子，可见一斑。作者在《归心篇》中，广泛征引《广弘明集》与《法苑珠林》等佛书中引用的《家训》的文字以相校勘。其中“儒家君子，尚离庖厨，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一条及以下文字，《广弘明集》引用时冠以《诚杀·家训》，《法苑珠林》又著录有《诚杀训》一卷，并有“一本作××”的说法，作者据此判断，唐时《家训》当有别本流传《诚杀》一篇且单行。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使读者对于《颜氏家训》的版本又增加了一些新知识。

我感到《集解》作者王利器先生不仅占有的资料是丰富的，在资料的运用上，也常是匠心独到、游刃有余的，所以所作判断，常有独到之见。他在比较了《颜氏家训》与刘勰《文心雕龙》后，发现两书作者所处时代及社会环境、思想状况特征大致相同或相近，书中文字的内容与精神也常一致，可以互为参证，尤其是颜书的《文章》一篇，其文学主张，多可与《文心雕龙》相发明。例如颜书《文章篇》有“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的议论。而《文心雕龙·宗经篇》则有“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言其本；铭谏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集解》发现，并引证了这条材料，指出他们同出一源，“亦当时主张文章原本《五经》之说也”，使读者更能深入明了此种文学主张之历史环境与社会氛围，从而对颜书获得更深刻的体会。

《集解》对颜书本文的错误，也时有指摘辨正，多有前人未指出之处。如颜书《文章篇》“文章地”一条，颜之推议论前人诗文写到地理名称时常发生知识性的错误，然而他自己在引证材料时就发生了一些错误。一是引述材料出处、作者姓名不准确，他所引述的梁简文帝诗《雁门太守行》（诗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实际名为梁褚翔作，而简文帝另有诗，非此诗。《集解》据《乐府诗集》加以辨正，纠正了颜氏的这一错误。此外，在本条中，颜之推还引述了萧子暉的《陇头水》诗（诗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往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指斥其中陇水、黄龙、白马方位不同，不当混在一起说，认为是“明珠之类，美玉之瑕”。按诗中白马乃白马津，在滑州，黄龙在北，陇水在西北，原诗意在以夸张手法侈写众水的方位，分叉很远，并非实际测绘。颜氏未达此旨，而有“明珠之类”的指斥。旧注为坐实颜氏的指斥，又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白马氏来曲说白马津，西南与西北水系不相涉，民族与河流更不相干，旧说徒令人增加迷惑，而《集解》说：“此（《陇头水》诗）及《雁门太守行》所侈陈之地理，皆以夸张手法出之，颜氏以为文章瑕类，未当。”不仅批评了颜书本文，也批评纠正了旧注的说法。书中，此类精彩的辨正、议论处很多。作为古籍整理的一种手段与形式的“集解”，并不是简单的旧注的汇集，而是一种再注释、再考证的过程。除了全面地占有资料，认真细致地归纳分析研究外，学力、识力与判断力都是作为“集解”以不可少的能力、修养。《颜氏家训集解》与其作者是具备了这些条件的，达到了这些要求的，是一部很好的书。所以此书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与许多

读者的欢迎，一再重版，不是偶然的。

一晃 10 多年过去了，不想在全国第一次古籍整理图书评奖活动中，《颜氏家训集解》获得了二等奖，说明作者的辛勤劳动，再一次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肯定，说明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贡献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笔者为作者高兴并祝贺。

当我重新翻开《集解》阅读时，仿佛又回到初读原稿时那种喜悦和着迷的心境中去，再一次被书中丰富的内容所吸引。愿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十分感谢我敬爱的第一个读者、责任编辑，提出了对《颜氏家训集解》全面的中肯的评价，此固非好读书不求甚解者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回忆自《颜氏家训集解》问世以来，亲自得到过誉的反应不少。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来函：

奉到大著《颜氏家训集解》，不胜感谢，亟以先睹为快。速读一遍，至深钦佩。不仅荟萃诸家旧注，且旁征博引，多所发明。如对六朝习语之诠释，（案：解放前，曾以《家训杂识》就正北平图书馆馆长王重民氏，承回信云：“大著《家训杂识》，敬读一过，获益良多，极佩极佩！‘阡陌’‘消息’等解，如读《晋宋书故》，但我公贯穿释道，郝氏不及也。弟王重民顿首。2月6日。”）尤其章断注连一词，一良昔日总从日本古语中，求其解而苦于不相符合，大著从《道藏》中获得正解，当年积疑因而冰释，何快如之！一良谨上。1980年10月19日，北大燕东园24号。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魏炯若教授谓余曰：

我读大著《颜氏家训集解》，首先翻阅《风操篇》“被送家鬼，章断注连”，看你解决没有。果然，你据《道藏》原原本本地道其所以然，扫除周岂明、刘盼遂一盲引众盲的瞎说，真通天教主也。

1990年11月29日，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来函：

藏用老兄：卧病中忍奉新著，大有枚叔《七发》之功，1000万字富翁，视白石有过之无不及矣。风闻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一论文集，遍觅不得，不识尚有存书能见惠否？近日亦偶出一二小册子，虽小巫仍不敢不拜见大巫也，稍缓当寄奉。现在正是金陵好秋时节，惜不得与君共游，怅怅。又有友人欲搜集八股文集，不知旧书店有无存书。兄乃多宝道人，或能知存佚也。盼告。专此顺颂道安。弟千帆。11月29日。

魏、程二公盖以余曾通读二藏，又治小说，固非“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者，辄以迷信神道反馈，瓜皮而搭李皮，岂得谓之谗而不虐耶！魏公今已长逝。程公所谓“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一论文集”者，即1989年在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晓传书斋文史论集》。我手边仅有样书一本，书无定价，又须以港币或美元购买，手续相当麻烦，愧无以应命也。

1981年2月下浣的一天，周扬同志在大学校长座谈会上讲话，说：

大学嘛，要有大师，没有大师，就不能成其为大学了。像王利器就是国学大师。

隔两天，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羨林教授偕同历史系主任邓广铭教授连袂来到北新桥宿舍。我那个蜗居，实在湫隘嚣尘，容不下两个贵宾，于是我们约到外面大街的人行道上边走边谈。季羨林教授传达了周扬同志的讲话，最后，他说：“我们今天来欢迎大师回母校讲课。”邓广铭教授说：“请您到历史系讲《史记》，打好学生阅读古书的基本功。”我说：“好，我准备先讲《太史公自序》，然后讲《平准书》、《货殖列传》、《高祖本纪》。”邓广铭教授送上聘书，聘为历史系兼任教授，签发日期是1981年3月2日。他说：“好。我们回去布置一下，隔两天，有人来接您。”到那天，接我到北大，邓广铭教授陪我去讲堂，哪里谙到教室太小，学生多，容不下，临时忙了不少时间，才在一间阶梯教室上课，已经延误快半小时了。打从周扬同志封我为国学大师，这消息不胫而走。1991年8月1日《中华英才》第15期（总第27期）页20，以《国学大师王利器》为标题，作了评介。

1991年，美国《葛思德图书馆杂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4卷第1期FROM THE EDITOR（撰稿人介绍）由牟复礼（F. W. Mote）教授执笔，对我作了介绍，最后他说：He truly embodies the import of the old Chinese term: “*Yi-tai hung-ju*”, or “*the master scholar of our time*”. 《重庆与世界》1992年6月号（总第28期）“100个人和他的世界”专栏，刊载时旭的文章，即以《一代鸿儒王利器》为标题，作了评介。

198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文教”专栏，刊载了中新社记者刘兆义的文章，以《千万富翁王利器》为标题，作了评介，“千万富翁”者，谓已出版著作千万字也。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晓传书斋文史论集》作者简介写道：

本书收辑作者多年来所发表有关文学、历史、哲学各方面论文之一部分。作者治学态度谨严，范围广阔，实事求是，又勤于述作，迄今已出版专著10余种，发表单篇论文百余篇，国内学术界称之为“千万富翁”，又誉之为“大杂家”。

1980年11月1日，台北出版的《国文天地》发表了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向恒的文章，标题是《大陆的两千万富翁》，副标题是《博学宏文的王利器教授》，作了较为详细的评介，则又发展“千万”为“两千万”了。

昔李固遗黄琼书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面对这些不虞之誉，过誉之辞，每诵李固之言，未尝不赧颜愧色，兢兢业业，而有自虞殒越之感。今而后，余其以李固之言自警，念兹在兹，时时自问“常惺惺”否也。

老运动员

昔年所作《王利器自传》，载在1982年10月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第76—97页），写道：

后来在1957年蒙受不白之冤，那时我还是绿鬓朱颜的英年呀，解除了所有抛头露面的活动，把我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此8小时以外的时间全都是我自己的了。我热爱祖国文学遗产，于是朝斯夕斯，专心致志，重整旧业，锲而不舍，就是文章著作，遭受禁锢，也从不气馁，不打算改弦更张。“文化大革命”中，不管说我是白专道路也好，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好，我都诺诺连声，惟惟听命，以此幸免于难，也从而深深领略了道家所持的“呼我为牛吾应之，呼我为马吾应之”的哲理。而我又所谓“死老虎”，虽然有时也叫我去陪斗“受教育”，提我去“过堂”，甚至把我住处的地板都撬开了，护壁都凿穿了，片纸只字都搜光了，直至把我关了4年的牛棚，我都泰然处之，随遇而安。每当他们要我交代问题的时

候，我枯坐冥搜，像煞有介事，其实我的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去思想我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在粉碎“四人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时，我的问题，也像我的鹤发童颜的面目一样大白于天下。我就接连交出去10多部稿子，这些是：《盐铁论校注增订本》、《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宋会要辑稿补》、《历代笑话集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九籀集》校点本、《警世通言》校点本、《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等，约有六七百万言，还不断发表单篇论文，差不多每月都有，颇引起老朋友们注意。他们说：“老王这两年丰收了，创造了奇迹。”问我：“奥妙何在？”我说：“完全没有啥奥妙。就是这些年来，他们搞他们的，我搞我的。这都是几十年来积压的陈货嘛！”言下，他们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说：“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传略”。今天回忆起来觉得要说的话还多，不吐不快。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反右运动”第二天就要正式宣布胜利结束，头天晚上，党委会找我去谈话说：“经党委会研究，还是给你戴上‘右派’帽子，帽子是可以摘掉的。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不懂政治，党委会认为需要就是了，我没有意见。”就这样，没有批判，也没有斗争，我就浑浑噩噩地当起“右派”分子来了。子贡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篇》）自从划我为“右派”后，我颇有些切身体会，迄今记忆犹新。有一次会上，党委会的组织委员我的江津中学的老师赵其文同志悻悻然指着我说：“王利器呀王利器，你都成为老运动员了，你

知不知道。”我心里不想，我是所谓三名三高的旧知识分子，就是该整嘛，我知道什么。洪自诚曰：“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菜根谭前集》第十九节）我在历次运动中的心态，就完全如此。那还是住在十条北大教授宿舍时，资料室的负责人偕人事科一位女同志突然来到我住处，当场宣布：“编辑部过道上堆放的明版《津逮秘书》丢失了不少，你是不是拿了一些回家来了。”我说：“我那书架子上果然有《津逮秘书》。”他们相顾，色然而喜。我随即在书架子上取出一套来向他们说：“我的《津逮秘书》每种都有书套，并写有书根，和出版社的大不相同。我这三间屋子都是书，你们可以随便检查，如有出版社的《津逮秘书》，我负完全责任。”他们相顾黯然失色，想不到我也有一部《津逮秘书》，在三间屋子里来回折腾了半天，毫无所得。我说：“这部准备组稿用的资料，资料室早就应该管起来了。”他们无话可说，就灰溜溜地走了。正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挟持一个党员私设公堂，把我找去，要我交待敌伪时期，在华北伪政府当大汉奸的罪行。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我说：“日军投降以前，我没有出过四川。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具有不可思议的分身法，人在四川，却又在华北当起大汉奸来。”他们说：“你不交代。我们掌握有铁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于是他们抛出了所谓“铁证”，一张印有300多人的名单，给我看。我接过一看，便说：“这名单一点也不假。”他们相顾欣然有喜色，好像抓到了一条大鱼。我接着说：“这是当年日军投降，北大复员，那时在北平工作的同学，不下300人，发起搞了一个北平北大同学会，还在欧美同学会开了盛大的成立会。由于我的姓氏笔画简单，占了便宜，就把我排在前面了。据我所知，这个名单上有不少是共产党员，现在还在北京工作，有的还身居

要职，你们可以去调查调查。这些人都不都是大汉奸，尤其是我，日军投降前，根本没出过四川，怎么会在敌伪时期，在华北当起大汉奸呢？”他们相顾愕然，又似乎是憬然而悟，搞错了，于是草草收兵，偃旗息鼓，不宣而散，以后也没有来找我，开这样的会，大概不了了之吧。其后，在平反会上，也没有就此事澄清一下，不知在我的档案袋里还装有这个黑材料否？实在令人放心不下啊！

还是这个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大概他认为我是摘掉帽子的“右派”，而他手上又有权，于是施展了对我十分不公正的干当。先是，我和郭绍虞、罗根泽两位先生共同商量搞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第一部是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第二部是我的《文镜秘府论校注》（后来以廖德明名义出版的《苕溪渔隐丛话》校点本，也是这套丛书计划中的一种）。其后，郭、罗二位先生相继去世，我又被错划为“右派”，这套丛书就没有继续搞下去。后来，党认为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我平反了。我把已经搞好的《文镜秘府论校注》交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积压了很长的时间，等到这个人的复旦大学同学的同名稿子出版了，才把我的《文镜秘府论校注》口头一句话“退稿了”。我向编辑室主任杜维沫同志要退稿意见，他说：“责编说你的稿子错误很多，不能出版。不必看退稿意见。”我说：“我们从前退稿，都要指出稿件的不足之处，不能出版。我想看看退稿意见，以便进行修改嘛。”他说：“算了，不要看了。”就这样口头说退稿就退了。退稿时，不知什么缘故，又没有把赵朴初的颂辞退还我，我提出质问。据说，这个人通过周绍良同志的关系，请赵朴初同志又写一遍。于是我把写的前言《弘法大师与〈文镜秘府论〉》和赵朴初同志的颂辞都发表了。却碰上一个很好的机缘，1984年是弘法大师逝世1150周年，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

廖承志同志知道我有这稿子，亲自来抓，把稿子交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很快就排出样稿了。可惜他没有看见这部书的出版就与世长辞了。此书出版后，引起日本朝野重视，于是在1984年，由日本文部省拨出专款，责成京都大学文学部兴膳宏教授主持此事，邀请我去讲学，为期28天。日本缙素两界学人，咸以《文镜秘府论》一书，应由日本人整理出版，而这个工作却由我做了，他们对我表示极为感谢、敬佩之忱。访日讲学回国后，在屠岸同志倡议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开了一个小型展览会，主要展出《文镜秘府论校注》样书和一部分原稿，以及我在日本讲学的照片。会上有人问我：“这部书应由文学出版社纳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出版，你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为何把这部稿子交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把退稿经过向他们说清楚了，这才恍然大悟。

我所整理的《水浒全传》是校与注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付印时，郑振铎先生和我商量，校文和注文都很多，同时印行，部头太大，遂决定先以正文附校文付印，其注文部分单独印行。《水浒全传》（附校文本）已出版，《水浒全传注》的发排工作就提到日程上来了。随后，贡洗文同志就以排出的样张来征求意见，我以为版式很好，完全同意。不久，我被划为“右派”，《水浒全传注》也就停止发排了。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文学遗产整理工作分为两部：一是搞普及的，属第二编辑室；一是搞点校的，属第五编辑室，对外则称为文学古籍刊行社。我是调来搞文学古籍整理工作的，于是把我分配在第五编辑室。其四大小说中带简明注释的普及本就由二编室的另外一个人负责，我的《水浒全传注》稿子两大捆，就在那个人办公室的书柜里，我曾经为和《水浒传》有关的问题想查一查我的稿子，遭到拒绝了。他说：“要领导批准才

行。”随即“反右运动”搞起来了，那个人先我被划为“右派”，也先我摘掉帽子，不久，他就退休，回南京去了。后来，我的问题平反了，齐鲁书社的任笃行来向我组《水滸全传注》稿，我欣然答应了。我向当时的编辑室主任杜维沫同志申请退还我的《水滸全传注》稿，他说：“等查一查再告诉你。”隔两天，告诉我：“查无下落。”不得已，我重起炉灶，经一番努力，终于第二次把《水滸全传注》搞出了。现在保存的原稿，还是齐鲁书社提供的全部稿纸呢。而我那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滸全传注》第一次的原稿失踪了，至今还是一个谜。

从均县回到北京，十条宿舍已被人占用，遂安排我住在北新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间小屋。不两天，有人拿着一张申请退休表格，要我签字，办退休手续。我说：“我不申请。”来说：“你不签字，也要退休。”就这样，我被勒令退休了。落实政策以后，才改为离休。退休之后，我也没有闲着，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义务劳动，首先参加藏文本《水滸全传》翻译工作。这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邀请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5个省、区的精通藏、汉文专家20余人，集中在北京民族出版社进行的。我负责向全体翻译工作者讲解《水滸全传》，要求直译，不作任何删节，连所有的诗词，也译成藏诗形式，所有的成语，用相应藏文成语代替，其中事物有为藏语所无者，则适当地用对音或意译。藏族无道教，则以西藏的异教来代替，而以小注加以说明。我把全书讲完了，然后由他们分头去笔译，一人分担若干回。我则天天去民族出版社处理随时发生的问题。他们译成一回后，根据他们的译稿讲给我听，直到认为可以才算通过。全书译成出版后，得了大奖，也分给我一笔奖金，我亦与有荣焉。

其次，地质学院来人以我曾出版过《盐铁论校注》，来约

我翻译此书。由于我曾经字斟句酌地下过功夫，吃透了全书精神，驾轻就熟，很轻松地把它译出了，是为我古书今译的第一部，也是最后的一部。生今反古，谈何容易哟。出版时没有署我的名，理所当然嘛。

又其次，还是地质学院此人，看我手腾出来了，于是要我搜集历代地震资料，说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印有特制卡片，还请一位女士作抄手，我查到了材料，就交给她抄写。于是我们天天去北京图书馆柏林寺阅览室工作。她字迹娟秀，卡片写得很整洁，大家都很满意。我查得《淮南子·俶真篇》“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高诱注云：

历阳，淮南国之县名，今属江都。昔有老姬，常行仁义，有二诸生过之，谓曰：“此国当没为湖。”谓姬：“视东城门闾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顾也。”自此姬便往视门闾，闾者问之，姬对曰如是。其暮，门吏故杀鸡血涂门闾，明旦，老姬早往门见血，便上北山，国没为湖。

寻《太平御览》四十三，《历阳图经》曰：

鸡笼山在县西北。《淮南子》云：“麻湖初陷之时，有一老母提鸡笼以登此山，因化为石。”今山有石状如鸡笼，因为名也。

又一百六十九引《淮南子》：

历阳之都，一夕为湖。注：“明帝时历阳沦为麻湖。”

盖所据为许慎注也。《论衡·命义篇》：

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

《水经·沔水中》注引《神异传》曰：

由卷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老姬闻之，忧惧，且往窥城门。门侍欲缚之，姬言其故。姬去后，门侍煞犬，以血涂门。姬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又曰：“明府亦作鱼。”遂乃沦陷为谷矣。

干宝《搜神记》卷六曰：

历阳之郡，一夕沦入地中而为水泽，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时。

又卷二十曰：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姬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姬日往视，有稚子诿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又《太平御览》六十六引《搜神记》：

由权县，秦时长水县。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

城当陷没为湖。”有姬闻之，朝往窥，门扃欲缚之，姬言其故。后门侍以犬血涂门，姬见血，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可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案：此与《水经注》引《神异传》同。）

任昉《述异记》上：

和州历阳沦为湖。昔有书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谓姥曰：“此县门石龟眼血出，此地当陷为湖。”姥后数往视之，门吏问姥，姥具告之。吏以朱点龟眼，姥见遂走上北山，顾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鱼，奴为婢鱼。

《太平广记》一百六十三引《独异记·历阳媪》：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媪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门，见阖有血，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阖。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上山。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

贺铸《庆湖遗老集·历阳十咏·历湖》自注：

县西二十里。案：《县谱》本城邑，汉明帝时，一夕沦为湖，湖中有明、主簿鱼，甚美，皆昔人所化也。

以上所述资料，基本上反映一个情况，即中国古代地震频繁，震区非一，灾情亦有所不同。而先民皆具有强烈防震意识，力

图减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其以血涂城门阕，或石龟眼，非神话也，乃显示出先民已初步掌握地震之先兆，尤为活地震学史者所亟当措意者矣。似此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已积累数以千计的卡片，成绩斐然可观，不知后来为啥停止了，善始而未善终，足可惜矣。

打从我戴上“右派”帽子之日起，日子是不好过的，有如资料室负责人随便闯入私宅，怀疑我盗窃《津逮秘书》；又如有人私设公堂，诬我是华北伪政府大汉奸。子贡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杨惲《报孙会宗书》曰：“下流之人，众毁所归。”应璩《百一诗》曰：“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以上所引，皆见于《文选》。从前读到这些文章，把它轻易放过了，自今回忆起来，则不禁有切身之痛也。江淹《恨赋》曰：“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亦见《文选》，如我者其亦《恨赋》中人耶！因是已，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到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严文井同志在为我召开的平反会上说：“当年讨论划你为‘右派’时，党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我在会上说：‘王利器不像右派嘛。’立刻就有人说：‘他不像，你还像呢。’这样，还有谁敢说呢！今天，经党委会研究，认为当时划错了，现在给你正式平反。”我说：“我感谢党给我第二次生命。”这时，我油然而想起了宋人潘阆寄张咏的诗：“莫嗟黑发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吴处厚《青箱杂记》六）不啻为我咏之也。散会后，我遂以毛泽东“争朝夕”的诗句名其斋曰“争朝夕斋”，实以像我这样一个老运动员，哪不十分惋惜掷于虚牝之大好光阴也。杜牧《归家诗》曰：“共谁争岁月。”刘禹锡《岁夜咏怀诗》曰：“将寿补蹉跎。”今日之我将与谁争乎？曰：自争。又将如何去补乎？曰：自补。人

亦有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余积若干年之经验而得来之今昔观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篇》）今日之我，岂能自甘做“未如之何”之人哉！不过，我这个摘掉帽子的“右派”（有些人就是这样看我，还在平反后，大干其极不公正的勾当），始终有一个谜，至今不得其解。这就是在我重见天日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什么基金会，首次向大陆邀请学人去讲学，每年两位，一位是社会科学的，一位是自然科学的。他们于是上半年邀请我，下半年邀请钱伟长，待遇是相当优厚的。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赞同，为我办了护照，还按国家规定，发了治装费，在江都治了一身高级毛料中山装、高级皮鞋、手提箱，还发了200元外币，以作零用。此外，还让我带去一套精装《鲁迅全集》赠送中文大学。有些人对此很纳闷，为啥首先让大“右派”出去讲学，这能代表国家吗？来问及我，我实在无法答应。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根本无熟人，虽然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办人之一，我在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同事钱穆，有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同学周法高，但他们都早已离开香港去台湾了。这次无缘无故的邀请，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后来还为我出版了《晓传书斋文史论集》，这真是一个谜呀！

劫余话劫中之劫

我平素爱读《世说新语》。北大复员，我是初来乍到北平，听说有日本影印的宋本《世说新语》，我跑遍了琉璃厂、隆福寺的旧书店，都没有找到。于是我托张政烺先生代为搜访。不久，一个单干的书商王志鹏送来了日本影印的《世说新语》，他说：“是一个在门的书，要一条黄金，分文不少。”那时，国民党政府发的纸币，天天贬值，我们拿到薪金，都去东单市场买黄金、银元或美钞。当时我家眷没有来，我薪金高，又有稿费，收入相当可观，每次拿到钱就去东单换成黄金和美钞了。因此，我手上有金条。我横了一条心，一条黄金就一条，就把这部书买下来了。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宋本《世说新语》就是用的这个底本。自从我用金条买书之事传出去后，书店就经常来送书了。因此，我得精选而后购买之，因此，我收藏的书比较多而且精。有一天，我去团城同郑振铎先生商量《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题，主要是我认为哪些插图该抽换更好的和哪些应该增的。我拿出我拟好的清单交与郑先生，他看了说：“很好，就完全照您的意见去办。”正在此时，隆福寺鸿文书店老板葛鸿年送来一册装裱成

经折本的陈老莲《水浒叶子》。郑先生略翻一翻，就递与在旁的徐邦达，徐邦达看了两页就还给郑先生，郑先生又递与我，我接下手仔细一看，是陈洪绶少年时在萧山来家做客时所作。那时，陈洪绶正在学吴道子，还未自成一家，与郑先生影印刻本陈老莲《水浒叶子》，风格迥然不同。本来宋江三十六，只有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癸辛杂识续集》上），为了配合叶子戏，陈洪绶遂画成40人；史大成手书龚圣与赞时，尚缺4人，是由他补足的。这和柴萼《梵天庐丛录》所载并记叶子为虫蚀，幸未伤及人物，于是为之装裱成册叶的情况，完全相合，心里为之惊喜。这时，郑先生跟葛鸿年说：“这个册叶靠不住，我们不要。”徐邦达噤不作声，我也不想说别的。于是葛鸿年收拾起册叶，就废然而返了。随后，我也告辞郑先生，从团城回来，径奔隆福寺，向葛鸿年讲：“这本册叶我要了。”他说：“我在济南刘成禺（时人称为北刘）家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前后护叶的狂草就是他写的。刘成禺说：‘当年在天津是拿40多间房子换来的。’这回他出让，要价也是很高的。”我说：“不管多少，我要了。”这样，这本册叶就归我了。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封面的宋江像，就是用的这个册叶的宋江像。有一个和康生相熟的人，在康生处看到一本临摹的陈老莲《水浒叶子》，康生当成真的买来了，这个人对康生讲他买的是临摹本，原本在王某处。于是，他来我家说：“康生要看您的陈老莲《水浒叶子》。”于是，他从我处拿去了。后来我催促还我，还回来了。未知当时康生何以尚未公然强取豪夺以去也。但在后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退还我的图书时，没有这本陈老莲《水浒叶子》，至今还是一个谜。上述二事，说明我敢出大价钱买书，只要我需要，我是毫不在乎的。但也有我买得起而没有买的。那是我还住在东四十条胡同北大教授宿舍时，有

人从东北搞来一部宋本《经典释文》，我一看是被溥仪带出宫的国宝，多少人想看而不得见的宝书。当时，我买得起，却陡然想起白居易《李夫人诗》“尤物感人亡不得”的诗句，不想要，于是对那位朋友说：“假如您放心，就先放在我这里，再说。”他说：“可以，就放在您那里，以后再说。”大概他也知道这是故宫流散出去的国宝，不好脱手，就一直放在我那里了。于是我就拿我收藏的通志堂用开化纸初印的《经典释文》来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作了校勘，大概3个多月完成了，我才把宋本原书退还他了。后来，汉口徐行可先生见到我的校本，十分惊喜，把我的校本借去了，说要传校一本。其后，徐先生逝世，听说他的藏书都归武汉市图书馆了，我也无法去清问。但是，我却因得见此书而写了一篇《经典释文考》，作为纪念北京大学50周年论文，文中提及的宋本，即指得之经眼之海内孤本矣。另外一事，就是我的四川大学同学石晓辉女士，她通过我的北大同事吴恩裕教授来找到我，送我一部《八旗艺文编目》，说要把《编目》所载的全部书籍，也就是《雪桥诗话》所据以成书的全部书籍出让，她不愿意亲自出面把书卖给公家或书店，她说：“我想卖与老同学。”我于是同她一道去西城东养马营四号杨宅了解这批书的具体情况。我看了过后，十分喜爱，以这一批书绝大部分是清初刻本，还有一些钞本，尤其是有不少材料与《红楼梦》有关（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绿烟琐窗》稿本、《懋斋诗钞》稿本、《枣窗随笔》稿本以及《四松室集》、《春柳堂诗稿》等都是用的这批书作底本），是极为珍贵的。红学已初步发展起来，这批书可提供不少研究资料，放在私人手里，垄断起来，靠点枕中鸿宝，就想成名成家，非余之所欲也。于是我去团城向郑振铎先生讲此事，他大为惊诧，说：“这批书颇为难得，您不要买，由我们买。”我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才来向郑先生讲嘛。”于是他派人同我一道去东养马营杨宅。我把情况向石晓辉女士讲清楚了，她同意，于是我说：“以后怎样，您和郑振铎先生洽谈，我就不插手了。”听说后来每本作价5角成交，书归北京图书馆所有。可惜北图把这批书打散了，随书内容编目上架，查阅起来，颇为不便。琉璃厂书商单千户老孔有一天来向我说：“西城有一家姓李的，解放前是京西一家煤矿公司的股东之一，他收藏有不少敦煌卷子、字画、明版书，想卖，我们去看一看吧。”于是我们一道去李家看了，敦煌卷子全是佛经，有一卷是古梵文的，书则大部分是《杜甫诗集》，字画不少，挂了满屋子，还有没挂出来的。我觉得可以挑选，于是跟姓李的说：“隔两天，我去约作家协会一位诗人来看您。”因为田间同志曾向我表示，希望帮他买点杜甫的集子。这回机会来了，隔两天，我就约他一道去李家。田间同志把所有明版杜诗都要了。我则把20多个敦煌卷子、张伯英藏李攀龙字幅和张船山两副对联要了（后来，我把张船山一副对联送给遂宁博物馆了），价钱也不贵，我和田间同志都满载而归了。后来，田间同志调到河北省文联工作，也把这批明版杜诗当做随身宝了。隆福寺的带经堂书店，我去逛隆福寺都要在那里坐一坐。有一天，碰上这家书店刚刚进一批小说，有崇祯本《金瓶梅》，书有插图，很完整；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册，有“七品官耳”章，涵芬楼影印的以无嘉靖元年壬午（1522）序，遂认为弘治本了；明郁郁堂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版心题“郁郁堂四传”）；清卧闲草堂刊小型本《儒林外史》；又有活字本《红楼梦》一部，大概由于经常有人翻阅之故，线断页子散，卷头的石头图已残破。我见到这批书很喜欢，我说：“我都要了。”带经堂的少东家王世英对我说：“这批书是从敌伪时期的天津县长李少微家搞来的。李少微是李盛铎的后人，有李木斋藏书，据

说还有《永乐大典》6册，都是小说戏曲；大概由于李少微爱好的缘故，又有钱有权，因之他搜集不少小说。”我说：“那6本《永乐大典》有下落没有？”王世英说：“日军投降后，这个天津县长李少微被枪决了，他的姨太太叫老六的把这6本《永乐大典》拿走了。据李家的人讲，后来老六搬来北平，住在崇文门一带，我曾经去崇文门一带打听，根本没有人知道老六其人。”我说：“要继续打听，把老六找到，那6本《永乐大典》就会有下落了。”王世英以《红楼梦》书颇漫漶，我把卷头的石头图描绘补全，于是他叫姓刘的伙计装修成很精致的金镶玉的两套书了。这批书归我之后，颇为人所艳羨，尤其是崇祯本《金瓶梅》有完整的百二十幅插图是极为罕见的。自从我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只发生活费，稿费来源已断绝，八口之家生活是够困难的。科学院历史所谢国祯来和我商量，他说：“天津图书馆的黄馆长愿意要您的《金瓶梅》等小说，好不好您把这批小说出让给他。”为解决生活困难，不得已就忍痛割爱了。书去之日，我心里是十分难过的。

日军投降，北平市遣返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在离开北平之前，每逢星期日，率在东四南大街过去是日本人搞的什么机关所在地出卖他们所藏的书。有一天，在北大留用教满文的今西春秋告诉我这个消息，于是我每逢星期日都去那里采购，收获不小，所购得有：甲辰4年（1784年，当乾隆四十九年）大坂书林刊平安秋水园主人辑《画引小说字汇》，庆应元年乙丑（1865年，当同治四年）江户书林刊安井衡撰《管子纂诂》，日本重刊万历三十一年（1603）朱吾弼重刊《朱子语类大全》（有“织田氏图书记”、“君山遗品”收藏章），元文2年（1737年，当乾隆二年）洛东狮谷白莲社刊慧琳《一切经音义》，宽文9年（1670年，当康熙八年）书肆山形屋覆刊明金闾钱国焕刊琰昆玉纂集《古今类书纂要》，又一部亨保

14年己酉（1729，当雍正七年）京师书馆据山形屋版重印本，《三体唐诗》有裴庾注为他本所无，京都藤井佐兵卫刊《文镜秘府论》。又有影印本，如“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宫内省图书寮藏古钞本《文镜秘府论》，“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宋槧本《毛诗正义》（原缺卷一至卷七），昭和10年（1936）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嘉庆六年（1781）同述观梓《拜经堂丛书》（这套丛书包括：《拜经日记》十二卷，《经义杂记》三十卷，《卢氏礼记解诂》一卷，《华严经音义》三卷，《诗经小学》四卷，《宋本尔雅》三卷，《汉书音义》三卷，《三礼目录》一卷，《郑氏六艺论》一卷，《蔡氏月令章句》二卷），又有吉川幸次郎、小川茂树、平冈武夫集资影印《汉书疏证》（吉川等疑即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所载之杭世骏撰《汉书疏证》，余以《道古堂文集》二十三《志西汉盐铁》一文与《汉书疏证·食货志》“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条文完全吻合，定为杭世骏撰），又有朝鲜刻本《语录解》，与《艺海珠尘骈字分笺》合册，有“君山修史在韩”、“君山遗品”朱文章，此皆难得之书也。惟是有一个星期日，摆出一部元刻本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系罗振玉藏书，书品佳，标价甚昂，我身上带的钱不够，我向主持人商量，请保留下来，下星期日我来买。等到下星期日，我带足书款去买，已经没有了，失之交臂，至今犹未能忘怀也。

北平围城期间，通县已解放，北平的照明、发电厂在通县，于是经常停电，北平成为黑暗世界。同时，市上粮食紧张，人心惶惶。北平市为照顾北大、清华两校的教授，给每人发了一袋加拿大面粉、两桶煤油，我拿来都放在寝室里。来串门的书商看见面粉和煤油很羡慕，请求我把面粉和煤油和他们换书。我从王蕃同志处得知，北平很快就要和平解放了。于是我就拿一桶煤油和这袋面粉换了不少的好书，这些书有：

精抄本《学林》（有“棟亭曹氏藏书”、“长白敷槎氏墓斋昌龄图书印”、“东武李氏收藏”朱文章，原缺第三第四两卷，璋煜氏假汉阳叶氏藏本钞补），初印本《抱经堂丛书》（有“莫友芝图书印”、“莫印彝孙”、“莫绳孙字仲武”朱文章），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方虚名辑注《南华真经旁注》（有“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朱文章），乾隆七年（1742）明善堂刊《四书五经》，康熙四十三年（1704）泽存堂重刊宋本《玉篇》及《广韵》（初印本），光绪六年（庚辰，1880）式训堂刊董增龄撰《国语正义》，《佩文韵府》（开花纸初印，黄绫内套，黄布外套）。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了，我悔恨自己没有远见，为啥还要留一桶煤油呢！自此以后，我的藏书不仅多，还相当精，约有3万册。后来，我由红二楼搬到东四十条39号北大教授宿舍，光是书就来回搬了几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附近五中的学生来造反，肆意破坏，我生怕我的书遭殃。第二天，我就把我的好书两大书柜交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开车来把这两书柜的书连书柜也一道运走了。这批书有：《大乘大悲分陀利经》数朝邈邈经折本（以千字文编号，有随函音义，其赖三卷末有补刊“天圣三年（1026）五月十日忠州刺史种师道刻定”字样，赖二号七、八夹缝处有“元祐二年山西太原府在城信士张杨氏补刊”字样，其余补刊页子则元明清三朝俱有之，以土纸裱褙，极笨拙，盖以供寺僧呗赞之用者。余时正在作《水浒全传》校注，重其刻定人忠州刺史种师道为《水浒传》中人物，爰过而存之），有元大德丁未十一年（1307）李果序刊本《风俗通义》，明刊明装白绵纸《艺文类聚》（有明兵部尚书“张延登”印章，王渔洋之老丈人也），明刊大字白绵纸本《通典》，明刊小字白绵纸本《文献通考》，明刊原装白绵纸中都四子本《淮南子》，明第一桂刻白绵纸《淮南子》（有惠栋藏书印），明刻本姚旅《露书》，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年）无锡华氏剑光阁据宋本校刊《事类赋》（有“莫友芝图书印”、“莫绳孙字仲武”、“莫印经农”藏书印），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丘云岷刻丁采《小令》，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年）养素堂刊《史通训故补》，朱彝尊手批《腾笑集》，又手批《李义山集》（壮年及晚年两次批本），李慈铭手批《十驾斋养新录》，陈季皋先生手批（含遂录黄季刚先生批语）《广雅疏证》等。当文物管理处退还书时，他们问：“据了解，你还有些善本书，为啥这里面一部也没有？”我欣然告诉他们：“实在对不起，‘文化大革命’头两天，我已经把我的好书抢先一步交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他们愕然相顾，怒目而视。

继五中学生造反之后，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造反派来的，把我和廖德容戴起高帽子敲起洗脸盆去游街，没有引起街坊邻居兴趣，还不到半条街就冷没恹恹地回来了，把我关在贞平住的那间小屋子里。他们到处搜索，折腾了半天，临走时，拿去一些东西，给我开了一个清单，签上造反派头头的大名。我记得这批东西里有我很喜爱的一个竹搁臂，是柳如是画竹、钱谦益题字，纪年是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有朋友说：“雕刻当也出于柳如是之手。”以后他们拿去东西就没有开清单了。平反后，我拿这个清单去向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会办公室清问，他们说：“是有这个人，已经毕业分配去广西了，我们查一查，等几天你再来一趟。”过了几天，我又去清问，他们说：“工业大学查抄物资仓库里没有这些东西，跟广西联系，那个人手边也没有这些东西，广西方面已责成这个人把事情交代清楚，包括除此之外都要搞清楚。”我得到结果，如此而已。

我的问题平反后，北京市为了落实政策，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让我去府学胡同领取退还的书籍。我一看清单，首先注

意到书不到1万册，一些文物古董没有，我积累多年数以千计的卡片也没有。我问：“我的书远不止此，还有些文物古董、很多卡片，为啥没有？”有一个姓王的——后来知道是负责人，他说：“你的书有的单位和个人拿去了，以后有还来的再退给你，文物古董我们放在另外的地方，等两天我带你去领，至于卡片，我们没有要。”我听到此话，心里很舒服。接着姓王的又说：“都送去造纸厂了。”我听到这句话当时就哭了。一个姓萧的原是隆福寺文渊阁的老板，他说：“哭什么，百衲本《二十四史》都还给你了，你还要哭。”于是我请出版社派车来拉书，当这批书搬出文物管理处大门时，就有人跟我说：“王某，你这些书是残的，你拿回去没有用，卖给我们吧。”我说：“你怎样知道是残的？就是残的也有用，我拿回去生炉子，我不卖。”就这样把书运走了。第二天，我去找到姓王的，他说：“文物在北海后门，你跟我一道去取。”于是我和他一道来到北海后门一个地方，有一位女同志接待我们，姓王的随即到另外的屋子去了。那位女同志说：“你就是王某，我曾参加登记你的书籍，真是不少。”姓王的随即搬出一些东西，他说：“你的东西就在这里。”我一看，说道：“我的敦煌卷子有20多个，不止8个。我还有些瓷器，有徐世昌收藏的张廷济钟鼎文对联，看张叙未很自珍他这副对联，隔了两年，他又写了题跋在上，还有着色的袁崇焕造像，纪晓岚藏砚一方（他的《砚谱》著录过这方砚），还有孙星衍字嵌镶在古钱纹玻璃镜屏里，还有齐白石画兰记年73岁的玻璃挂屏一个等。”姓王的说：“以后清查出来再退还你。”我看到还有几块乾隆朱墨，把龙纹图案都铲平了，心里很难过，难道文物就应该这样管理吗？又惊奇地看到张伯英藏李攀龙手书诗一轴，我说：“李攀龙是明七子，是有名的诗人，他的真迹很少，假如你们知道，恐怕就不还我了。”姓王的听说赧然，他说：“你

的瓷器什么的，没有在这里，等清查出来，再通知你来取。”退还的还有张船山对联二副，后来我把其中的一副赠送给遂宁市博物馆了。隔几天，文物管理处通知我去东单一个地方领东西，我以为是不不少的，于是约到二女儿贞慧及其爱人王康明一道去，结果仅有纪红胆瓶等三两件而已。

退还的书籍，经我初步检查出显然有残缺的，如明刻本《涌幢小品》就只有5本，渭南严氏刻《颜氏家训》就少了2本，《论衡校释》就少了1本等。凡是残缺的都没有列入清单。又发现有江青、康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打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横方形朱文印章和某机关已经编号的如《齐东野语》为MJ—1798/4—1等。江青拿去的日本刊安井衡《管子纂诂》一函12册，都在蓝青色（俗谓之慈青）书皮上打上“江青藏书之印”白文朱红图章，叫人看不清楚庐山真面目，此又作俑者之一绝也（江青拿去我的书还有，此举其可笑者耳）。至于康生，如所周知，凡在文物管理处拿去的书，每部书不管大小，都要付书价5分钱，然后打上“天下为公”的图章。他拿去我的雍正刻本《西厢记》，前有篇序文是他本没有的，他拿去写了题跋，描绘一个“康生”图章，倒填年月，说是“文化大革命”前购买的，却又在“四人帮”倒台后退还我了，真是作伪心劳日拙的丑闻。至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其手法则又不同，他们在退还我的敦煌卷子，万历庚辰八年（1580）重刊嘉靖乙丑四十四年（1565）《相里张氏六世诗谱》（遮盖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图章隐约可辨），明刊本《史通》，行有恒堂抄本《明宫词》等，已经打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图章，又打上一片朱色印泥，以图遮盖，却没有料到反而弄得欲盖弥彰，其有遮盖不住的，干脆把它毁坏，如《史记会注考证》第一册的书名页就被撕掉了，痛定思痛，奈何反遭此劫中之劫也！今兹浩劫虽然过去，劣迹仍然留传，将

来如有风吹草动，难免又有心怀叵测之徒，据此私设公堂，说我盗窃公家图书，说我和康生、江青有来往，要我交待。我真百口难辩了，心有余悸，不禁口有赘言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

作者=敏译

页数=182

SS号=10161537

出版日期=1997年12月第1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
从对对子学起
从吴芳吉先生读《淮南子》
良师与益友
解放前后
亲扶向师旅棹归旧山
我与《文心雕龙》
谁说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
访日讲学记
未达之知与不虞之誉
老运动员
劫余话劫中之劫
附录页